

#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 目 录

### 专 论

3 冯绍雷 / 传统与当代变迁交融中的中俄关系

### 专题文稿·俄美关系

13 C·卡拉加诺夫等 / 重建而非仅仅重启：对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利益

34 赵建明 / 论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竞争与合作

45 张学航 / 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

### 欧亚·斯拉夫

57 A·利布曼 / 中亚的政商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

71 伊尔纳扎罗夫 /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的转型战略：悖论和前景

### 经 济

91 郭晓琼 / 关于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

102 于娟 徐坡岭 / 俄罗斯卢布汇率安排的经济效应分析

### 历史·文化

111 林精华 /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 20 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

136 龙 腾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9 年 10 月 23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9 年第 5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Фэн Шаолэ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мбинац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 (3)

### ***С.А. Караганов***

Перенастройка, а не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США ... (13)

### ***Чжао Цзяньмин***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по ядер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Ирана ..... (34)

### ***Чжан Сюехан***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и дилемма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 (45)

### ***А. Либман***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бизнес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пособ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 (57)

### ***Фаррук К. Ирнараров***

Стратег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 момента получ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парадокс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71)

### ***Го Сяоцун***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вопрос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я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болезни» в России ..... (91)

### ***Юй Цзюань, Сю Полин***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эффект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менного курса рубля в России ..... (102)

###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ие Китаем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и — Анализ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итаем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 в 20 веке ..... (111)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5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Feng Shaolei***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hanges ... (3)

***Sergei Karaganov***

Reconfiguration, Not Just a Reset: Russia's Interests i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13)

***Zhao Jianming***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on Iran's Nuclear Issue ..... (34)

***Zhang Xuehang***

Russia's Orientation for I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light of Russian-US Relation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 (45)

***Alexander Libm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alysis ..... (57)

***Farrukh K. Irnazarov***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since Independence: Paradox and Prospects ..... (71)

***Guo Xiaoqio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Regarding Whether Russia is Suffering from "Dutch disease" ..... (91)

***Yu Juan, Xu Poling***

Economic Effect Analysis of Russian Ruble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 (102)

***Lin Jinghua***

China's Statement on Russian Issues—— on China's Percep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20th Century ..... (111)

专 论

## 传统与当代变迁交融中的中俄关系

冯绍雷\*

中俄关系的历史性发展及其丰厚的建树，是两国政治精英及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矢志不渝、艰苦努力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中俄两大国在当代条件下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够脱离当代国际事务演进的整个潮流，也几乎没有任何一组双边关系是能够斩断传统、在脱离自己文明传统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梳理当代中俄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探讨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关系的演进、以及其背后传统与当代变迁之间互动的深层机理，可能会对这一内涵丰富而成就卓绝的进程获得一些新的体认。

鉴于这样宏大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广泛知识，作者只能从自己相对狭窄的视角，就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从若干重要的范畴切入，以此为起点作一个初步的探讨；并且由于所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作者能够从理论上给予解释的能力，因此，本文是以论纲和讨论的方式求教于识家。

### 一、中俄外交与国际史进程二者相互关系中的一个非西方视角

中国与俄国都是有着深厚文明传统的大国，而中俄两国间关系的演进也有着几个世纪的历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样丰富的积累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中国，以及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深刻影响但同时又是一个欧亚大国的俄罗斯，她们与整个国际社会互动交换的历史过程，也正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新认识与诠释。

这样一个重新体认过程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内部进程和对外关系互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俄国与以西方为主导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近年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的国际学术界有将原来的“国际关系史”(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改称为“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呼吁。以笔者的理解,这一呼吁的内在涵义,是将整个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不仅限于“国际关系”,而是从内部社会结构与对外行为的相互联系中,来理解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这里包含的不仅是国家作为主体的相互间关系,而且还包含着文明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这样一种包含有东西方相互之间互动的理解,至少有利于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一直有一部份人把俄国和中国排除在整个国际体系演进的过程之外,认为俄国或者中国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帝国,而是一个非正统的国际行为体。在他们看来,似乎唯有从古希腊到威斯特伐利亚,直到为当今西方认知范畴所容纳的国家才可以被视为正统的国际行为体。虽然,这样的观念从根本上说,还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西方中心论在起着作用,但其背后的认知与理论背景还大为复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认同国际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多元发展进程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进步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尽管中国和俄国有着自己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也受制于当时国际交往的经验,但就国家间事务而言,无论是早期东方国家、半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还有着相互间的共性。这里包括国家间交往的内容与形式、行为与规范,包括外交制度的管理,也包含着对外战略的运用,甚至也包括着对于与主权性相关问题的思考。东方和西方思考范式的不同,不能指称为东方国家就不存在规范性的外交。从这一角度看,尽管西方理论界和决策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调整这样的看法,并且以若干相当有分量的作品在改变这种偏见,但是,克服国际关系学界和决策界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依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里包括我们自己如何对于自己的传统作出更加清晰的诠释,以及如何更好地将传统与实践融会贯通的问题。不光是要证明中国的国际角色并非游离于国际潮流之外,而且也不要简单地将西方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简单地运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对外行为的研究中去。换言之,国际社会进程不能够排除中国的存在和参与,但是,中国的存在和参与又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学理上的充分解释。这样的一种解释不光是要充分重视几千年来文明传统所给予的种种界说,而且,同样要吸取西方学说中长于思辨、长于逻辑构建的优点,包括西方国际社会本身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积累。未来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诠释,应该是东西方结合、一般性和特殊性相互结合的产物。

对于俄国而言,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尽管千年以来,俄国对于西方的学习

不可谓不苦心孤诣，甚至于有人认为俄国人太过关注他人的意识形态，而放弃了构建自己的主体意识形态，但是，即便如此，一些经典的西方史学著作仍然并不把俄国列入正统欧洲历史发展的范畴。直至今日，在俄罗斯作出了这样巨大的努力、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之后，欧美国家的政治精英，包括民众，依然基本上将俄罗斯视为异类。究其原因，除了来自西方的问题之外，对于俄国而言，如何学会以既独特、同时又具有普适性的语言来解读自己的历史，然后使之能够自立于国际文明的殿堂，力争首先在学术上与西方文明进程平起平坐，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除此以外，和本题密切相关的文明多样性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学理上加以证明的问题。只有证明了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合理性，中国、俄国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才能够真正被确认。但是，对于文明多样性的肯定，同样不能够排除对于文明进步性的考量。当年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特为了证明文明的多样性和进步性这两者之间的相容关系，就曾花了极大的气力来研究原始人类的思维结构，而且，他自认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可见，要从理论上证明文明多样性和进步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二、“天下体系”和“结合部文明空间”的机理所在

“天下体系”和“结合部文明空间”这两个范畴，我觉得是在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的当代国际发展战略中起着深层次作用的核心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形成背景和内容指向，有着绝大的差异。但是，是否有可能在这两个很不相同的范畴之间形成沟通，乃至寻求发展合作的深层机理，依然是与当今中俄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

首先来说中国的“天下体系”。

从对于“和谐社会”的思考与传播开始，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此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体系”联系起来。的确，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对外事务的看法是一个包孕宏大的整体，它的表述尽管充满了一般哲理的宏阔，它的着眼点也不同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的阉阉，同时也难以避免在世界各地古代文明早期的初创阶段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关于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关于对外战略中的智慧运用、关于适用于国际事务宏观治理的一系列原则与规范，对于中华文明的承袭和发扬，对于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尊严的维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被称为“天下体系”的国际秩序观，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对国际政治思想提供独创性范例的一个重要源泉。剥去其外在的种种依附物，“天下秩序”不同于

西方式的国际政治思想的一个关键之点，乃在于这是一种超越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或权力界限，超越不可知世界的认知界限，着眼于跨越国际社会的主、客体关系中人为阻碍的一种天生乐观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主张更多地依赖于教化和善治（可理解为“王道”）来构建国际秩序。“天下秩序”作为一种外在的体制构建，其内在意念上一个关键性的哲学基础乃是“天人相合”，而不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天人相分。”在中国古代圣贤来看，世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是一种可以相互转换、互相融通、天下无人不能达获的境界。中国古代这种以乐天知命为基础的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与西方文明背景下，特别是基督教文明背景下，人受不可知因素所支配、以及人与外在世界（上帝）之间紧张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这种对于外部世界的理念也完全不同于世俗意义上的对于外部的扩张，相反，是以天下为己任，超越了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在思考外部世界的稳定、修齐和福祉。

作为这样的“天下秩序”的内部自我要求，乃是“厚物载道，自强不息”，亦即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地宽厚待人，而同时又通过世代相传、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作为这样的“天下体系”的外部表现，则是“天下昭明”、“协和万邦”，意即通过教化而明达是非礼仪，最终形成一个与天下各邦各国都和谐相处的国际社会。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完全不同于仅仅通过外部的竞争而划分出一时之长短的弱肉强食型的生存竞争理论，更不同于现代西方观点中的“文明冲突”理论，而且也远远不是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后的所谓“朝贡体制”所能够完全涵盖的思想内容。

诚如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与中国问题专家勃朗特雷·沃马克最近所言：“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天下体系’为统辖全局的思想态度，至少是显示了这一见解乃是属于自己所在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宣示并非没有实质性内容，恰恰相反，这一宣示体现了两种文明的特征所在”<sup>①</sup>

而从俄罗斯的“结合部文明空间”的范畴本身来看，首先，这并不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体系”那样，是在长期文明积累与交往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认知观念。“结合部文明空间”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从罗斯时期，甚至于从多神教时期就开始存在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是，显然这种环境状态又对俄罗斯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行为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直至今日。

“结合部文明空间”范畴的要害首先在于“地缘空间”。俄罗斯作为一种伟大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于它的无可比拟的广袤地理空间。这种无可比拟的自然历史禀赋，给予了俄国人寻求发展和安全自保的无限巨大的挑战和生机。这样

---

<sup>①</sup> Brantly Womack,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ing, Conference Paper, Aug. 2009.

的一种自然空间的拥有，在制度创设上，使其可以在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的不同谱段上进行多样化的创造，一旦发生障碍便有着充分的转换与调整的余地；这样的一种自然赐予，又使得俄罗斯具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使其能够在面对强敌时，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左右折冲的回旋余地；从最直接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辽阔空间是其民族生存的最为可靠的安全屏障，当年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虽打进了俄罗斯但最终都不得不狼狈逃窜的结果就是明证；当然还包括这老天赐予的如此丰厚的自然战略资源，使其几乎是享用不尽。

“结合部文明空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在于，它是文明交叉和相互融合的枢纽地带。世界上很难找到另一个有如此复杂而又如此丰富多样的文明、宗教、民族、语言相互交汇的辽阔地带。这样的一种状况不光使得今日俄罗斯的内部国家构建依然保存着既有东方、又有西方的文明烙印，而且，也使得俄罗斯人始终持有要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桥梁”的宏大抱负。<sup>①</sup>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近似之处在于：第一，两国都拥有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与经典的西方理念不同的理念，即非严格意义上以权利或利益为界限，而是或者以天下为己任、或者相信教化功能的超越性；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外部世界的行为的出发点并不简单地在于民族国家，而较多的倾向于文明和文化；第三，两者也都强调多种文明之间的融通，强调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贯通。

简而言之，在高度关注两国文明背景中的差异（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差异）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相互融通的积极因素，是当前推进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三、中俄关系中的“均势外交”

俄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便是她的“均势外交”传统。无论是彼得大帝的“北方战争”时期，还是维也纳同盟中的俄国外交；无论是20世纪前期老一辈革命家列宁、斯大林的对西方外交，还是俄罗斯时期普京在东西方之间的长袖善舞，俄罗斯善于在不同的对手之间寻找自己的战略定位，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中特别强调了俄国外交非常习惯于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运用矛盾关系来取得自己的战略成功。

从春秋战国开始的复杂而丰富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包含着对外事务中的战略

---

<sup>①</sup> 参见[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和技巧的运用。比如，“合纵连横”式的中国古代战略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实践中，有着丰富的运用“合纵连横”式的均势战略的案例，特别是在大国关系中的运用。

虽然，中国并无太多现代多边外交的经验，但是，有两条宝贵的经验值得关注，一是对于我们曾经紧密结盟过的伙伴的信任与友谊，尽量地使之能够成为可持续的外交关系；二是“合纵连横”式的外交战略并不仅仅是一切以利益为转移，而是恪守道义原则和以国际社会的公利为前提。基辛格曾经提出：“神圣同盟是维也纳会议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入道德的限制。”换言之，在基辛格看来，保持均势的意义在于：“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会走上的冲突之路”。基辛格对于他最为尊崇的梅特涅的评价恰恰是在其均势政策背后的道义原则：“他（梅特涅）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sup>①</sup>。

梅特涅与基辛格的道义原则未必能够付诸实施。但是，就今天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而言，特别是在国际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年代已经过去之后，在世界各国都互为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在多边外交的场合中，包括出于商业利益、或者是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展开必要的竞争的背景下，这样的道德原则的强调尤为重要。这里对于道德底线的考虑，至少应该包含对于任何伙伴国家和外交对手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稳定状态的尊重。

正当中俄关系中出现了多边竞争的复杂局面的时候，上述原则尤其值得重视。

#### 四、民族国家构建和中俄关系

民族国家的构建至少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体，一是政体。从学理上说，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同于一般民族国家的建构，她们都是一个众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新型共和国建构，但同时，它们又践行着以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为榜样的艰难学习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都有着不同于西欧式民族国家大都以单一民族为背景的国情。

冷战结束的时候，作为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苏联垮台于顷刻之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稳固地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中国式的民族结构所起到的聚合作用，是当时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及其重要的背景。如果与苏联相比较，中国式民族结构的一个基本特点，乃是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汉文化的发展水平。在

---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页、第65页。

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为中华一家的文化共同体一起作出很大贡献的背景下，客观地说，汉文化要比其余民族的文化来得历史更为悠久、积累更为深厚、对于国家政治构建的物质和精神供应更为直接。而对于苏联来说，作为其多民族国家核心部分文化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近三四百年中有着卓绝的发展，并且领先于其他民族的发展，但是，地处四围的民族地区，从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一直到高加索地区，无论是从文化的悠久、还是引进西方文化的先后，都要早于俄罗斯本身。即便是中亚，虽然其开化程度远不及俄罗斯，但是其历史却远比俄罗斯悠久。笔者的研究以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外在的、客观的重要背景。这样一种客观的民族结构状况，天生地决定了中国会比苏联更加能够经受历史变迁的重大冲击。

中国式的民族结构从理论逻辑上说，应该有比其他地区的民族结构更为阔大的胸怀、更显丰富的内涵和更加远大的目光，也因此，应当能够经受更大的风浪和考验。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如何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提供借鉴。

中俄两国国家构建的另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冷战之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峰回路转，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俄罗斯式追求民主的莽撞试验提醒着一切有志于改革者，需要以相当的谨慎和耐心去推行民主政治的进程。而时隔数年之后，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政治格局的趋近又表明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历史表明，人类历史上任何政治变迁的暂时挫折都无法消弭人们提高政治文明水平的夙愿和不懈的努力。

## 五、中俄关系与区域主义的发展

中国人对于区域问题的理解可能起始于世纪之交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所谓的“朝贡体制”。当时，东亚地区，严格地说，是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陷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日本和俄国则双雄并立，并且，在后一场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的崛起，被当时的东亚各国视为是“亚洲的胜利”。当时孙中山先生鼓吹“大亚洲主义”，企图以此推动宪政革命和东亚的复兴。但是，好景不长，在世纪之交俨然“脱亚入欧”的日本马上成了反过来镇压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罪魁祸首。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也随着二战的结束很快成为了历史的泡沫。

二战以后的区域化进程，中国的真正参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好在当时的区域化进程也刚刚起步。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之作出贡献，而同时，中国又是这种区域化进程的受惠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对于中国来说，区域化的进程涵盖了东北亚次地区、中亚次地区、以及东南亚

和南亚次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地区冷战局面的开始终结要大大地早于欧洲（以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突破为标志），但是，这一地区冷战局面的最后终结，却还未见尽头（这一地区还存在着两个尚未最终统一的国家，并且，这一地区还残留着与世界大战和冷战紧密相关的边界问题）。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建构与地区合作进程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二战结束之初德国一分为二，是与作为欧洲共同体最早组织形态的欧洲煤钢联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要害是，通过包容往昔对手的做法，把对手融合在共同利益的框架里，谋求共处与发展。而德国的最后统一，又是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欧洲共同体变为欧盟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关键性启示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是非常可能与区域化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的实现——这一国家建构的含义既包含着对外而言的统一，也包含着对于内部而言的国家认同的牢固确立——是与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的。

换言之，国家建构、尤其是国家的统一，必得是在与区域进程的良性互动中才能够实现的一个复杂过程，包括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

与区域相关的还有次区域秩序的构建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日本、与俄国取得大体相当的实力而同时雄居于东北亚的态势，为史所未见。这就非常紧迫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以怎样的次区域体制安排来协调各国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允许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资源重新配置，而不需要象百年前列强纷争那样大动干戈。同时，从理论上说，虽然，冷战后的东北亚残留着冷战的痕迹，但是国家建构与地区进程的紧密互动这样的历史先例，又给出了区域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出现良性互动这样一种可能。所以，当俄罗斯、日本、中国这三个巨人同时鼎立于东北亚地区之时，这就意味着亚洲，首先是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正在面临着一种历史性的机遇与考验。

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推理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前景是否能够实现，无疑还有赖于来自各方的真诚努力，以及客观情势变化所提供的条件。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和俄罗斯如何将成功处理双边关系的经验转化为构建地区合作框架的努力。

## 六、中俄国内体制变迁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

对外关系与国内体制变迁的互动，乃是当今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其关键问题是，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作为转型国家的俄罗斯是否可能、

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共处于同一国际体制与秩序之下。

从目前国际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大体有这样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新保守主义的意见，其代表性人物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按照他 2008 年 4 月在《New Republican》上发表的一篇长文“历史的轮回”的观点，第一，“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 21 世纪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以俄罗斯、中国等国为代表的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和以欧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展开阵营分明的斗争。该作者在 2008 年稍后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到：上述观点的标志是 2008 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和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这两件事的同时出现（笔者注：真是难得的奇思妙想！）。卡根提出，甚至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认为：“多年来第一次，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真正的竞争性环境”。第二，卡根认为，在宏大战略问题上，已经不再有一个国际共同体可供召唤和领导，大国之间几乎谈不上什么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相反出现的是猜忌和日益加深的敌意。第三，卡根提出，国家财富能够和独裁统治并存，紧密的贸易关系也无法阻止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全球独裁大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重新抬头正在削弱自由国际秩序，民主力量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作为美国新保守派中坚人物的罗伯特·卡根的上述言论，是其长期以来的一贯思想的表达，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sup>①</sup>显然，在他看来，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所谓的“新冷战”时期。

而与此相对立的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翰·艾肯伯利则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他的一整套另一种观点。艾肯伯利认为：第一，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终结美国一国独大的单极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定是以暴力的权力之争或推翻西方制度。第二，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和以往的国际秩序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亦即现有的由美国主导制订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因为，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而且，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第三，正是这套秩序导致了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并且使得前苏联也开始改革，而没有酿成世界大乱。第四，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订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与罗伯特·卡根相比，约翰·艾肯伯利的理论逻辑确非常清晰。可以认为，如果说，卡根是个主张以实力争胜的悲观主义者，他强调的是俄罗斯、中国等国与西方必有一搏，那么，约翰·艾肯伯利并不同意整个世界正在重新划为两半、专制和独裁正在殊死斗争的说法，相反却是乐观地相信现行的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认为在中国（包括俄罗斯）和西方

---

<sup>①</sup>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New Republikan*, vol. 4, 2008.

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sup>①</sup>

这两位具有很大影响的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不同观点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相同的重要命题，即确认“制度”或者“体制”因素在当前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卡根看来，如若体制相容，则既定国际关系格局能够维持；如若体制相悖，则一场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而在艾肯伯利看来，国际体制的强大足以容纳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东西方之间能够两下相容。

历史表明，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即具有成熟体制的主导国家和具有新兴力量和转型中体制的后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能是第三种方式，亦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式的“嵌入”；同时，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未来的成熟市场与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将来的国际秩序和体制完全可能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由两种经验——成熟市场与民主和发展中和转型中经验相互融合之后的再创造。

就发展和转型中国家和地区而言，鲜有在被主导国家进行“开发”和“引导”之后，能够完完全全地成为“想其之所想”的后来者。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遗产和现代化的轨迹都必不可免地在他们与主导性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就中国和俄罗斯而论，在这样一种没有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传统、没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没有市民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几百年的遗产、也没有经过工业化与近现代国家体系发展培植与熏陶的古老农业社会，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走完西欧社会以往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而且既要改变贫困局面、完成国家构建，同时要全盘接受欧美整套的价值系统，这几乎是盲人痴语。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向一切先进文明认真学习。

从先是主张维新，后是主张立宪的张之洞的名言“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直到邓小平所主张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的一条历史与当代互动、内部进程与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中来构建新秩序的思想路线。

然而，在俄罗斯，普京有一句名言：俄罗斯不打算推行任何俄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符合国际规范。当然，任何国际规范在俄罗斯的实施，必须顾及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表达，传递的却是内在相似的要求在体制变动和外部秩序构建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俄之间的合作真还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问题是首先需要双方的深入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责任编辑 黎洮）

---

<sup>①</sup>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8.

专题文稿·俄美关系

## 重建而非仅仅重启： 对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利益\*

谢·卡拉加诺夫\*\*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美关系迅速恶化并深陷危机的基本原因是：美国忽视俄罗斯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俄希望西方承认俄罗斯及其建立的安全体系；俄美对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文章强调，奥巴马“重启”战略几乎没有涉及对俄罗斯具有头等意义的重要战略利益。俄美最主要的利益不在双边关系领域，而是在与第三国的关系方面。本文认为，俄美如不开展建设性合作，就无法落实各自的利益。因此，俄应建议美不是“重启”，而是重新调整美俄关系，在两国根本利益和优先方面的基础上与俄做一笔“大交易”。

**【关键词】**俄美关系 重启 重新调整 大交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013-(21)

### 一、新的国际背景

#### 1.1 俄美关系正在与冷战时期或紧随其后的转型时期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发

\* 本文为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与俄新社为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美会议起草的报告“Reconfiguration, not just a reset: Russia's Interests i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俄方于会议前夕（2009年6月25日）将此稿提交给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交流并授权《俄罗斯研究》发表中文译文。本文主要内容曾同时发表在俄《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第4期。

\*\* 本文主要执笔人为：瓦尔代俱乐部专家会议主席、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谢·卡拉加诺夫（С. А. Караганов），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季·博尔达切夫（Т. В. Бордачёв），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德·苏斯洛夫（Д. В. Суслов）。

展。这一新的形势具有如下特征：

——国际关系的可控性下降并日趋主权国家化，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危机加深。大国无法操控跨国界的经济、政策和安全领域问题。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全球治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兴的强权力量不受美国控制，不属于、也不愿从属于西方（美国）秩序；

——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心迅速由欧洲—大西洋区域转移至亚太地区。欧盟作为外交共同体的角色日渐削弱。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仍不成熟，阻碍主要源自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以及它们不愿增加自身国防开支，并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责任。因此，尚不能将欧盟视为世界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此外，中国正在飞速发展，其对外经济扩张加深，政治影响力加强。美国的利益中心也正在转向亚太地区；

——第二轮核武器扩张势头（继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之后）可能无可避免，必须设法控制和调节；

——海湾地区、中亚地区和中东地区正成为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问题区域，是威胁国际安全体系的主要源头，其主要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张、国际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中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地区是地区动乱的温床。

1.2 国际秩序最重大的变化是美国建立单极霸权企图的垮台。美国曾希望借助后冷战时期的“单极空隙”，建立一个几乎完全有利于美国的国际体系，该体系将以“软”霸权为基础，向世界传播美国民主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美国这种企图控制世界，建立单极霸权，应对世界安全领域新挑战和新威胁的“美梦”如今业已“破碎”，而且其自身正陷入危机中不可自拔。美国的盟国体系受到了削弱。

1.3 国际关系已进入后霸权、非西方时代。该时代的特性目前尚不明晰，将取决于大国间的博弈。当下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和建立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目标，都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安全领域危机的解决和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的目标，又与俄美关系和俄美中关系的有效发展密不可分。

## 二、新时代的俄罗斯和美国

2.1 前文提到的国际秩序新变化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世界影响力，这种削弱即使在将来，可能也只会部分得以修复。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综合实力上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任何建立将美国排除在外、或以其为对手的新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将继续受到美国的遏制。美国仍将是维护世界稳定和秩序

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与此同时，美国已基本丧失其“单极霸权”。

2.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以其经济和政治优势逐渐增强自身实力，提高国际影响力。然而，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似乎已至极限。

2.3 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俄国内未完成的社会—经济转型，俄罗斯能否维持去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保住占全球 GDP2.5%的成绩，成了一个未知数。俄罗斯未来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的大小将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改革的实现、向创新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高效政治体系的建立。以上几个方面的成功不仅将极大地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还将使其成为后苏联空间内更具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 三、俄美关系

3.1 过去几年内，俄美关系持续恶化，至去年夏秋两季进入 25 年来的最低谷，一度面临出现系统性对抗的风险。2001 年“9·11”事件曾为两国提供合作机会，联手对抗恐怖主义，但双方并未抓住该契机。相比 1999 年北约侵略南斯拉夫以及其后的 2000-2001 年危机而言，2008 年的俄美关系恶化情况甚至更加严重。

3.2 冷战和随后华盛顿建立对世界支配地位的企图（起先是通过“软的”手段，乔治·W·布什任总统期间是“硬的”手段），使得美俄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其中俄罗斯对美国的不信任更甚。双方一度将寻求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视为政治错误，且拒绝承认存在冲突之外的共同利益。

- 俄罗斯政治精英坚信，美国利用并企图延长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面临的困境，其所谓的“推广民主”纯粹是企图制造一批从属于美国发展模式的国家，从而为美国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此外他们还坚定地认为，俄罗斯对美国表达的任何友善举动都不会带来回报，而仅被美国视作理所当然，并使其“胃口大开”。俄罗斯精英中的大多数人不再认为在开始调整的与美国的建设性关系中会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这对俄罗斯的现代化和其地缘政治地位的加强有明显的长期利益。
- 美国不满于俄罗斯拒绝服从其霸权统治。美国心存幻想地认为，如果俄罗斯再次衰落，就可以复活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两国关系模式。美国对俄罗斯政治体系的不信任是显然的。

3.3 过去几年内俄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主要是由于美国不愿考虑那些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的利益攸关点，具体如下：

- 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主要优先方向的后苏联空间的发展。俄罗斯有意重新



实现该空间的一体化，希望大多数独联体国家能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和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此外，俄罗斯还有意在独联体国家的能源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相对地，美国意图通过批准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或与其建立双边伙伴关系（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远期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方式，达到分裂该空间和把独联体国家从俄罗斯身边拉开的目的。华盛顿还积极抵制俄罗斯巩固其在独联体国家能源工业中的地位。

- **欧洲安全体系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终结在欧洲实际仍存在的冷战至关重要，然而北约的扩张无疑表明冷战并未结束。

俄罗斯希望在构建欧洲安全秩序问题上发挥应有的影响，并渴求掌握解决欧洲主要安全事务问题的决策权，还希望西方承认俄罗斯和俄罗斯主导的安全体系（即 CSTO），并将其看作是 与北约处于平等地位的共同构建欧亚安全空间的要素。

但美国的利益追求却是将北约培养成为大欧洲的中心组织和欧洲安全体系的基础，从而确立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掌控。为此，北约持续扩张，直到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那些无法加入北约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美国则希望与其建立“次级合作伙伴关系”。

- **俄罗斯和美国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 俄罗斯将自己视为多极世界的一极，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和发展模式制订国内和对外政策。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则归结为重建单极霸权。两国都否定对方对自身地位的定义，这主要体现在：

——对保持双方核武器实力平衡的看法不同。俄罗斯将拥有核武器看作其军事安全的基础和在世界上发挥影响的重要筹码，以及与美国平等对话的最重要资本；但美国却认为这是其确立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军事优势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这也就解释了两国对于导弹防御系统的异见。一旦美国能抵御他国核武器的威胁，那么俄罗斯核力量的威慑作用就可能减弱，甚至消失。

——对冷战结果的不同看法。俄罗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冷战的失败方，因此认为应当平等地与西方一起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则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获胜者”，认为这一“胜利”证明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是普世的，应当被传播到全世界。

### 3.4 过去 10-15 年内俄美关系恶化的其他原因：

- 美国的单极外交政策（尤其是布什当政期间）；

- 美国企图独霸战争和和平事务的决策权，并削弱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
- 美国企图修改国际法中有关武力使用和国家主权的相关内容；
- 美国致力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民主，尤其针对前苏联国家，其采取的方式通常是支持独联体国家中最激进的反俄势力；
- 俄罗斯与反美政权建立政治—军事合作（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和古巴）；
- 美国企图遏制俄罗斯在能源市场上影响力的扩大；
- 进攻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这使俄罗斯政治精英意识到需要应对新环境下的军事—政治威胁。

3.5 至 2008 年夏秋，俄美合作关系已严重削弱，双方在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都无法展开对话，诸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护阿富汗稳定、对抗国际恐怖主义。而对于许多国际事务的解决，双方也各有不同看法，诸如伊朗、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科索沃和中东问题。

3.6 一些负面事项被显著地扩大了。在 2007 和 2008 年，俄美关系出现军事—政治对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 ABM 系统。作为回击，俄罗斯威胁退出《中导条约》(INF)，并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俄罗斯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决定，则是回击北约扩张和美国利用该条约向其施加压力。这引起了欧洲的广泛讨论，担忧出现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3.7 俄美合作的机制基础严重丧失。事实上，两国政治对话目前仅存在于各种双边和多边峰会上两国领导人间的私人交流，而两国的官方对话机制或是不存在，或是仅限于正式的外交途径。因此，两国外交部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已丧失了交流能力，甚至不认为有必要互相配合。

3.8 由上可见，两国关系发展累积了大量难以消除的互不信任，而要解决此问题，需要的是极强的政治意愿和有效的合作途径。

## 四、机遇之窗

4.1 俄美关系新的机会之窗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际关系出现了质的变化（主要是美国霸主地位陷入危机以及新兴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正在显示出与穆斯林世界、伊朗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区域发展关系的新姿态，并努力克服困难，修改过时和不成功的相关政策。

4.2 美国暂停了大量影响俄罗斯利益的对外政策计划。

- 北约停止了向前苏联国家的扩张，这主要指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虽然此扩

张计划并未完全从美国的日程中剔除，但相比布什政府而言，奥巴马政府并不强迫其盟国加速完成北约扩张。自 2008 年 8 月军事冲突发生和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独立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计划即被长期搁置。乌克兰同样面临着无限期的等待。

- 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基地的计划发展趋势则尚不明朗。奥巴马总统及其主要官员都对实施该项目（甚至是整个反导计划）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但却并未就终止部署反导系统作出正式决议。

4.3 今年年初，美国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提议双方“重启”合作关系。该提议目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 达成新的裁减和限制攻击性核武器条约，以取代即将于今年 12 月到期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1)。双方有望将核武器数量削减至 2002 年《战略进攻武器削减条约》(SORT) 规定的标准之下（各持有 1700-2200 个弹头）。此外，奥巴马总统还提议，将完全消除核武器（即所谓的“无核世界”）作为长期目标。
- 达成私下协议：美国停止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基地，作为回报，俄罗斯全力支持美国的伊朗政策。也就是说，俄罗斯必须放弃与伊朗的政治和外交合作，不再在国际原子能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内对其表示支持，同意对其进一步制裁，并向其施加更强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使其面临国际孤立。

4.4 “重启”合作的提议具有正面影响，表明美国对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意识到，忽略俄罗斯或与俄罗斯为敌都不利于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并将严重削弱其外交政策的执行。此外，尽管奥巴马政府首先“抛出”的“橄榄枝”对俄罗斯而言并不那么值得接受，但其准备与俄协商合作的态度值得肯定和欢迎。

4.5 “重启”关系的实际执行结果可能制造出更多的不信任因素，甚至最后不能改善双边关系。这主要是指削减核武器的问题。此外，“恢复”合作涉及的领域有限，而且经过精心挑选，几乎不包括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利益相关点。

举例而言，北约在中长期是否继续向独联体国家进一步扩张并不明朗。美国对俄罗斯有关重新起草欧洲安全条约的提议持谨慎态度。俄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也都未涉及，如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问题、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欧洲安全体系的性质问题、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问题等等。实质的关系“重启”如果不是建立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上，将很难实现。

4.6 如果两国（或其中一国）不认为双方关系的改善能服务于其核心利益，那么刚打开的“机遇之窗”将迅速“关闭”。

4.7 为此，俄美双方必须尽快消除消极因素，采取发展合作的全新的、积极的

计划。两国不应只关注那些狭隘的，甚至有时互相对立的有选择性的独立项目，而应更关注双边关系实质性的“重建”。双方必须建立如下合作准则：任何一方政策制定和执行不能威胁到另一方的关键利益诉求，双边合作的开展应有利于双方关键利益的实现。此外，双方应藉由发展经济合作，形成正面的相互依赖关系。

## 五、俄美两国利益

5.1 深入分析俄美两国主要利益诉求后可以看到，双方最重要的利益存在于各自与第三方的关系中，而非两国双边关系中。美国的利益重点包括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朝鲜和中东。俄罗斯的利益重点覆盖所有后苏联国家，首先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在欧洲版图和欧洲安全体系内的作用和角色。

此外，诸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气候变暖等与两国有关的国际性问题也是两国重要利益立足点。

5.2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俄美之间存在着负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在地区性问题上。双方都有相当的能力向对方施加外交损害。比如，莫斯科可以在许多事务上（如阿富汗和伊朗问题）妨碍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同时，美国也可以在甚至更广泛的事务范围内阻碍俄罗斯利益的实现，尤其是涉及欧洲和后苏联国家的相关事务。

5.3 俄美两国的平行、共同、相关利益主要包括：

- 防止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不稳定，尤其要防止大国间爆发战争；
- 缩减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扩散，尤其要阻止伊朗掌握 WMD；
- 建立多极的核武器平衡；
- 维持阿富汗的稳定；
- 维持巴基斯坦的稳定，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
- 解决朝鲜核危机；
- 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核恐怖主义；
- 2009 年 12 月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1）到期后，防止出现政治和法律真空；
- 将中国作为维持现状的强权（Status quo power）纳入国际秩序；
- 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尤其在美国撤军后，并防止伊拉克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安全港；
- 维持大中东地区的稳定；

- 确保太空安全；
- 防止气候变化；
- 打击毒品贸易、海盗和有组织犯罪。

然而，这些共同利益对俄美两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和先后次序。对一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利益点，对另一国而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即使某项利益诉求恰巧对两国同样重要，该诉求也只是次要重点。此外，所谓的共同利益在具体实施上仍有分歧，特别是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伊朗问题、中东冲突和国际反恐问题。也就是说，俄美以上相关利益可视为平行的，但并不总是共同的。

5.4 对俄美切身利益的分析表明，双方没有重叠部分，双方切身利益关注点着眼于不同的领域，或者具有根本不同的重要性。

- 美国的切身利益包括：确保体面地从伊拉克撤军（仅保留象征性驻军）、维持阿富汗稳定、防止巴基斯坦垮台、以及最重要的防止伊朗掌握核武器，以确保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与美国相比，上述领域对于俄罗斯而言并非特别重要。
- 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包括：在从白俄罗斯到高加索的地区内维持实质的主导力、防止其与他国结盟，尤其是防止北约对这一地区的扩张。这种扩张预示着一连串的地区冲突，和可能引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美国在上述领域的利益刚好和俄罗斯对立，从而使之成为俄美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然而，这些问题（主要是北约扩张）对于保证美国国家安全而言并不重要。阻止俄罗斯重新掌握对后苏联空间的支配地位确实是传统的美国欧亚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实现该利益诉求、支持独联体国家独立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要使其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或使其与俄罗斯彻底背离。

5.5 再者，俄美利益冲突还体现在涉及国际秩序新变化，以及两国在新秩序中的角色地位的问题上。主要包括：

- 美国霸权的未来（尤其是军事方面）。
- 美国未来重建霸权的可能。
- 联合国安理会未来决策战争与和平事务的能力，即其在全球政治治理中的作用。
- 国际法的演变。
- 西方民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5.6 尽管俄美两国的切身利益并没有重叠，但建立相互间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俄罗斯，都是至关重要的利益立足点。这对俄罗斯尤其重要，尽管多数俄罗斯政治精英尚未完全理解这一点。

5.7 到目前为止美国不能忽视俄罗斯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与美国相匹敌的核实力的国家，能够从物理上摧毁美国。但是，由于核武器不可能实际使用，而且俄罗斯的核实力正在削弱，所以这已不能成为美国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关系的立论依据。况且与俄罗斯的日渐衰落相比，美国则普遍被看作是无所不能的国家。

但如今的情况出现了微妙的改变。由于前文提到的全球环境的主要变化，虽然发展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关系对美国来说不像对俄罗斯那么重要，但它仍然被认为是美国关键的对外政策利益所在。

5.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作为两个核大国，其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构建将有利于限制核扩散，发展新的多极核遏制体系。此外，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终结，客观上加强了俄罗斯在维护阿富汗稳定、解决伊朗核问题等领域的重要性，而这些领域正是奥巴马政府勾画出的美国近期外交重点。在解决朝鲜核危机和中东冲突问题上，俄罗斯也将发挥关键作用。最后，由于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并挑战着美国霸权，因此俄罗斯对美国的重要性又增加了。

5.9 对俄罗斯而言，发展与美国的积极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外交政策的切身利益。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将严重削弱俄罗斯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 美俄间的密切合作与交流，对于消除欧洲冷战遗产、构建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欧洲安全体系至关重要。
- 如果不能保持与美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俄罗斯将无法确保周边地区稳定。俄美间的持续冲突将促使后苏联国家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寻求平衡，并利用双方的冲突，而这反过来又会促使美国为反俄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 如果不能保持与美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俄罗斯与欧盟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将被削弱。俄美关系的紧张将威胁到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建立正面合作关系，并使欧盟在军事、政治上更加依赖美国。俄美关系的紧张还将使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失去弹性。
- 与美国一样，防止不扩散体系的崩溃，发展多极的核遏制机制也是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尽管这对俄罗斯而言并不像对美国那样重要，但如果没有与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建设性合作，这些利益就无法实现。
- 发展与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的世界领袖——美国的合作关系，将使俄罗斯获得关键技术、优化长期经济投资，使俄罗斯更易于进入国际市场（钢、核燃料和军事物资），加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机构（IMF 配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力。

5.10 在国际秩序出现新变动的背景下，俄罗斯和美国必须互相扶持，解决诸多重大问题。这关系到二者的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与他国相比，俄罗斯和美国的核实力依旧遥遥领先。尽管双方的合作并不能保证带来核安全，但是核领域的稳定无疑主要取决于俄罗斯和美国的政策，及其相互合作的程度。

5.11 尽管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仍存在诸多不对称，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某些领域已经出现利益重叠。这意味着合作能给双方带来利益。

## 六、如何对待奥巴马的建议？

6.1 奥巴马政府清晰、明确地提出了“恢复”与俄罗斯关系的具体方法，最主要的途径是合作把战略性武器数量减至最低，并以“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鉴于俄美双方当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相互不信任，这种“旧计重施”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

核武器问题由于今年 12 月 START-1 的即将到期而变得迫在眉睫，也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区别于布什政府的典型。与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强调削减核武器数量，加强该领域的多极机制，以及考虑合作者的利益。由于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必须关注 START-1 到期后可能出现的政治和法律真空，因此奥巴马的此番动议看似恰好“照顾”了俄罗斯的担忧。美国的国际威望由此提升。奇怪的是，对奥巴马倡议最大的支持来自西欧。

6.2 然而，有关削减核武器的提议可能最终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不仅不能“恢复”两国关系，还将为关系发展制造更多的问题。对两国核领域利益的比较分析表明，双方分歧大于一致。

- 俄美利益的吻合表现在，双方都承认身处当今急剧变化、日益不稳定的世界中，核力量是保证世界安全的基础：
  - 1、阻止“核俱乐部”成员无根据地使用核武器（这一可能性极小），
  - 2、防止恐怖分子掌握核武器（这一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威胁来自巴基斯坦、朝鲜和中东），
  - 3、鉴于不扩散机制的削弱，积极构建多极核遏制机制。
- 俄美不同点在于，核武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双方对其态度不同。俄罗斯将核武器视为其生死攸关的砝码，但美国因拥有常规武器技术和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希望减少，甚至完全消除核武器，这也有利于其自身利益。

6.3 国际安全领域至今因俄美双方大量持有核武器而维持着平衡，但一旦两国削减核武器数量，问题即刻可能出现。由于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在世界上拥有绝对

的优势，核武器的大量削减将使俄罗斯的核威慑力下降，从而威胁其国家安全，削弱其国际影响力。

此外，美国尚未明确声明放弃反导计划，如果大幅削减两国核武器数量，将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军事优势，使其变得几乎刀枪不入，这将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从而导致以往军事对抗的冷战心态的复苏。

6.4 由此看来，俄罗斯必须只同意小规模地削减核武器数量，至略低于 2002 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SORT）规定的水平。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后 START-1 协议中将新限额规定为 1500-2000 枚弹头。这可以在削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保障俄罗斯的核威慑力不至被削弱。

6.5 美国为“重启”与俄罗斯关系所提出的动议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只要俄罗斯同意与美国合作，劝服或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美国就同意中止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基地。这对当前的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该动议的实质是帮助地区影响力正在逐步削弱的美国，对抗与俄罗斯有密切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地区影响力正逐渐壮大的伊朗。而美国中止 ABM 计划的承诺却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不一定会兑现。

6.6 在上述问题上，协商的余地很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提议。然而，该问题的敏感性使其目前不宜公开讨论。总之，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美国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有法律约束为保障的前提下，俄罗斯才可以作出可能的妥协。

## 七、“大交易”

7.1 为了抓住 2009 年初出现的俄美关系改善的机遇，通过俄美合作实现双方的切身利益，俄罗斯应向美国提出一套改善双边关系的提案，这将比奥巴马的提案更具体、更广泛，并以奥巴马提案为基石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7.2 俄美关系的发展不应仅限于“重启”关系，而应是真正意义上的关系重建。俄罗斯的目标应是基于对俄美各自利益的分析，考虑两国在利益执行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互相间的重要性，从而在双方共同的关键利益问题上达成一致。只有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才可能催生建设性伙伴关系。

7.3 对俄美两国关键利益的分析表明，双方利益诉求重点不同。在某些涉及俄罗斯关键利益的领域，美国扮演着负面角色，但这些领域中许多都并非美国的利益重点。

美国某些关键利益的实现也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甚至有时发挥中心作用，而



这些领域目前也并非俄罗斯的利益重点。

由此得出如下建议：俄美双方就各自关键利益诉求交换意见，所谓的“大交易”（Big Deal）是指：双方在相对不重要的事务上作出妥协，致力于实现真正的关键利益。对俄罗斯而言，就是在美国关键利益领域提供积极合作；对美国而言，就是在俄罗斯关键利益领域取消消极政策。

7.3.1 执行“大交易”的过程中，为了在不损害俄罗斯关键利益的同时保证美国关键利益的实现，俄罗斯必须遵循以下步骤：

- 在阿富汗问题上全面支持美国和北约（不包括采取直接的军事活动）；
- 制定针对伊朗的共同政策，使国际社会能在为其提供政治和经济全套刺激方案的同时，对其施加可能的制裁，不排除使用武力，设法获取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参与；
- 支持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
- 支持美国解决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问题；
- 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
- 放弃通过武力重新掌控俄罗斯影响的历史区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除外）；
- 共同致力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消除核恐怖；
- 帮助美国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帮助中国继续成为维持现状的强权，使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7.3.2 对美国而言，“大交易”提供机会纠正其在后苏联空间和欧洲安全领域的政策，这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关键利益，还将确保俄罗斯的利益。政策重估应包含以下方面：

- 不通过北约扩张或建立双边军事政治关系的方式，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后苏联国家间挑起矛盾。这并不损害美国的关键利益，因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能与这些国家开展对话、支持其独立和主权等。只有当俄罗斯侵犯独联体国家的主权完整，并在后苏联空间建立霸权时，美国的关键利益才可能面临威胁。
- 相应的，美俄双方应当商定游戏规则，尤其是在后苏联空间的竞争规则和界限。双方必须明确将“红线”标明，任何越线行为都将威胁到对方的利益。主要的规则必须规定双方在后苏联空间的政策互相约束——这主要是针对美国；
- 不支持独联体国家的反俄人士和反俄政权，不鼓励这些国家制订公开的反俄政策；
- 以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后苏联空间内（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 遗留的“冻结冲突”;

- 找到发展独联体能源计划和能源合作的互利方案;
- 积极支持起草和签署由俄罗斯提议的泛欧洲新集体安全条约, 由此确立欧洲—大西洋空间内新的、适用于俄罗斯的“游戏规则”, 其中包括决策过程和规定;
- 赋予俄罗斯有关欧洲安全事务切实的决策权。这不会损害美国的关键利益。当今美国的关键利益在于保持在欧洲的军事政治存在, 维护北约作为西方和中欧主要安全机构的存在, 清除对于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威胁, 而非将美国的安全秩序扩张到欧洲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 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中东等的威胁将不可能被清除;

7.4 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初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如今国际关系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 以及美俄关系中相互联系领域的出现(尽管仍存在不对称关系), 使得妥协达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世界越是变得更危险和难以控制, 美俄之间的合作就越可能达成。中国力量的不断强大也将促使美国极力发展与俄罗斯关系。

7.5 “大交易”的实际执行将在长期可能催生**俄美战略联盟**, 共同面对国际安全问题, 主要包括: 核安全(不扩散和多极核遏制)、战略稳定、阿富汗等地区性问题和冲突。

7.6 双方妥协的达成, 甚至未来可能的美俄战略同盟关系的建立, 将极大地推动两国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 这些领域可能是客观上双方的利益趋同点, 也可能是双方可以达成利益一致的方面, 还可能是双方利益平行, 但限于当前双方关系整体低迷而无法展开合作的领域, 如能源领域合作、通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合作应对气候问题、食品问题等全球性挑战。

7.7 世界上其他几个力量中心, 尤其是中国和欧盟(后者如果能克服内部限制, 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主力军), 可以在诸多领域参与美俄合作。

尽管建立美俄联盟的设想可能过于野心勃勃, 但一旦成功, 这将成为“添加剂”, 并成为俄罗斯致力于与全球关键力量中心和主要外交、贸易、经济伙伴建立同盟关系的完成阶段——在能源基础上“与欧洲联盟”, 俄中联盟和俄美联盟。

最后, 必须建立起两个互相影响的“三角”, 才能保证治理的相对有效性: 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角”和欧盟—美国—俄罗斯“三角”。

三个联盟和两个三角的建立将是俄罗斯今后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这将保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保证俄罗斯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还将加强国际稳定和安全, 提升国际关系系统治力。

这一战略目标目前看似鲁莽，但长期看来是实际可行的。

7.8 短期内俄美双方无需牺牲太多利益即可成功完成合作的领域是：

- 就阿富汗问题开展合作；
- 就朝鲜核问题开展合作，在该问题上俄罗斯可以轻松地支持美国的行动，并可说服中国参与；
- 在承认摩尔多瓦领土完整及其立国法律地位的基础上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冲突。这种妥协也需要双方在重要战略利益上作出让步。

## 八、经济合作前景

8.1 俄美双方只有通过动态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从而最终形成正面的相互依赖，才可能建立稳定和积极的双边关系，并在长期形成战略同盟。此外，美国可以促进俄罗斯国内经济、社会现代化、帮助其发展以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同时提高其国家治理水平。

发展经济合作的前提是彻底取消杰克逊-瓦尼克（Jackson-Vanik）修正案，以及其他对俄罗斯出口和发展对俄贸易的限制，在和平的核合作基础上，重新发展双边关系。

8.2 能源领域合作可以成为俄美经济合作的重点。

- 其中，俄罗斯可以促进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基础设施发展，及其对美供应。俄罗斯还可以作为世界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市场的稳定力量，防止其他出口地区（波斯湾和墨西哥湾）出现供应中断。
- 鉴于迫在眉睫的全球原材料紧缺，俄美双方都应防止出现商品战，应该制订国际能源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发展规则。双方能源合作的主要领域包括：通过协调供求双方利益，联合规范市场；联合开发利用北极和北冰洋能源储备；联合开发利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能源储备。
- 双方在原子能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俄美可以联合开发新型反应堆，改善核安全体系，构建国际机制向核电站提供核燃料。该领域合作还可防止核扩散。
- 能源领域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开发再生能源，为能源对话和利用提供经济等支持，为新能源的推广做准备。

8.3 美国的任务如下：

- 帮助俄罗斯获取现代技术；
- 帮助分配俄罗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长期直接投资；

- 帮助俄罗斯加入世界金融和经济机构；
- 向俄罗斯开放世界军火市场更大份额；
- 消除针对俄罗斯投资的贸易保护措施等。

8.4 俄美经济合作较有保障的领域是农业。世界正面临粮食短缺，俄罗斯则拥有广大的适宜耕种的土地。此外，农业合作还可以促进俄罗斯农业现代化，从而增加对国际市场的出口。

8.5 俄美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共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双方采取共同的应对政策十分必要——可以避免出现经济利己主义。为此，俄美双方必须重估当前金融体系的基础，引入新的国际准则。事实上，这意味着发展全球化的联合治理。但首先必须解决信任危机问题，当前的问题主要涉及私人资本流动和政府基金的运用。必须采取的措施是协调各主要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他包括：

- 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 创建新的国际法规组织；
- 建立新的国际准则，用以规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 制订措施防止出现金融泡沫，包括在碳氢化合物市场上；
- 制订发展国债，包括储备和基金的政策；
- 防止国债失信风险；
- 消除贫困。

8.6 最后，俄美还应开展环境领域的合作，目标如下：

- 降低环境污染；
- 开发零污染、可循环技术和促进污染处理；
- 解决淡水问题；
- 构建后京都体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附录：

## 俄美利益比较

### 对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利益

#### 一、俄罗斯的关键利益

##### （一）长期利益

##### 1、俄罗斯经济、社会的综合现代化——国际地位的基础

在联合投资项目和某些科技开发等方面，美国能发挥一定的——但非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俄罗斯政治精英认为，不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阻碍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和强大，而另一些精英则认为这一关系不是阻碍，相反，是一个动力。

## **2、防止国际关系的持续不稳定，否则将威胁俄罗斯的现代化，并直接损害其安全利益**

美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不再起关键作用。客观地说，美俄利益是平行的。

## **3、提高俄罗斯在国际治理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联合国安理会、G8 和 G20）**

美国是重要合作伙伴，尽管对美国而言，这并非利益重点。

## **4、防止东西伯利亚和俄远东地区的落后带来的损失**

美国目前在此领域尚未发挥重要作用，但未来其重要性可能增强。

## **5、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以及美国反导系统的部署**

美国是关键的合作伙件。目前此点尚不是美国利益的重中之重；然而未来可能变得十分重要，而且美俄利益在这一领域是相对立的。

## **6、维持俄罗斯的核威慑力，保障俄国家安全，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美国在这方面并未发挥显著的作用，尽管减少甚至消除俄罗斯的核威慑是美国的关键利益诉求。在这方面，俄美利益完全对立。

## **7、构建多极核遏制体系，防止核扩散**

美国是保障这一利益的潜在的关键合作伙伴。尽管美国并未明确表达自身在这一领域的利益诉求，但这无疑是其关键利益。

## **8、防止与美国发生核战争**

目前，这项利益并非美国的优先考虑。美国在保证这项利益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 **（二）短期利益**

#### **1、保证独联体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维持和加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是主要合作伙伴，尽管该地区并非美国的利益重点，俄美利益在该区域基本对立。

#### **2、彻底清除欧洲冷战遗产。通过采用新的欧洲集体安全条约，保证并加快确立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平等决策权**

尽管起草该条约尚不是美国的利益重点，但美国是该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

#### **3、阻止北约扩张，防止俄罗斯边境出现危机**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北约扩张目前不是其关键利益。

## 二、俄罗斯的重要利益

### 1、限制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这也是其利益重点。

### 2、防止第三个 ABM 基地在中欧的部署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ABM 系统的部署不是其关键利益。

### 3、维持巴基斯坦稳定，防止印巴冲突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与俄罗斯相比，美国更优先考虑此问题。

### 4、将中国作为现实的大国和负有责任的全球领袖（利益相关者）纳入国际秩序

美国扮演着重要的、尽管还不是关键的角色，且将其视作重中之重。

### 5、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且将其视作重中之重。

### 6、解决朝鲜核危机

美国是重要合作者，且将其视作重中之重。

### 7、保证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世界政治问题的主要决策机构

美国是重要合作者，属于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

### 8、发展与欧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通过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俄欧能源、经济和政治联盟

美国在此问题上并非关键合作伙伴，属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目前来说，这具有负面色彩。

### 9、与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并不具有主要影响，尽管这属于其中等甚至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10、巩固俄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

美国发挥着消极作用，也许会转变成为积极角色。属于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

### 11、START1 期满后防止出现政治和法律真空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其对美国的重要性略低于对俄罗斯的重要性。

### 12、维持阿富汗地区稳定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是其最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13、保持与伊朗的互利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非决定性影响，属于其相对较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14、解决阿以冲突

在此方面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属于其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三、俄罗斯的次级利益

- 1、**获取国际范围内对维持南高加索现状以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承认**  
美国是关键合作伙伴，属于其低级别优先考虑事项，具有消极色彩。
- 2、**建立有利于俄罗斯发展的更加高效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管理机制**  
美国扮演主要角色，属于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
- 3、**支持遏制和抗衡美国的政权（叙利亚，委内瑞拉，伊朗等）**  
美国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属于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
- 4、**维持大中东地区的稳定**  
美国扮演关键角色，属于其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5、**应对气候变化**  
美国扮演主要角色，属于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
- 6、**打击毒品犯罪、海盗和有组织犯罪**  
美国扮演重要角色，尽管这属于其低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7、**开发北极资源**  
美国扮演着潜在重要角色，尽管目前这属于其低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对俄关系中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

### 一、美国的关键利益

#### （一）长期利益

##### 1、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对同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影响

俄罗斯发挥着中等程度的影响，属于其中等优先考虑事项——目前具有消极色彩。

##### 2、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阻止使用核武器的和其他形式的灾难性恐怖活动

俄罗斯是关键合作伙伴，属于其中等或相对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3、构建多极核遏制体系（这项利益客观存在，尽管至今还未被确认）

俄罗斯是关键合作伙伴，属其于高级别优先考虑事项。

##### 4、结束现存的美俄核武器互相制衡状态（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削减两国核武器数量和部署美国 ABM 系统）

俄罗斯是关键合作伙伴，维持现状是其最高级别优先事项。因此，利益方向的相互背离很明显。

##### 5、防止出现全球核战争

尽管这方面的利益对俄罗斯而言目前是相对较低级别的优先考虑事项，但俄仍扮演关键角色。

## （二）短期利益

### 1、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俄罗斯是关键合作伙伴，尽管这属于其中等或相对高级别的优先事项。

### 2、维持阿富汗局势稳定

俄罗斯可能是关键合作伙伴，尽管这属于其中等或相对高级别的优先事项。

### 3、从伊拉克撤军，但保证其与美国维持相对稳定和友好的关系

俄罗斯目前并未发挥决定性作用，属于其较低级别的优先事项。

### 4、维持阿以冲突地区稳定

俄罗斯可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属于其中等优先事项。

### 5、维持巴基斯坦局势稳定，防止印巴冲突

俄罗斯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属于其中等优先事项。

## 二、美国的重要利益

### 1、尽可能保证能源独立

俄罗斯可能扮演主要角色，属于其低级别优先事项。

### 2、将中国作为新世界的领导者之一纳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俄罗斯可能扮演主要角色，属于其高级别优先事项。

### 3、解决朝鲜核危机

俄罗斯扮演着主要角色，属其高级别优先事项。

4、与伊朗的“交易”：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可能，结束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放弃针对以色列的敌对政策，作为交换，美国与其建立积极关系，和加入“国际组织”

俄罗斯可能扮演关键角色，属于其中等优先事项。

### 5、保持美国多方面的全球军事优势

俄罗斯扮演着消极角色——从说辞或是从实践方面——属于其高级别优先事项。

6、在独联体地区推行“地缘政治多元主义”。抵制后苏联空间的政治和经济再整合，并为此目的推动北约的扩张

俄罗斯发挥着关键的消极作用，属于其顶级优先事项。俄罗斯和美国利益在此领域完全相悖。

### 7、俄罗斯作为次级合作伙伴加入西方（美国）的安全秩序

俄罗斯发挥着关键的消极作用，属于其高级别优先事项。

8、恢复和加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包括加强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解决



## 委内瑞拉和古巴问题等

在委内瑞拉和古巴问题上，俄罗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消极作用，但是未影响到美巴关系，属于其中等优先事项。

### 9、改革国际安全机构——主要是联合国

俄罗斯是关键合作伙伴，属于其较高级别优先事项。

### 10、最大限度地保持目前国际经济和金融管理机构

俄罗斯不是关键的合作伙伴，尽管它的作用可能会提升，属于其较高级别优先事件。

### 11、阻止气候变化

俄罗斯扮演着较为主要的角色，属于较低级别优先事项。

### 12、防止食物和饮用水问题升级

俄罗斯可能在此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尽管目前属于其低级别优先事项。

## 三、美国的次级利益

### 1、在波兰和捷克部署第三个 ABM 基地

俄罗斯在此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目前属于其顶级优先事项。

### 2、在大中东改变叙利亚的政策——特别是针对以色列的政策

俄罗斯在此问题上可能扮演关键角色，尽管（目前）属于其中等或低级别优先事项。

### 3、俄罗斯回归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体系，服从所谓的“伊斯坦布尔义务”（Istanbul Commitments）

俄罗斯在此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属于其高级别优先事项，尽管大体上立场是对立的。

### 4、俄罗斯不再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恢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维持其亲美政策

俄罗斯在此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属于其顶级优先事项，尽管双方利益对立。

### 5、俄罗斯承认科索沃独立

俄罗斯在此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尽管属于其次级利益。

### 6、打击毒品交易、有组织犯罪和海盗

俄罗斯在此问题上扮演相对主要的角色，尽管属于其相对低级别优先事项。

（于璐译，杨成校）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reasons of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and the

crisis of U.S.-Russian relations as follows: the United States ignored Russia's important geo-strategic interests; Russia wishes the West to recognize Russia and its established security system;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quite different views o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the world system.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President Obama's "restart" strategy involves almost no important strategic interest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ussia. The main interests of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i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third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t implement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out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Therefore, Russia recommends that the U.S. should not "reset", but re-adjust the US-Russia relations and do a "big deal" with Russia on the basis of their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Key Words】** U.S.-Russian Relation, Reset, Readjustment, Big deal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н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большая сделка»

---

(责任编辑 常喆)

## 论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竞争与合作

赵建明\*

**【内容提要】**伊朗核问题的出现为美俄的战略争斗提供了新的内容。美俄围绕伊朗的弃核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和有限的合作。美俄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现和作用最终取决于美俄伊战略关系。美伊敌对和美俄的战略冲突是主导这个战略三角的基本要素。由于美国在核问题上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而伊朗需要把俄罗斯作为屏障来防范美国的压力，从而使得俄罗斯在这个战略三角中处在两边谋利的地位。

**【关键词】**伟大博弈 伊朗核问题 战略三角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034-(11)

伊朗核问题曝光以来，敦促伊朗停止敏感的浓缩铀生产是国际社会的重大任务。尽管欧盟、中国、以色列也是对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但美国和俄罗斯是决定伊朗弃核的最重要力量。美国在敦促伊朗弃核问题上最积极，武力威胁和严厉制裁是美国的两张王牌。同时，美国也是决定欧盟和以色列对伊朗核政策的立场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同样肩负着让伊朗弃核的国际责任，但俄罗斯不同意使用武力和严厉制裁的解决方式。美俄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社会敦促伊朗弃核的关键因素。但是弃核最终取决于伊朗，伊朗将根据外部压力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来决定核发展的方向。因此，俄罗斯、美国和伊朗将是最终决定着核问题未来走向的关键国家。

### 一、美俄的“伟大博弈”与伊朗核问题

因为伊朗核问题将最终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和伊朗的三边关系。在这三边关系

\* 赵建明，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中，美俄双边关系是决定性因素，而美俄的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的主流。相对冷战时期，伊朗的实力和外交战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得伊朗不再成为美俄战略争夺的附庸或牺牲品，从而为三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元素。伊朗的实力增长让美俄伊三国的互动趋于平衡，这是伊朗寻求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伊斯兰革命后独立的外交政策取代了伊朗传统的第三方外交，即通过倚重大国结盟来维护国家的独立稳定。<sup>①</sup>

(一)从伟大博弈到“新伟大博弈”。长期以来，地缘冲突是决定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同苏联（俄罗斯）的竞争是海权国家英国与陆权国家俄国（苏联）的“伟大博弈”的继续。<sup>②</sup> 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衰落的英国充当起遏制苏联的任务。<sup>③</sup> 美苏竞争构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美国通过签署条约的形式，在东亚、东南亚、中东、西欧构筑了完善的包围圈来遏制苏联。<sup>④</sup> 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让美国的遏制网络一度出现了缺口，但美国的条约体系和包围圈总体完好。1979年苏联试图通过入侵阿富汗来突破美国的遏制防线，但侵略却成为加速苏联崩溃的重要因素，冷战最终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冷战后，压缩与维护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成为美俄战略竞争的主要内容。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外高加索—里海—中亚都成为美俄极力争夺的区域。这一地区同传统的中东也被称作“大中东”(the Great Middle East)。美国同俄罗斯的博弈演变成为“新伟大博弈”(new great game)。<sup>⑤</sup> 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在遏制俄罗斯问题上不遗余

---

① 第三方外交是伊朗的传统外交模式，主要原因是伊朗同北方邻国俄国（苏联）关系紧张，为遏制俄国（苏联）对伊朗的觊觎，伊朗寻求倚重德国、英国、美国来防范俄国（苏联）。参见 Rouhollah K. Ramazani, *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73: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Modernizing Nation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pp. 345-367.

② “伟大博弈”(the Great Game)源于英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的陆地地带东欧平原—西伯利亚平原是世界政治的中枢，俄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围绕这一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成为世界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70-172页，第186页和第189-191页。

③ 英国同俄国的战略争斗是18、19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英国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的满洲里四个方向充当着遏制俄国通往温暖水域的责任。参见马丁·怀特等：《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④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7-213页。

⑤ 苏联解体后美国同俄罗斯围绕欧亚大陆主导权展开竞争，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被称为“新伟大博弈”(new great game)。美俄的争夺地区涵盖前中东欧、外高加索—里海—中亚和波斯湾。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第170-172页，第186页和第189-191页。

力。克林顿在外高加索中亚地区推行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政策。<sup>①</sup> 小布什发动了两场战争和三次颜色革命并实现了美国在中亚驻军。<sup>②</sup> 同时，乌克兰等国反对俄罗斯控制其融入西方的政策也为美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美国积极支持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些都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造成极大冲击。<sup>③</sup> 对此，俄罗斯开展了一系列反制行动，美俄“新冷战”似乎再次浮现。<sup>④</sup> 但是，美国难以单方面在这一地区维持对俄罗斯的强势。由于俄罗斯的有效反制，美俄竞争的天平逐渐向俄罗斯倾斜，美国由战略进攻转到了战略收缩。

**（二）伊朗在美俄伊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在美苏战略竞争过程中，伊朗一直充当着重要角色。美苏伊三国曾经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三角。二战后美国开始介入中东事务，美国把伊朗作为反对苏联的战略支柱。美苏伊呈现美伊联盟对抗苏联的局面。这一阶段从 1953 年美国策划政变直到 1979 年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被伊斯兰革命推翻。<sup>⑤</sup> 霍梅尼时期，伊朗倡导“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光荣孤立政策，同时与美苏两大国交恶，结果在美苏两国的共同遏制下在两伊战争中失利。

冷战之后，伊朗先后被美国冠以“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的恶名而加以遏制。<sup>⑥</sup> 美国在中亚地区苦心经营，目的在于能够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伊朗。在前任克

---

① 美国克林顿政府主要从地缘经济上遏制伊朗和俄罗斯，主要动作是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的石油管线。以免让俄伊两国从中亚输往西欧的石油管线中受益。参见 Jofi Joseph, “Pipeline Diplomac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Fight for Baku-Ceyhan”, WWS Case Study 1/99, <http://www.princeton.edu/research/cases/pipeline.pdf>.

② 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租用军事基地的协定，实现了在中亚的驻军。但是 2005 年美国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恶化，美国最终撤出了在乌兹别克的军事基地。参见 Eugene Rumer, The U.S. Interests and Role in Central Asia after K2,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6, pp. 141-154.

③ 布热津斯基表示，从地缘上看，丢掉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受到极大限制。即使丢掉波兰，如果能控制乌克兰，俄罗斯仍可以当自信的亚欧帝国的领袖。参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7 页。

④ 普京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实力增长显著，并在经济与外交方面采取强硬举措来应对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包括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并不惜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派遣战略轰炸机巡航拉美，与委内瑞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切断对乌克兰的油气供应，这些同西方对抗的强硬动作被一些人认为是美俄“新冷战”。参见 Vladimir Rodionov, “Dimitri Medvedev raises spectre of new Cold War”, *The Times*, August 26, 2008.

⑤ 关于伊朗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演变，参见本人的博士论文《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分析（1979-2007）》。

⑥ 1994 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马丁·莱克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称伊朗等国家是无赖国家（outlaw），说它们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肩负着遏制这些国家的特殊责任。参见 Anthony Lake, “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2, March/April, 1994, pp. 45-55. 2002 年 1 月，小布什在国会咨文中将伊朗等国家称为“邪恶轴心”，参见“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9 January, 2002, <http://usgovinfo.about.com/library/weekly/aa013002a.htm>.

林顿对两者进行经济遏制的基础上，小布什总统在军事上跃跃欲试，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这场战争加上美国在波斯湾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形成了对伊朗南北夹击的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冷战后美俄伊三国关系就是美国遏制俄伊的过程。

美国在中亚的布局让俄伊两国同时感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迫使俄罗斯和伊朗走向合作，通过消除隔阂来应对外部压力。1989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莫斯科，为伊苏（俄）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经贸联系、武器贸易、核能合作已经成为维系俄伊两国的重要纽带。<sup>①</sup> 因此在美俄伊三边关系中，呈现出这样的局面：美国同俄罗斯存在战略冲突，美国同伊朗严重敌对，而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保持友好关系。而由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美国同时对俄伊两国构成遏制。

这种关系有点类似 1949-1960 年时期的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学者劳威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将其归为稳定婚姻三角关系（stable marriage triangle）。其特点是三个国家只有两个国家关系密切，它们同第三国严重敌对。第三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敌对和威胁是两个国家关系密切的重要外部条件。<sup>②</sup> 美国和俄罗斯的“新冷战”，反映了美俄之间的战略对立。美国又同伊朗严重敌对，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断向伊朗作出改善关系的示好表态，但是美伊双方均缺乏实质性举动。

## 二、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现

伊朗核问题为美俄伊三边的战略互动提供了新动力。对核扩散的恐惧和借助核问题打击宿敌的考虑，让美国积极参与到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这同冷战后美国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一脉相承。美国的参与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双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伊朗核问题对三角关系的意义。伊朗核问题的出现恰逢美国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核问题为美国压制伊朗、维护反核扩散提供了口实。尽管伊朗反复重申自己的核活动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但美国指责伊朗是以民用核能为幌子发展核武器。美国小布什政府多次明确警告和威胁伊朗。<sup>③</sup> 奥巴马政府在武力威胁

---

① “Iran's Road West-Through Moscow; Rafsanjani's Soviet Visit Could Signal a More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 2 July, 1989.

② 学者罗维尔·迪特默从美苏中的战略关系出发，将三国的关系归为稳定婚姻三角（stable marriage triangle）、浪漫三角（romantic triangle）缓和三角（detente triangle）三类，这种分析方法逐渐扩展到探讨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三边战略关系，参见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 1981, pp. 490-492.

③ David E. Sanger, “Bush Warns Iran on Building Nuclear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19 June,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6/19/international/middleeast/19PREX.html>.

方面相对收敛，但也表示将保留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所有选择。<sup>①</sup>

伊朗核问题对美俄战略竞争的意义在于：伊朗是美俄竞争的关键国家。核问题能够成为美国向伊朗施加压力的理由，从而让核问题服务于美国的中东中亚战略。若通过武力威胁和制裁达到让伊朗弃核的结果，那么就消除了美国的心腹大患。如果严厉制裁能够让现在的反美政权难以为继，让反美的伊朗转变为亲美的伊朗，那更是美国的胜利。倘若这样，美国就能够将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伊朗连成一片，构建围堵俄罗斯的紧密防线，彻底阻塞俄罗斯进入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的通道，实现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预言。<sup>②</sup>

对俄罗斯来讲，伊朗是俄罗斯确保南翼安全仅存的国家。在美国的遏制防线不断收紧情况下，维持同伊朗的紧密关系，不让伊朗落入美国囊中，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美国夺取伊朗的远景对俄罗斯将是一场噩梦。核问题、国际安全等借口丝毫不能减轻俄罗斯对美国的戒备。为此，俄罗斯反对将伊朗核问题政治化并作为打压伊朗的借口，强调伊朗应当充分合作，消除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涉及扩散隐患的忧虑，反对美国等国家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严厉制裁。<sup>③</sup>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也存在着共同利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美国 and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都构成损害。伊朗拥有核武器将意味着俄罗斯新增一个核邻居。而伊朗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展，对俄罗斯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sup>④</sup> 对美国来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沉重打击美国的反核扩散战略，使美国保持伊朗弱势的政策归于失败。<sup>⑤</sup> 其次，伊朗拥有核武器将破坏冷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反核扩散国际规范，这将冲击美国充当国际规范维持国的地位。因此遏制伊朗的核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俄在伊朗核进程中的表现。**美俄两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既竞争又合作关系，恰恰反映了美俄的利益交错。从核问题现有的发展历程看，美国对伊朗的核政策经历了从军事打击——制裁——和解的过程。这种变化更多的是美国被迫采取的被动调整，即单边的武力威胁不能奏效，就采取多边制裁，多边制裁难以奏效，

① Ross Colvin, "U.S. Says All Options on Table to Deal With Iran", Reuters, 30 January, 2009,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GCA-GCA-iraq/idUSTRE50S6LZ20090130>.

②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85 页。

③ "Putin: Russia Opposes Force, Sanctions on Iran", Haaretz News, 11 September, 2009,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1114003.html>.

④ 伊朗已经拥有射程 1300 千米的流星-3 型 (Shahab-3) 和射程 2000 千米的泥土型 (Sajil-2) -2 中程导弹。射程超过 2000 千米，这射程就能够覆盖俄罗斯的一些重要城市。参见 "Iran Successfully Test-Fires Sejil-2 Missile" *The Tehran Times*, 21 May, 2009, [http://www.tehrantimes.com/index\\_View.asp?code=195071](http://www.tehrantimes.com/index_View.asp?code=195071)

⑤ Henry Sokolski and Patrick Clawson ed., "Checking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January 2004,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368.pdf>.

就尝试接触伊朗，谋求伊朗同意弃核。美国这种前倨后恭的立场反映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难以通过武力解决核问题，转而采取倚重多边力量谋求弃核的思路。俄罗斯对伊朗的政策思路也十分清晰，目的就是消除或减小外部压力可能对伊朗造成的侵害，无论这种压力是武力威胁还是严厉的经济制裁。在相当程度上，俄罗斯已成为防范美国侵害伊朗的最后屏障。

美俄双方的重要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问题上，从 2002 年底到 2003 年 9 月，美国指责伊朗在核活动上的隐瞒，反映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小布什政府积极呼吁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并进行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则强调伊朗核问题应当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解决，反对轻易将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伊朗尽快澄清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的有关浓缩铀等重大问题。<sup>①</sup>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国于 2005 年 9 月 24 日通过了向安理会报告伊朗核问题的决议，俄提出，应当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国际社会就伊核问题进行磋商。<sup>②</sup>

第二，在冲突可能激化时，俄罗斯采取扬汤止沸的方法防止事态升级。突出的实例是 2006 年 2 月，伊朗同美欧的关系因伊朗恢复浓缩铀生产而骤然紧张，美欧极力要将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提出筹建国际浓缩铀中心的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是将伊朗的浓缩铀研发和生产转移到俄罗斯境内的国际浓缩铀中心，由该中心保障伊朗核能发电所需要的低浓缩铀并负责回收可能存在扩散倾向的核废料。<sup>③</sup>

第三，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美国强调，如果伊朗不服从国际社会的呼吁，将采取严厉的制裁。美国前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表示，伊朗如果拒绝联合国决议，将受到有形而痛苦的后果(tangible and painful consequences)。<sup>④</sup> 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要对伊朗进行致残的制裁(crippling sanctions)。<sup>⑤</sup> 俄罗斯则强调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强调制裁不是目的，而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反对美国严

---

① “Russia urges Iran nuclear compliance”, BBC News, 13 September, 2003,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3106488.stm](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3106488.stm).

② “IAEA Board Adopts Resolution on Iran”, IAEA, 24 September 2005, <http://www.iaea.org/NewsCenter/Transcripts/2005/transcr24092005.html>

③ Anya Loukianova, “The International Uranium Enrichment Center at Angarsk: A Step Towards Assured Fuel Supply?”, *NTI Issue Brief*, November 2008, [http://www.nti.org/e\\_research/e3\\_93.html](http://www.nti.org/e_research/e3_93.html).

④ Nathan Guttman, “AIPAC sends tough message to Iran”, *The Jerusalem Post*, 6 March, 2006,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cid=1139395541402&pagename=JPost%2FJPArticle%2FShowFull>.

⑤ Tim Reid, “Hillary Clinton: US will Organise Crippling’ Iran Sanctions If Diplomacy Fails”, *The Times*, 22 April,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6149692.ece](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6149692.ece).



厉制裁伊朗。<sup>①</sup>

第四，在军事打击伊朗问题上，小布什、奥巴马都曾表示美国将保留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俄罗斯坚决反对军事打击，普京曾表示俄罗斯不能容忍武力打击伊朗。<sup>②</sup>同时，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威胁升级的情况下，俄罗斯通过向伊朗出售 29 套道尔-A1 型防空导弹来加强伊朗的防空能力，以降低美以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俄伊两国还签署了俄向伊出售更先进的S-300 型导弹的合同，俄罗斯极有可能根据时局的变化来确定交付的时间。<sup>③</sup>普京于 2007 年 10 月访问德黑兰时表示，如果一方遭受袭击，另一方将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框架下解决纠纷并不得向侵略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sup>④</sup>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截然相反。尽管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美俄的国家安全都构成负面影响，但两国的反应截然相反。美国坚决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而俄罗斯基本上能够容忍。美国为了解决核问题，不惜采用武力威胁。但是俄罗斯不能容忍美国借核问题搞掉伊朗，并通过采取提高伊朗军事实力的方式打消美国的念头。从发展上看，美国担心夜长梦多，担心伊朗核问题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对自己越不利；俄罗斯基本认可核问题现状的持久化，因为美伊对峙将会将伊朗推向俄罗斯。总之，美俄两国的两极立场让伊朗核问题难以通过多边的方式加以解决。

### 三、美俄对峙中的损益

（一）俄罗斯在“稳定婚姻”的战略三角中的优势。俄罗斯支持伊朗的举动激起西方媒体宣扬俄伊会组建战略同盟的猜测，<sup>⑤</sup>但俄伊两国距离建立同盟还相当遥远，外交取向的差异不太可能让两国轻易组成对抗美国的联盟，两国的关系充其量是共同抵制外部威胁型的关系。而且俄罗斯与美国的对峙并非为伊朗免费提供，俄

---

① 俄罗斯一直反对严厉制裁伊朗，关于俄罗斯的表态参见，“Russia Opposes New Sanctions Against Iran” 14 October, 2009, Ria Novosti News, 14 October, 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1014/156465621.html>; “Russia Firmly Opposes New Sanctions On Iran,” *The Huffington Post*, 17 September, 200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huff-wires/20090917/eu-russia-iran/>.

② “Putin Warns Against Attacks on Iran”, USA Today, 16 October, 2007, [http://www.usatoday.com/news/world/2007-10-16-russia-iran\\_N.htm](http://www.usatoday.com/news/world/2007-10-16-russia-iran_N.htm).

③ Barak Ravid, “Netanyahu to Putin: Stop Selling Missiles to Iran”, *Haaretz News*, 29 June, 2009,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1096332.html>.

④ “Vladimir Putin's First Visit to Iran”, 15 October, 2007, <http://en.rian.ru/analysis/20071015/83959244.html>.

⑤ “United States Must Counter Russia-Iran Alliance, Experts Sa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5 April, 2001, <http://www.heritage.org/press/newsreleases/nr040501.cfm>.

罗斯实际是在伊朗核博弈中谋取自己的利益。美俄能够凭借在“稳定婚姻”的战略三角中的最有利地位谋利。美伊两国的立场越是针锋相对，俄伊关系将愈紧密，伊朗也越有求于俄罗斯，而美国为获得多边的支持也会迎合俄罗斯。这样，俄罗斯成了美伊对抗的最大赢家：

第一，对俄罗斯来讲，维持伊朗的独立与完整的意义大于伊朗核问题本身。维护伊朗的独立与完整，就能避免让美国将伊朗纳入囊中，使美国围堵俄罗斯的期望落空。这对于保护俄罗斯的南翼阵线至关重要。这是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中的最大战略利益。对伊朗的这种战略关切甚至可以追溯到 1921 年《苏伊友好条约》，该条约规定，为了保证避免让波斯（伊朗的旧名）成为反对苏俄的阵地，在伊朗出现政局不稳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苏俄有向伊朗出兵的权力。<sup>①</sup>

第二，俄罗斯能够利用三边关系的独特优势进行寻租（rent-seeking）。由于俄罗斯是美国寻求国际多边支持中绕不开的世界大国，而美俄在核问题上两极分化，美国必然选择协调彼此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以换取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支持。由于俄罗斯是伊朗在核问题上最坚定的屏障，外部压力又鼓励俄伊两国的战略接近，因此俄罗斯能够从伊朗那里获得更多益处。经贸方面，两国在经贸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广泛。目前，俄罗斯是唯一同伊朗保持公开核合作的国家，俄罗斯与伊朗签订的布什尔核电站项目所涉及的金额高达 8 亿美元。伊朗还是俄罗斯第三大武器进口国。这样，俄罗斯就获得了在美国、伊朗两边谋取实利的地位。

第三，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对立提高了俄罗斯在国际斡旋和谈判中的地位。美国和伊朗为了让俄罗斯站在自己一边，必然争相协调同俄罗斯的立场，以期在制裁等问题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使得莫斯科成为各国造访的中心。俄罗斯的立场将成为决定核问题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伊朗受益。**伊朗是美俄战略竞争的另一个受益者。第一，伊朗同俄罗斯在民用核能上的合作基本上沿着有序健康的道路发展。核问题曝光后，俄伊两国的核能合作虽不时发生摩擦，但基本上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接近完工。两国很可能由此开展新的核电项目。<sup>②</sup> 这为伊朗建设与核相关的基础设施、积累核能技术、培养科技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① 1921 年《苏（俄）伊友好条约》规定，如果第三国在波斯企图武力干涉推翻伊朗政权的统治，借助波斯领土进行反苏活动，威胁苏俄及盟国边疆，波斯政府在苏俄抗议下不能制止，苏俄有权将军队开驻波斯，以进行必要防卫所需的军事行动。苏军在威胁消除后应当立刻撤离。这一条约作为不平等条约最终被伊朗国王巴列维废除，参见 Faramarz S.Fatemi, *The U.S.R.R. in Iran: The background History of Russian and Anglo-American Conflict in Iran, Its Effect on Ira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the Shah*, South Brunswick & New York: A.S. Barnes & Company, 1980, pp. 192-194.

② “Russia to Complete Iran's Bushehr Nuclear Power Plant on Time”, *RIA News*, 9 February, 2009, <http://en.rian.ru/russia/20090209/120056521.html>.

第二，美俄战略竞争是伊朗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核冒险取得成功的宏观原因。自从 2005 年 8 月上台后，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先后恢复了铀转化和铀浓缩的研发和生产。目前伊朗基本上掌握了（低）浓缩铀的研发和生产技术，为伊朗成为准核国家奠定了基础。为了让伊朗暂停敏感的浓缩铀生产，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制裁伊朗的 3 个决议，但由于决议是安理会根据大国的综合意志所决定的，而俄罗斯同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分歧让安理会难以通过严厉制裁伊朗的决议。目前所通过的制裁决议更多具有呼吁色彩，并未对伊朗的核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美俄的分歧与竞争成为伊朗在核问题不断突破的外部因素。

第三，同核问题相伴而生的是伊朗的国家成长。伊朗在同美国的反遏制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伊朗的民主政治虽饱受西方非议，但在解决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伊朗的经济因为油价暴涨和产量的提升得以加强。国际油价的暴涨为伊朗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溢价收益，伊朗的石油产量和出口基本接近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伊朗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能源联系也在加强。外交上，核问题并没有让伊朗同沙特、科威特等国的美好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相反，伊朗的什叶派影响力不断攀升。总之，伊朗实力基本上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尽管这不足以改变美俄伊三边的基本关系，但至少向着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变化。

**（三）美国在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困境。**美国在战略三角中的困境在于，美国在同俄罗斯存在战略冲突的同时，与伊朗严重对立。如果美国处于绝对强势而且不需要借助多边力量的支持，维持这种关系丝毫没有问题。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于中东和中亚的地区问题已经难以通过单边方式解决，美国在战略三角中的劣势已经十分明显。

美国在这一战略三角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制止俄罗斯在美伊之间两边寻租谋利的行为。俄罗斯凭借在战略三角中的有利位置，既能够同美国讨论制裁伊朗，也能够同伊朗进行经济和核能合作，而且可以在两边相互讨价还价。第二，解决美俄对立而伊朗谋利的问题。俄罗斯已经成为伊朗防范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大国屏障。伊朗正是凭借俄罗斯屏障和美俄竞争带来的外交空间，进行浓缩铀的研发和生产。美国如果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想办法突破俄罗斯的障碍。

美国克服美俄对立、伊朗受益的方法在于：

第一，让核威胁的共识超越美俄的战略分歧与冲突。这需要建立克服两国分歧的机制。但是美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美国需要切实做出善意举动，从而舒缓俄罗斯对美国进军中东和中亚的敌对情绪，切实缓解俄罗斯对美国鼓励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忧虑。尽管奥巴马宣布在东欧地区停止部署反导弹体系，

但这更容易被人理解为美国因为俄罗斯抵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sup>①</sup> 而美国一旦恢复了实力，又会重新走上遏制俄罗斯的道路。

第二，接触伊朗，同伊朗和解。这是美国解决上述困境的另一把钥匙。它能够打通美俄敌对的困局，让美伊俄战略三角关系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需要决定接触的性质是策略性的还是战略性的。如果仅仅把接触作为让伊朗弃核的激励机制，那么一旦伊朗实现弃核，接触政策也将宣告终止。如果是后者，那将意味着美国彻底放弃长期坚持的敌视和遏制伊朗的政策，真诚地谋求美伊关系的改善。无论是哪一种，奥巴马的接触政策都将会引起极大非议。这也是奥巴马政府虽然多次表态但难以做出实质动作的重要原因。

#### 四. 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未来发展看，不排除存在影响伊朗核进程的外在因素。而以色列最有可能成为这一干扰因素。以色列曾多次表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遏制伊朗的核威胁的话，以色列将依靠自己力量遏制伊朗。<sup>②</sup> 尽管如此，以色列因素仍同战略三角密切相关，它的军事打击在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战略约束和俄罗斯对此的反应。美俄伊三边关系的变化仍是核问题发展的关键。

**（一）美国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目前美国的政策基点仍然过分关注伊朗的潜在核威胁，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小布什在解决核问题上乏善可陈，奥巴马承担着美国战略调整的艰巨责任，他极可能是调整的倡导者，而不是完成者。奥巴马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调整基点应当包括：第一，正确认知崛起的伊朗。不管美国承认与否，伊朗都是美国难以忽视的地区大国。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伊朗及其在地区中的作用。30年的遏制和敌对并未让伊朗变得弱小反而更加强大。伊朗不应当成为美国轻言动武的国家。相反，美国应当在国际上和地区内给伊朗一个适当的地位。第二，身份认同对伊朗核问题将具有特殊的意义。<sup>③</sup> 美国不愿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建立在美伊敌对的基础之上。如果将前提改变为美伊友好，情况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通过改善关系来改变伊朗的身份认同，

---

① “U.S. to Shelve Nuclear-Missile Shie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7 September,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5314575889817971.html>.

② Peter Hirschberg, “Netanyahu: ‘It’s 1938 and Iran is Germany; Ahmadinejad is Preparing Another Holocaust’”, *The Haaretz Daily*, 14 November, 2006,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787766.html>.

③ 温特在其关于建构主义的书中指出，同样的国家会因身份不同而对另外国家的安全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英法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来讲是安全的，但苏联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比改变伊朗的核取向更有意义。不管怎样，奥巴马政府都存在着改变对伊政策的诉求。至于是直接把接触作为对伊新政策，还是采用遏制加接触政策（congame），需要具体的权衡。

（二）**现状持续化**。如上所述，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从国家理性的角度考虑，俄罗斯期望伊朗核问题的现状持续化，以及美伊敌对关系的维持或加强。只有这样，俄罗斯才能更长久地从三边的战略关系中受益。但是美伊关系的确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掌握着变化的主动权。在维持现状问题上，俄罗斯除了军事合作和核能合作之外，能够运用的政策工具相当有限。美伊两国关系改善将直接减少俄罗斯的收益。只要伊朗不过分倒向美国，走到上世纪 50-70 年代的美伊结盟，俄罗斯是可以接受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伊朝着和解方向战略互动不会太快。毕竟美伊两国敌对的时间过长，两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急剧改变两国政府的现有政策具有相当的难度，而且让两国民众适应政府的政策变化也尚需一定的时间。从这方面看，局势的缓慢变化对俄罗斯有利。

（三）**争夺伊朗**。未来局势的第三种变化是美俄两国竞相拉拢伊朗。如果美俄两国期待三边关系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那么美俄两国会把改善同伊朗的关系作为政策首选，而把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列为次要考虑因素。这种政策的目标是让伊朗站在自己一边。对伊关系将取代核武器成为影响美俄伊三边关系的变量。伊朗将成为美俄两国争夺的焦点。从目前来看，俄罗斯的现有政策接近这种趋势，即俄罗斯宁愿选择有核但反美的伊朗，也不愿选择无核但亲美的伊朗；而美国的政策也在调整之中，开始强调美伊关系的改善，如果美国将美伊关系置于核武器之上，那么美国也愿意选择有核但亲美的伊朗。这样，争夺伊朗就成为现实了。

---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Iran's nuclear issue has provided new contents for the strategic batt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had fierce competition and limited cooperation over Iran's nuclear issue.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on Iran's nuclear issue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Iraq. US-Iraq hostility and strategic conflict are basic dominant elements in this strategic triangl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Russia's support o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ran needs Russia as a barrier to guard against pressure from the U.S., thus Russia is profit-making at both sides in this strategic triangle.

**【Key Words】** Great game, Iran's Nuclear Issue, Strategic Triangle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еликая игра, Иранский ядерный вопрос,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 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 俄美关系困境

张学航\*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近二十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波动，而每次波动都伴随着俄罗斯对自己国家身份定位的变化。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没能融入西方，普京与美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合作也没能使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东西方身份定位的不断摇摆和对大国身份一味地过度追求，对其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俄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同时，美国对俄罗斯身份定位的认同与否，也影响着俄美关系。

**【关键词】**俄罗斯 国家身份 俄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045-(12)

谈到俄罗斯的改革，俄当代哲学家斯焦宾（В. С. Степин）指出，俄罗斯每一次改革都起因于与西方冲突的失利，“向西方学习”是其基本特征。<sup>①</sup>美国学者则认为，俄国在历史上曾经“以各种方式探索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建立某种关系。这种探索几乎总是充满了争执，而且几乎总是殊途同归——俄国对外国的仇恨。”<sup>②</sup>综合上述观点，似可得出以下结论：俄罗斯在与西方争斗失败后，就会进行“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但最终总是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俄美关系变迁，这

\* 张学航，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① [俄]斯焦宾：“寻找俄罗斯发展的新价值和目标”，《俄罗斯哲学学会通报》，2000（1）。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9—270页。

②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个结论也有一定说服力。苏联解体后，不论是叶利钦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的愿望，还是“9·11事件”后普京“选择西方”<sup>①</sup>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在他们总统任期的后期，俄美关系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则继续着普京后期的路线。从历史到今天，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为师为友，要么为敌为仇，且对抗多于合作。本文试图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身份定位和俄美相互认知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 一、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概念

国家身份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它与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sup>②</sup>身份由自我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建构而成。<sup>③</sup>国家身份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自我认定问题，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sup>④</sup>，是一种在对外交往中形成的自我感觉。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任何‘自我’身份只能在与‘其他者’的关系中加以定义。”亨廷顿认为，“只有当我们不是谁，而且经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sup>⑤</sup>因此，俄罗斯只有在不断确定自己与他者异同的过程中，才能更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在当今世界，由于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又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大国之一，因此，美国就成了俄罗斯确定自己身份的主要参照物。从认知层面讲，美国的认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是否“准确”。

俄罗斯著名学者沙克列伊娜认为，关于俄罗斯身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当代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是一个全球大国还是一个地区大国；当代国际环境下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俄罗斯外交战略是什么。<sup>⑥</sup>根据上述观点，本文将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概念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身份，即俄罗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多年以来，“关于俄罗斯身份、民族的

---

① 许志新：“‘9·11事件’后普京对西方政策的重大变化”，《欧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Peter J. S. Duncan, “Contemporary Russian Ident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05, No.1.

③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④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⑤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⑥ Tatiana A. Shakleina, “Russia between ‘West’ and ‘Ea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Mar 22, 2006, p.1.

形成和俄罗斯未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及相互影响上。”<sup>①</sup>西方对于俄罗斯来说一直都扮演着“参照物”的角色。<sup>②</sup>在俄罗斯，东西方身份的争论实际上是对“政治榜样的选择和未来文化前途的确定。”<sup>③</sup>二是国际政治身份，即俄罗斯是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俄罗斯对自己文化身份进行定位的同时，总是在评估着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国际政治身份。

## 二、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的矛盾性

### （一）“欧洲的意识和非欧洲的无意识”

相对于西方，自己在文化上的自卑和物质上的落后，使俄罗斯不时地表现出融入西方的冲动；西方的不认同和自己保护本土文化的本能又总能使俄罗斯强化其东方性。在“以西方为定位和不时对东方的神往两种立场之间”，俄罗斯人的内心被“撕裂”。<sup>④</sup>与此相应的是，两种世界观——东方的世界观和西方的世界观——相互之间的斗争，成为“贯穿于全部俄国历史或者全部俄罗斯历史的红线”。<sup>⑤</sup>

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俄罗斯必须接近西方。普京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外国的投资，国家的复兴将需要很长的时间”。<sup>⑥</sup>但如果完全融入西方，可能意味着俄罗斯将不能保证以目前的文化特征和领土规模继续存在。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反美主义甚至是一种必要手段。<sup>⑦</sup>因此，俄罗斯历史上每一次融入西方的尝试都伴随着对自身东方性的强化。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通过与美国结成盟友的方式来解答“我们是谁”的问题，<sup>⑧</sup>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不是谁”。

保持民族特性是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俄罗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彼得大帝欧化改革开始就有了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的争论；又由于俄罗斯

---

① See, for example,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 pp. 261–274. 转引自 Igor Zevelev, “NATO’s Enlargement and Russian Perceptions of Eurasian Political Frontiers”, George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inal Report, 2000, p.13.

② [俄]A. П. 齐甘科夫、П. А. 齐甘科夫：《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冯玉军、徐向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③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④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第60页。

⑤ [俄]A. 别拉波利斯基：《俄罗斯背景下的苏联》，华盛顿，1973年，第281页。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第254页。

⑥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9. 30 декабря.

⑦ Vladimir Zvonovskiy, “The New Russian Ident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mokratizatsiya*, Winter 2005, pp.112-113.

⑧ Michael Wines, “Road to U.S.-Russia Alliance Is Still Unmapped”,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2001.



思想具有“固有的焦躁不安和缺乏稳定价值观念”的特征<sup>①</sup>，因此，俄罗斯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身份定位一直缺乏统一认识。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欧洲的意识和非欧洲的无意识’”。<sup>②</sup>俄罗斯文学和媒体“很少把俄罗斯和英国、法国或是德国作比较来看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总是把俄罗斯和整个欧洲相比较。其结果是，从书本上看来，俄罗斯好像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和欧洲不同的文明之国，而不是整个欧洲的一员。”<sup>③</sup>俄罗斯这种将整个欧洲作为“他者”进行对比的行为方式，证明在俄罗斯人的“无意识”中，自己的民族文化确实与欧洲（西方）有所区别。

## （二）超越现实的大国身份定位

俄罗斯国际政治身份定位的矛盾性体现在，她<sup>④</sup>对大国身份的向往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相对于西方主要大国的弱势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大幅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到2008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2000年的大约5倍半，但仍然只是美国的约十分之一，中国的约37%。<sup>⑤</sup>俄罗斯2008年的军费开支是586亿美元，但还不到美国的（6070亿美元）十分之一。<sup>⑥</sup>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一直认定自己是世界大国，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表示，既然已经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仍然要求受到超级大国一样的待遇”，因此美国在与俄罗斯交往时，应当在理解俄罗斯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制定更合理的政策。<sup>⑦</sup>诚然，过高估计本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族优越感<sup>⑧</sup>，但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太过突出，以至于她往往将国家利益圈定在一个过于广大的范围之内，并因此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难道，1998年美英空袭伊拉克足以让俄罗斯召回驻美英大使？或者1999年俄罗斯在南联盟的“利益”真的已经大到了要叶利钦威胁与美

---

① Guerman Diligensky, Sergei Chugrov, “‘The West’ in Russian Mentality”,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scow, 2000, pp.9-10.

② [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120页。转引自马凤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2期。

③ [美]理查德·莱德亚、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④ 出于尊重两国语言表达习惯的需要，本文在指代俄罗斯时用“她（она）”，在指代美国时用“它（it）”，指代两个国家时用“它们”，引文中涉及到指代问题时，则尊重原文用法。

⑤ World Ban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8”, 7 October 2009,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

⑥ SIPRI, “Global Military Expenditure Set New Record in 2008”, 8 June 2009, <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09/launch/SIPRIYB09release.pdf/view>

⑦ В. Л. Петро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ли гибель?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3, С.284.

⑧ [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sup>①</sup>显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的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其战略利益延伸到巴尔干或者中东。每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梦想成为大国，都渴望赢得尊重，但俄罗斯却往往将过去辉煌或未来目标等同于现世存在，总是要求获得比其实力高得多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尊严。这似乎是太过勉强了。

### 三、俄罗斯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

“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sup>②</sup>。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也是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的过程。

#### （一）国家利益建构

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保证国家安全——即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两个基本层面。倒向西方也好，强调自己的东方性也罢，俄罗斯从没有放弃过对上述两种利益的追求。

俄罗斯希望融入西方，并不是一味将自己的利益让给西方，而是还要从西方得到她想要的：经济利益以及安全感和大国尊严。俄罗斯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观念，在俄罗斯认定自己属于西方的时候，并不代表她将单方面地向西方利益让步，也不是简单地希望与西方进行利益交换，而是在整个“西方大家庭”范围内要求与西方国家利益共享。也就是说，俄罗斯融入西方并不代表其利益需求的内容有所变化，而是利益获取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中苏结盟时代，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范围内对中国的“慷慨”援助，大体上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

俄罗斯超越现实的大国身份定位，规定着其安全利益绝不仅仅是本土安全，而是要求有一定势力范围的“帝国安全”。而他国对其势力范围的侵犯，往往被看作是不尊重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表现。因此，在对外交往中，俄罗斯往往表现得极其看重“集体自尊”<sup>③</sup>。这时的集体自尊利益可以看作是帝国安全利益的华丽外衣。

俄罗斯对于安全和尊严的渴望并不总是高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俄罗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孤立和排外，并不说明她放弃从外部获取经济利益的努力，只是由于很难从西方得到其想要的资金和技术，加上对于自身丰富资源的自信，以及西方（欧洲）身份和大国地位得不到西方承认而产生的挫败感，才使俄罗斯经常陷于封闭和对外部世界的仇视之中。但仅凭自身的条件又不足以保证俄罗斯实现现代化，遇到

<sup>①</sup> BBC News: “Russia warns of ‘third world war’”, 9 April 1999,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315626.stm>

<sup>②</sup>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7页。

<sup>③</sup> 温特将集体自尊定义为：“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求”。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5—296页。

困难的俄罗斯不得求助于西方。1986年和1998年因石油价格下降和严重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困难，可以部分地解释戈尔巴乔夫（包括叶利钦）以及普京何以与西方展开令人颇感意外的合作。然而，在与西方的合作当中，俄罗斯发现另一种至关重要的利益——帝国安全和集体自尊难以保证，于是俄罗斯国内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又开始蔓延。就这样，在两种利益的诱惑面前，俄罗斯在东方、西方之间疲于奔命。

## （二）对外战略选择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经济利益和帝国安全一直都是俄罗斯无法舍弃又难以同时得到的东西，俄国历史因此表现为“帝国使命与向西方发展水平看齐二者的周期性更迭”<sup>①</sup>。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也因之而表现为二元性：一是实现国家现代化<sup>②</sup>，或用西方模式或用独特的俄罗斯模式，这两种模式的选择则是东西方身份争论的结果；二是确保大国地位得到西方承认，大国自尊得到满足，以此消除其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始终无法确定两个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消耗了俄罗斯大量的战略资源。同时实现两个目标的代价过高，沙俄和苏联都曾因不堪此重负而告失败。这一难题仍在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

文化身份定位在东西方之间不断摇摆的同时，俄罗斯也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反复作着权衡。因此，俄罗斯身份定位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对外战略的改变。在俄罗斯看来，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融入西方，要保证帝国安全就要反对西方；困在欧亚大陆北端的俄罗斯在这两种身份和两个战略目标之间忍受着煎熬。在与西方短暂融合和长期冲突交替进行过程中，俄罗斯衰落，复兴；再衰落，再复兴。俄罗斯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正是那些和俄罗斯势不两立的敌人才能在促进俄罗斯强大方面作出了最大的成绩”。<sup>③</sup>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每次复兴并不是反西方的胜利，恰恰相反，正是借助西方主要大国力量的结果。由于地理上远离欧洲政治中心，俄罗斯总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为恢复欧陆均势而不得不借助的力量，加上自身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和政治影响，俄罗斯的崛起速度总是让人惊讶。然而，俄罗斯反对西方却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孤立主义和仇外情绪已经多次被证明是失败的，她每次衰落的速度更加惊人。如果俄罗斯不跳出要么融入西方、要么反对西方的怪圈，如果她始终无法确定两个战略目标的孰先孰后，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今世界，俄罗斯的复兴也许将是个极其漫

---

①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第89页。

② 实现现代化更多是一种国内战略，但对俄罗斯而言必须通过对外战略来实现。

③ 这是俄外长拉夫罗夫2008年9月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俄著名诗人丘特切夫（Тютчев, 1803-1873）的话，因此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应该具有一定代表性。见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Мир в поисках ново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8.15 сентября.

长的等待。未来很难预测，但至少就目前形势来看，致力于统一的欧洲发生力量失衡的前景几乎是遥遥无期，欧盟与美国发生战略冲撞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的确需要理性与智慧。

### 三、美国对俄罗斯身份的不认同与俄美关系困境

#### （一）美国对俄罗斯西方身份的不认同与俄美认知冲突

在美国人看来，历史上“土耳其比莫斯科公国更接近西方”，他们甚至“怀疑俄罗斯人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sup>①</sup>美国中情局网站上发布的各国参考资料中，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重心都在欧洲的俄罗斯是一个“亚洲北部”国家<sup>②</sup>，而绝大部分领土处于亚洲的土耳其则位于“欧洲东南部和亚洲西南部”（“欧洲”在“亚洲”之前）。<sup>③</sup>美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并没有经历过西方文明所经历过的主要发展阶段，包括“文艺复兴及其带来的古典艺术的繁荣、宗教的改革、城市的兴起、现代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科技的革命、自由经济和对个人权利的承认、政治自由的开始，以及中产阶级的壮大”。<sup>④</sup>显然，在美国人心目中，能够代表西方（欧洲）的是拿破仑和莎士比亚，而不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

美国并不十分在意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是非西方的——它关心的是俄罗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三个核心战略目标是：加强美国安全，保持经济繁荣，对外扩展民主和人权<sup>⑤</sup>，即通过扩展美国民主模式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在它看来，美国模式的扩展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前提，“只有当这个世界使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版本得到保障，美国才能获得安全”。<sup>⑥</sup>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强调，“一个和平、民主和繁荣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sup>⑦</sup>这一原则主导下的美国对俄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

---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② CIA Factbook of Russia, page last updated on October 7, 2009,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rs.html>

③ CIA Factbook of Turkey, page last updated on September 30, 2009,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tu.html>

④ [美]耶鲁·瑞奇蒙德：《解读俄罗斯人》，郭武文等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⑤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1999, Preface, p.iii.

⑥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23页。

⑦ Remarks by James A. Baker III Given at the Kennan Institute 25th Anniversary Dinner. October 4, 1999, Washington, DC. USIA, 4 October 1999. 转引自 Igor Zevelev, “NATO’s Enlargement and Russian Perceptions of Eurasian Political Frontiers”, pp.42-43.

①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快速增长时，由于担心俄“市场—权威主义（market authoritarianism）”模式可能成为别国的仿效对象，美国学者宣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安哥拉一样，只是由于石油持续高价的幸运。②事实上，每当俄罗斯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观点时，美国总会指手画脚。“俄罗斯对西方的训诫感到厌烦，而西方也同样反感俄罗斯的诽谤”。③俄美关系也往往因之跌入低谷。

但美国偏偏喜欢以救世主自居。几乎每次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俄罗斯向着美国并不希望的方向发展时，美国都会出现“谁失去了俄罗斯”的争论。④美国总是觉得俄罗斯之所以走上“错误道路”，是因为美国政府没能作出有足够影响力的引导措施。典型的救世主思想！与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相比，俄罗斯的救世主情结也很浓重。即使在祖国并不强大时，俄罗斯精英们仍然认为俄罗斯肩负着拯救别人的使命。俄经济学家安东诺夫（Mikhail F. Antonov）1990年接受采访时说，“让别的国家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吧！……拯救世界的将来自苏维埃俄罗斯。”⑤俄罗斯救世主思想的典型体现之一就是欧亚主义思想。它的提倡者们认为，这一思想“不仅能拯救俄罗斯，还能拯救世界”。⑥欧亚主义思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强调本国文化的东方特色，以对抗全盘西化，寻找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努力”，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救世主义。⑦

俄美两个国家都习惯于用救世主的眼光观察世界和打量对方。美国自认为是民主的榜样，俄罗斯则宣布自己是“国际政治中的精神领袖”；⑧美国经常指责俄罗斯不够民主，俄罗斯则声称美国社会道德败坏。⑨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尽管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他却对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十分不满，经常指

---

① 这一点可以从近期奥巴马在莫斯科新经济学院的演讲中体现出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俄国内的民主状况，但他的通篇发言更像是在给俄罗斯上民主和人权课。参见“Obama’s Speech at the New Economic School”,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09.

②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68-84.

③ Viktor Erofeev, “Moscow’s image proble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1, 2007.

④ 相关观点可参见[美]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徐以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译序第3页、第217页；[美]安德鲁·C·库钦斯：《俄罗斯在崛起吗》，沈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页；Kim R. Holmes, Caspar W. Weinberger, R. James Woolsey, and Ariel Cohen, “Who Lost Russia?”, 8 January 1999,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hl629.cfm>. Gary Hart, “Don’t lose Russia: letter to Democra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2007.; Dimitri Simes, “Losing Russia: The Costs of Renewed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7.

⑤ Bill Keller, “Yearning For an Iron Hand”,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90.

⑥ [加]阿列克斯·巴特勒著：《21世纪：没有俄罗斯的世界》，张健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⑦ 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第289页。

⑧ Обзо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7.03.2007// [http://www.mid.ru/brp\\_4.nsf/sps/3647DA97748A106BC32572AB002AC4DD](http://www.mid.ru/brp_4.nsf/sps/3647DA97748A106BC32572AB002AC4DD)

⑨ 参见[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196页。

责西方社会道德堕落。<sup>①</sup>也有俄国学者批判西方是向“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推行消费主义思想的鼓动者”<sup>②</sup>。沙克列伊娜则认为，美国恣意对外动武的行为“毁坏了世界赖以存在的政治与道义基础”。<sup>③</sup>在2009年9月的一次国际安全会议上，梅德韦杰夫批评华盛顿的政策轻视了“通行的道德标准和人道主义原则”，并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sup>④</sup>

除了相互否定之外，两个“救世主”之间还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冷战结束以后，尽管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必须抛弃自己的帝国使命”<sup>⑤</sup>，美国还是决意要向东扩展北约，以限制昔日对手的东山再起；同样地，不管美国如何宣称北约东扩不是针对俄罗斯，莫斯科依然作出了强烈反应。即使是历史上的战略合作时期，两国之间也带有明显的相互猜疑心理。美国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二战期间与西方结盟是“策略性的”<sup>⑥</sup>，“9·11事件”后普京与布什结成反恐同盟是“机会主义的”。<sup>⑦</sup>但历史上俄罗斯也多次被西方当作平衡力量，使即将倾覆的欧洲甚至世界恢复均势。而当力量平衡恢复以后，整个西方又联合起来将这个昔日盟友赶出欧洲。西方的上述做法难道就不是策略性的或者机会主义的？

两国的认知分歧影响着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俄罗斯身份问题也制约着两国互信的建立。北宋范纯仁论朋党之争时曾说：“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sup>⑧</sup>，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身份问题论述的经典之一。近千年后，西方人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与他人投缘并不是因为在他那里发现了善，而是因为发现了自己”。<sup>⑨</sup>“异我”身份使两个国家的不信任加深；不信任鸿沟的存在又加重了双方的“异我”身份。

## （二）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不认同与俄美安全困境

并不是每个具有非西方身份的国家都必然与美国发生对抗，也不是每个与美国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都与美国产生冲突。事实上，俄罗斯学者也认为确定俄罗斯的

---

① Michael T. Kaufman, “Solzhenitsyn, Literary Giant Who Defied Soviets,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2008. 及“Russia’s Prophet In Exile”, *TIME*, July 24, 1989.

② 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第297页。

③ [俄]沙克列伊娜：“美国对外政策与俄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

④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ина, Виктор Сумской. Медведев открыл Россию// Газета. 2009.14 сентября.

⑤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⑥ 康多莉扎·赖斯：“苏联大战略的演变”，见[美]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⑦ 高祖贵：“美俄关系的新态势及其根源——《冷和平：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介评”，《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5期。

⑧ 中央档案馆整理：《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第十九卷·宋史（三）》，北京：中央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1128页。

⑨ [法]埃曼纽·托德：《美帝国的衰落》，李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独特文化身份是为了更顺利地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sup>①</sup>但是，俄美这两个国家都对国际体系权势地位和集体自尊充满渴望。美国所追求的“集体自尊”就是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光荣与梦想”，它在俄罗斯极度敏感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每一次行动，都不仅仅是在挤压俄罗斯，也是在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因此，俄罗斯指责美国总是以领导者自居，<sup>②</sup>美国则认为俄罗斯总是怀有帝国情结。<sup>③</sup>它们一个无法舍弃世界大国的尊严，一个不懈追求全球领导者的荣耀，北半球的两个大块头将自己大部分的荣耀与尊严都集中到了东欧和中亚这一转型国家集中的地区。近年来，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东欧反导系统的部署和俄格军事冲突等，使这一地区成了俄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北极熊和山姆大叔在这一地区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全困境，这进一步阻碍了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

不同的国家对集体自尊和大国地位的需求是不同的。显然，俄罗斯渴望得到尊重的心情过于迫切。作为对外战略的官方文件，每篇《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都要重点谈及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问题。2008年《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就有7次提到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并称俄罗斯是“当代世界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sup>④</sup>被外界广泛认为务实的普京，也难免“贪图”表面虚荣，他的“目的不仅是要挽回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而且要挽回这种状态，甚至一种大国的感觉。”<sup>⑤</sup>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略带炫耀地宣称，“去年6月俄罗斯应邀成为世界最发达的8国俱乐部中的平等一员”，这“既可保障我国的利益，又可解决当代文明面临的共同问题。”他还说，“我们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只有成为强国，才能在现有的疆界内生存和发展。在国家经济和政治衰弱的各个时期，俄罗斯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解体的威胁。”<sup>⑥</sup>对于俄罗斯来说，只有强大，至少是看起来强大，才能够获得安全感。

然而，致力于领导世界的美国却并不认同俄罗斯对自己大国身份的定位。当2007

---

① Sergei Kortunov, “Invigorating Russia’s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 4, October - December 2005.

② Обзо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7.03.2007// [http://www.mid.ru/brp\\_4.nsf/spss/3647DA97748A106BC32572AB002AC4DD](http://www.mid.ru/brp_4.nsf/spss/3647DA97748A106BC32572AB002AC4DD)

③ Owen Matthews and Anna Nemtsova, “The World According to Russia. Why,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Kremlin’s still obsessed with getting respect”, *NEWSWEEK*, Sep 7, 2009.

④ 这一统计数字仅为本文作者粗略计算，其中позиция 4次，положение 2次，место 1次，以上词汇只在意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时才被计入，其它含义并不在其列，如“равноправная позиция（平等地位）”以及“Общие положения（总则）”。2008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正文总计约7000俄语单词。原文见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А.Медведевым. 12.07.2008// <http://www.kremlin.ru/text/docs/2008/07/204108.shtml>

⑤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王晓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18页。

⑥ В. 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6.05.2003// <http://www.kremlin.ru/text/appears/2003/05/44623.shtml>

年8月普京宣布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在15年后首次恢复例行战略巡逻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嘲笑俄军的装备老化：“如果俄罗斯觉得有必要让这些老爷飞机（old aircraft）从仓库里出来飞行的话，那是他们的决定。”<sup>①</sup>当2008年11月俄罗斯北方舰队的舰艇编队到达委内瑞拉，参加两国不久将举行的联合军演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揶揄俄海军的远洋能力：“他们这次有拖船随行吗？”<sup>②</sup>俄罗斯不断炫耀武力，这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而美国对俄罗斯“肌肉”的一再漠视，又被俄罗斯认为是羞辱。俄美相互认知在俄罗斯国际政治身份定位问题上走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现在，俄罗斯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已接近顶峰，甚至超过冷战时期的1979—1984年。”<sup>③</sup>

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挑战，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都入驻了新主人，两国关系也迎来了新契机。2009年7月，俄美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俄罗斯”，但在短短几周后，副总统拜登却抛出了俄罗斯“衰落论”：“令人难堪的”经济状况、急剧减少的人口和“无法支撑15年的”银行业，都表明俄罗斯是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国家。<sup>④</sup>对于美国正副总统前后矛盾的表态，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Сергей Приходько）“富有感情而又委婉地”回应道：“到底是谁在拍板白宫外交政策？”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则继续追问，奥巴马究竟是真心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是追随其前任的脚步——那些已经明显证明糟糕的俄美关系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这个问题回答了，“谁是白宫真正的主人也就清楚了”。<sup>⑤</sup>莫斯科内心深处担忧的是，拜登的观点才是白宫意见的主流。

作为普京的继任者，梅德韦杰夫显得更加“开明”。他在2009年9月发表的题为《俄罗斯，前进吧！》的文章中表示，“决定我们对外政策的不应该是怀旧情愫，而应该是俄罗斯的长期战略性目标。”他甚至引用了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名言。然而，他的通篇讲话仍在强调俄罗斯历史上的辉煌，强调自己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强调俄罗斯“应该公开而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所有场合都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去年8月<sup>⑥</sup>，我就已经提到过我们的这些对外政策原则了。”<sup>⑦</sup>俄罗斯新任总

---

① “Putin orders long-range bomber fligh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2007.

② Tony Halpin, “Russian navy arrives in Venezuela to 21-gun salute”, *The Times*, November 26, 2008.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во время кризис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9.11 февраля.

④ Peter Spiegel, “Biden Says Weakened Russia Will Bend to 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age A1, July 25, 2009.

⑤ Владислав Воробьев. Словарный боезапас,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США оказал своему шефу медвежью услугу//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9.27 июля.

⑥ 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

⑦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10.09.2009//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5413>



统对“特殊利益区”的关注仍然被美国看作是旧帝国对“势力范围”的怀念。<sup>①</sup>

看来，俄美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观念分歧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俄美关系困境远未消除。

### 三、走出俄美关系困境需要俄罗斯理性的身份定位

公平地讲，美国明知俄罗斯自尊敏感却又对其进行伤害，并非明智之举；但俄罗斯一味追求大国地位，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作为弱势和落后的一方，俄罗斯应该在注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直面现实，给自己的身份一个明确而又符合实际的定位，从而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选择一个优先方向。在笔者看来，俄罗斯只有确立了与自己文化特点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现在的俄罗斯正在这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才不会在融入西方与反对西方两个极端之间左冲右突；只有不去执着地追求实际上并无可能的超级大国地位，才能尽量避免俄美关系在非良性循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只有确定了符合客观现实的身份，俄罗斯才能在基于国家能力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实现首要的战略目标——国家现代化。

---

**【Abstract】** During the nearly two decad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Russia-U.S.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several wide fluctuations. And all the fluctuations have been partially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of Russia's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identity. Russia has not been able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West' during the period of Yeltsin, and Putin's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gainst the 'terrorism' has not led the West to accept Russia as one of its own. Both Russia's vibration in its national identity of West-oriented or East-oriented and its excessive pursui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great power, have influenced a lot on Russia's construction for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ts choice for foreign strategie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may block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S.. Besides, America's attitude toward Russia's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identity will impact on the Russia-U.S. relations as well.

**【Key Words】** Russia,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U.S. Relation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sup>①</sup> Owen Matthews and Anna Nemtsova, "The World According to Russia, Why,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Kremlin's still obsessed with getting respect", *NEWSWEEK*, Sep 7, 2009.

欧亚·斯拉夫

## 中亚的政商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

A. 利布曼\*

**【内容提要】**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本文旨在理解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种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发展，重点考察了中亚国家政商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模式的内容（由代理人的偏好及其相对权力决定）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 政商关系 制度的性质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中图分类号】**D73/77.36.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057-(14)

### 一、前言

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为了理解政商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需要有合适的理论框架。本文将两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提出一些分析工具。

就乌兹别克斯坦来说，由于该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私有化并且限制外资，在经济政策决策领域似乎没有明显的私人利益。所以使用“企业利益”一词时要多

\* A. 利布曼，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加小心。但即便如此也有例外，甚至在中央集权的国家经济中，企业和官僚之间（或者主管企业的官僚和主管政府部门的官僚之间）也会有博弈存在。与此相反，哈萨克斯坦的商业集团规模和影响力都异常巨大，这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政商关系的一般性结构进行分析，然后考察其对经济活动发挥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制度的性质、制度的不一致性。最后，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商关系的特点作出简要分析，并将其作为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分析。<sup>①</sup>

## 二、制度的性质和制度的一致性

一般说来，政商关系的模式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干预企业（包括国有和私有）经济决策程度的正式规则；二是政府、官员和商业团体之间的非正式的相互依存。在研究方法上有两种途径：一是关注政商关系的内容，从总体上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的因素，二是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之间的矛盾，将其看作官员和商家各种动机的来源。由此看来，政商关系模式的正式和非正式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值得分析思考。下文将表明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

分析政商关系的内容最好从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人的理论框架开始<sup>②</sup>。该框架假设政治制度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导致了参与制度建设过程的社会集团得到不同的政治权力，既有事实上（de facto）的权力也有法律上（de jure）的权力。这些权力差异引起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并反过来决定了资源再分配和经济活动的变迁。因此，制度的关键要素是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和相对权力。制度是否稳定与实际权力（de facto power）的分配有关：即现行制度框架内，较成功的行为者在经济制度的设计方面也较有影响力，也更能够再造其地位。但该理论没有排除社会中的政治变革。

因此，政商关系的不同模式可以按照阿西莫格鲁的方法来定义，即根据企业或政府行为者的不同的实际权力，由政治制度和资源禀赋来决定。用各种制度和要素禀赋来解释不同的博弈权力非常有趣。由于本文分析的政商关系比较薄弱并且不正规，因此后文将主要关注事实性权力（事实上，企业界影响政府决策的法律权力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或者作用极小）。为了区分不同的政商关系模式，本文直接分析

---

① 本文为“中亚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制度对改革进程的补充作用”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②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A,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Volume 1A, pp. 386-414.

了权力的不对称性，因为这有助于将众多的制度行为者结构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变量。但是，企业界与政府行为者之间的权力不均衡理论又要求简明，因此，本文不涉及过多的公司和政治行为者，而是关注较小的特权利益集团（例如，大公司、银行和总统行政部门）。

尽管理解制度变迁的动力也会有助于本文的分析，本文的“企业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简化了事实。如果不存在腐败和补贴的成本，就经济结果而言，商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差别可以忽略<sup>①</sup>。“赶超”政策的目标是减少腐败对官员、公民和公司的吸引力（增加腐败的成本使其纳入合法的问题解决程序），加重特权公司所有人的财务压力（或者使用严格的市场纪律，或者通过公共部门的控制），同时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公司利润。因此，在一个存在着腐败的世界里，政治行为者和商业行为者间的权力分配十分重要并影响着制度变革的结局。

我将采用与阿西莫格鲁等人不同的方法，关注权力不均衡对经济政策形成过程发挥影响的两种渠道。首先，鉴于后苏联国家的法律秩序依旧不完整，它们也试图改变正式的规则，本文首先关注强势行为者按照自身利益改变政策的能力。这是所谓“新现实主义”理论有关制度变革的核心内容<sup>②</sup>。但是，制度和政策并非总是政府有意设计的结果，它们也常常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把制度看作“有意识行动的出乎意料的结果”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它们在哈耶克学派那里得到发扬广大。奈特认为<sup>③</sup>，技术和资源的变化会导致社会行为者争夺权力的冲突，制度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出人意料地出现的。在后苏联世界里，公司的国际化扩张和国际政治的竞争导致重大的权力转移，引发了政治和商业行为者的冲突。但是本文假设最初的权力结构影响了政商冲突的结构。

在考察长期趋势时，阿西莫格鲁假设政治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有必要将政商关系模式对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纳入分析之中。政治经济变迁对经济政策设计非常重要。本文试图利用政商关系解释政策选择，但是反过来也是可行的，即政商关系和政治经济发展是并行不悖且相互影响的。事实上，所有的后苏联国家都将改变政商关系作为改革的目标。在转型初期和不存在大规模私有商业部门的国家里，我们只能对控制各类资产的不同官僚集团间的关系作一个大概的描述。在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也可以假设某种特定的政商关系模式，当然这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和政治的转型。

---

① Shleifer, A. and R.W. Vishny, “Politicians and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4), 1994.  
② Amable, B. and S. Palombarini, “A Neorealist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Diversity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7(1), 2009.  
③ Knight, J.,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三、政商关系和制度：3个影响通道

#### 1、责任人的制度设计

如上所述，商业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通道：直接的制度设计和再分配冲突造成的结果。在前者中，商界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取决于其相对实力和行为者的动机。在这里我们假设商界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这在许多后苏联国家都是如此，但在中亚国家则不然。）在这个例子中有可能就两派理论作出区分，虽然它们各自仅仅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方面，但这些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种理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内，私人行为者一般偏好低效率的制度，并支持现有的“制度陷阱”。利布曼认为<sup>①</sup>，再分配、垂直信任或学习成本的缺失有利于坏制度的生成。首先，如果租金高于交易成本，低效率规则可使受益集团从再分配过程中相对获利。由于该集团拥有大量的政治权力，它们可以有效地阻挠制度质量的改善。即使某些政治改革措施可以相互获利，但由于在再分配过程中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各类社会集团也不能达成共识<sup>②</sup>。第二，如果个人总是怀疑政府，任何制度环境的变迁都会被看作是更糟的，行为者们会维持现状而不是追求更好的制度，并有意识地通过非正式渠道组织起来。第三，隐性成本很可能高于较好的制度环境带来的收益，个人会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至少是投资政治活动来改变处境。

另一派理论关注私人企业对好制度的需求。它承认，在转型初期，的确存在对坏制度的需求，但是经济发展会增加有效法规的需求以减少交易成本。这种观点与早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产权制度的外生变量思想<sup>③</sup>非常相似。波里什丘克（Polishchuk）和鲁诺夫（Runov）就影响企业行为者态度变化的诸多因素作了区分<sup>④</sup>：为防止“没什么可偷”而进行的反生产力的再分配斗争、为取代苏联时期留下的资产推销问题而产生的对投资的需求、为了公司治理和对全球市场上名誉的考虑而产生的对透明标准的需求。国际化增强了企业的合法性、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和政商关系中讨价还价的权力，同时国际化还增加了透明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并使法

① 亚历山大·利布曼：“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徐坡岭、张尚等译，《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

② Fernandez, R. and D. Rodrik, “Resistance to Reforms, Status Quo Bias in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pecific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5), 1991.

③ North, D. C. and 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④ Polishchuk, L, “Evolving Demand for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Mimeo*, 2002; Рунов А. Изменение спроса на пра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ео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убъект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од ред. Р. М. Нуреева. Т. 2. М.: МОНФ, 2003.

规更加明确<sup>①</sup>。最后，独联体国家还在企业管理领域开展了“换代”活动，即公司的创始人成为纯粹的股东、还权于经理、更加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据最近的报告，金融危机使这一进程发生了扭转。公司开始裁减外雇的管理层，恢复股东的管理岗位以获取最佳的成本结构。因此，私人企业部门不再对维持低效均衡感兴趣，不再支持经济变革。

在当前的文献中，人们很少质疑90年代早期对坏制度的需求。但是，对于企业偏好可能发生变化的论述始终是转型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学者将这类讨论称作“转型不可避免论”和“转型冻结论”<sup>②</sup>，并认为这种争论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下去。但是，这两种理论都可以得到简化。首先，好制度需求论假设，企业偏好在转型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更倾向于好制度，反对初期的资产掠夺，而私有企业对改善制度环境更感兴趣。因此，一旦企业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改进制度的质量。同样，如果强大的多国公司愿意摆脱需求坏制度的偏好，也会成为制度转型的驱动力。根据第二种理论，如果企业偏好坏制度，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就来自国家（即政治行为者），并迫使私有企业接受新的规则。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政治经济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参照“坏制度需求”和“好制度需求”的划分，我们可以提出“自主的政府”和“寻租的政府”这两个范畴。“公平”政府理论认为，相对强大的政府可以摆脱潜在利益集团的压力并创造更好的制度。但是何谓公平却容易招致批评：旧理论强调政府独立于利益集团的再分配意愿，这使其能够从事经济改革<sup>③</sup>，而最新的观点则强调政府的长远公正性<sup>④</sup>。反对派认为独立的政府很少不偏不倚，它们常常运用权力榨取租金。即使在强大政府能够启动较好制度改革例子中，如果我们遵循所谓“固定的强盗”（stationary bandit）论点<sup>⑤</sup>，也会看到存在着经济增长收益大于更广泛的再分配改革的现象。

## 2、权力斗争的副产品

当代冲突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话题认为，产权可以产生于无政府环<sup>⑥</sup>。这也可以追

---

① Heinrich, A., “Globale Einflüsse und die Corporate Governance des russischen Erdöl- und Erdgassektors”, *Arbeitspapiere der Forschungsstelle Osteuropa Bremen*, Nr. 46, 2003.

② Havrylyshin, O.,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CATO Institute 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4, 2007.

③ Афонтсев, С. Рыночные Реформы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Общество: Аспект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④ Rothstein, B. and J. Teorell, “What Is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 Theory of Imparti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21(2), 2008.

⑤ McGuire, M.C. and M. Olson, “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72-96, 1996.

⑥ Grossman, H., “The Creation of Effective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 2001.

溯到哈耶克的“自发演变”理论（spontaneous evolution）<sup>①</sup>。从经验角度看，这有个长处：为了将制度变迁看作是权力和再分配冲突的副产品，并不需要象上文那样引入行为者动机的假设。其实，即使人们假设政治行为者和商业行为者都不愿意支持经济改革，改革还是会作为“有意行动的无意结果”而出现。由于相关现象很难直接观察，就连那些被披露的事例也难以在不透明的政治背景下搞清楚，对权力斗争副产品的分析有利于研究工作，但对政商关系模式的潜在结构尚需作出结论。

最能影响政商冲突结果的因素是不同行为者使用的冲突工具。第一种是传统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如内部谈判、行政手段和讨价还价，这些来自苏联的旧式“行政市场”。这类工具支持无效的制度，即使行为者要改变它。第二种包括使用法院和司法程序。这类工具也不保障变革，但至少打开了转型的机会之窗。有两个主要的分析工具：(1)行为者习惯了“新”工具，（这就减少了好制度的认知成本和“对坏制度的需求”）从而造就了新的行为惯例。(2)通过知识积累，长期的使用改进了“新”工具的质量（如法律程序和议会选举）。“可替换性”工具是有风险的（或至少被看做是有风险的），因此，利布曼认为，只有强大的行为者才愿意使用可替代性的方法替换传统的“隐性博弈”工具<sup>②</sup>。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治冲突中的较弱方对吸引更多的参与方（或使冲突社会化）更感兴趣，在使用可替代性工具时就是这样<sup>③</sup>。

### 3、制度的一致性

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一致性上看，可以用类似“体制的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的概念来描述政府商业关系模式。“体制的互补性”的概念最早产生于比较政治经济学，常被用来指不同社会领域中正式制度的组合，如劳动力市场、公司管理和教育制度等。而非正式制度则常常“分享”正式规则的领域。因此，制度的连续性是指：

——在设定议程时，各种制度相互加强，非正式的制度增强了正式规则的力量<sup>④</sup>；

——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根据制度间的劳动分工划分各自的应用领域，这使得它们一起保存了下来<sup>⑤</sup>；

---

① Beaulier, S.A. and D.L. Prychitko, “Disagreement over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lternative Meaning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9(1), 2006.

② Либман А. Конфлик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Бизнес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Опыт//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XXII(9).2005.

③ Schattenschneider, E.,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Hinsdale, Dryden, 1960.

④ Levitsky, S. and M.V. Murillo, “Th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Variation in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 2009.

⑤ Leipold, H., *Kulturvergleichende Institutionenökonomik: Studien zur kulturellen, institutionellen und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Lucius & Lucius, UTB, 2006.

——制度中存在着历时性的分工，例如，如果正式制度遭到削弱，非正式制度就会确保其生存条件，复制旧的正式制度的结构<sup>①</sup>。

制度的一致性不是以效率而是以“制度的生存”来定义的。当然，如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直接发生冲突，也会有制度的非一致性，此时正式制度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sup>②</sup>或被滥用<sup>③</sup>。很容易设想无效制度的稳定结合与制度改革之间会有权衡和较量，这或许可以创立更好的制度，但制度的不一致性也会导致额外的成本。于是，“次好”制度的概念产生了<sup>④</sup>。“次好”就是指这种权衡和妥协。制度的不一致性成本很可能导致制度结合的不稳定<sup>⑤</sup>。

制度的一致性问题对政商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法规可以在政治、政府与商业之间建立特定的权力平衡，以及运用具体规则限制各方发挥影响进行干预。但这些法规可能会差异巨大，例如，当正式制度明确地限制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时，非正式的制度可能也会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结构，企业被迫谋求政治和特殊官僚集团的支持。更为有趣的例子是，尽管政府在法律上完全拥有权威干预企业决策，事实上这种正式的等级秩序会与复杂的非正式博弈体系共同发挥作用。例如，正式的高度等级化的苏联经济体系<sup>⑥</sup>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期结束后缓慢地进行自我调节，软化行政压力形成了“管理市场”：等级化的计划体制事实上被一种互动过程所替代，决策过程的所有层次都对最终计划的形成发挥了影响，因而经济活动变成了“事后代表”（ex post representations）而不是“事前指导”（ex ante guidelines）。在这种博弈系统中，即使最强大的机构也不能实施它们的意愿<sup>⑦</sup>。这个体系由企业间的水平关系之网构成，涉及数个等级体系的互动，并实际上建立了产权关系（大多是所谓的“小产权”，建立在对滥用人民财产惩罚极轻的基础上，参见，并增加了地方的自主性（尤其是南方的共和国<sup>⑧</sup>）和企业及政府机构的自主性（事

---

① Либман. Оптималь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5). 2008.

② Gruževaja, M., “Formelle und informelle Institutionen i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University of Potsdam Discussion Paper*, No. 76, 2005.

③ Polishchuk, L., “Misuse of Institu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Mimeo, 2008.

④ Rodrik, D., “Second-Best Institu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050, 2008.

⑤ Peregudov, S.P., “Konvergentsiya po-Rossiiski: Zolotaya Seredina ili Ostanovka na Polputi?”, *Polis* (1), 2008.

⑥ Lück-Jarczyk, C., “*Institutionenökonomie der sowjetischen Wirtschaftsverwaltung*”, München, 1991.

⑦ Наишуль В.А. Высшая и Последняя Стад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огружение в Трясину. М.1991; Наишуль В.А. Либерализм. Обычные Прав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7). 1992; Кордонский С.Г.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е Рынки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ОГИ, 2006.

⑧ Тимофеев Л.М. Пра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СССР: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и Теневая Практика//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2000 №4. С.53-56.



实上的私有化<sup>①</sup>）。

苏联的行政管理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影子经济）显示了制度一致性成本间的较量和上述整体制度的效率，对克服不可避免的等级缺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个人和家庭在发生经济短缺和苏联经济进行整体调整之时生存下来。更重要的是，行政管理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承认了企业家群体，并在发展为进一步转型所必需的新的行为模式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它还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行政管理市场是建立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就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在苏联时期就成本高昂，因为它受到正规的等级体制的严重影响。行政管理市场还鼓励其他模式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后苏联经济的许多问题，如政府机构事实上的私有化和对非正式经济联系的过分倚重。前者使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即使在权力转型和实施软预算限制之后仍然陷于困境<sup>②</sup>。因此，尽管建立行政管理市场的本意是克服等级式计划经济的缺陷，但现在却通过积累新环境下的各类认识，变成了阻碍进一步发展的一种体制，从而妨碍了转型的主要目标<sup>③</sup>。

## 四、中亚的政商关系

### 1、哈萨克斯坦

在论述了政商关系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之后，本文将以此考察两个中亚国家。首先是哈萨克斯坦。该国的政商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不明显，但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在2003-2004年以后就日渐突出了。一般认为，哈萨克斯坦完成了自由化改革，并取消了政府对经济的绝大多数的控制。该国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内容甚至比独联体其它国家更加广泛，已经扩展到银行体系、能源设施和住房领域。就正式制度看，哈萨克斯坦改变了苏联式的等级管理，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受到了限制，而且该国提供了有利于外国投资的条件，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FDI）<sup>④</sup>。在这一点上，哈萨克斯坦在后苏联范围内，尤其是大国当中是比较独

---

① Наншуль.В.А. Коммунизм: смерть ил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имео.1995.

② Shastitko, A. and V. Tambovtsev, V.,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Political Artifact or Economic Phenomenon*, Arbeitspapier des Osteuropa-Instituts der Universität Bremen, 2000.

③ Colombatto, E. "Eine praxeologische Betrachtung institutioneller Reformen in post-sowjetischer Zeit", in: Gröske, K.-D. (ed.): *Vademekum zu einem Klassiker der neuen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Düsseldorf, 2002.

④ A. 利布曼, Д. 乌什卡洛娃: "全球与地区制度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俄罗斯研究》, 2009年第2期。

特的<sup>①</sup>。

从俄罗斯到乌克兰，现行的政商关系模式差异很大，非正式的权力分配也不相同。哈萨克斯坦实际上建立了一种结合了不同的政商关系模式的制度。尽管私有化和自由化成效巨大，在该国却产生了大量享有特权的国内商业集团。它们大多被银行所控制，与政府有着强大的联系，甚至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家族过从甚密。由于总统权力异常集中，大商业集团对政府的依赖比俄罗斯和乌克兰更为严重。同时，该国政府也不得不与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打交道，以获取特权待遇。在该国历史上，总有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和政治家试图重写游戏规则的先例。不过，直到2000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对政府政治的影响仍然巨大。

为考察制度的发展，本文将分别探讨两种模式。在转型初期对坏制度的需求方面，该国政治精英与国内商业特权集团的关系与其他后苏联国家毫无二致，在转型后期商业集团完成财富积累并着手国际扩张时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同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哈萨克斯坦的政府和商界之间经历了很多摩擦，但没有迹象表明商业界要象乌克兰那样决心改变影响政治的渠道。例如，阿布利亚佐夫事件就是以一种典型的不公开方式解决的：阿布利亚佐夫被任命为图兰阿勒姆银行的总裁，该行是哈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但在2008-2009年的银行国有化中阿布利亚佐夫丢掉了这个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政商关系模式的最后转型。在跨国公司的行为中既有消极的趋同又有积极的寻租，因而对改革的影响并不明朗<sup>②</sup>。

总之，就其内容来看，哈萨克斯坦政商关系模式的效率似乎有问题。同其他后苏联国家的改革进程相比，哈萨克斯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跨国公司的强大地位，这至少是一个正面因素，而政商关系也至少部分地弥补了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的绝对缺失。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方面，与国内商界的相互关系显然受到制度不协调的困扰，跨国公司的地位仍不明朗。它们以自身独特的程式化方式来游说，但制度不协调的成本也依然存在。

当转型初期的赢家获取了好处并妨碍进一步改革时，人们有可能将制度不协调成本和“转型陷阱”的现象联系起来。后者并非是制度的漏洞，而是错误地使用了最初实行的制度。事实是，任何制度，尤其是从另一个经济体中移植过来的制度，总是不完善的，这在转型初期很常见。缺陷需要在试验和纠错中慢慢克服。制度陷阱是对早先采用的制度作进一步调整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转型初期的赢家不仅利

---

① Либман А.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пыт Либер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в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е. Но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азвити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Проблем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Вып №5. Москва.:ИМЭПИ, 2003.

② А. 利布曼, Д. 乌什卡洛娃: “全球与地区制度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俄罗斯研究》, 2009年第2期。

用了新的制度安排（例如20世纪90年代广泛存在于大多数后苏联国家的金融金字塔集团，它们通常消失得也很快），也从非正式的身份（如与公职相联系）中获得了机会来利用这些漏洞。正是新的正式规则和旧的非正式的权力的结合为它们提供了获取好处的便利条件。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差异越大，正式制度被滥用的威胁和转型陷阱的成本也就越高。当然，转型陷阱也需要具体的非正式规则，是非正式制度的内容和不协调性的结合。

然而近年来，这两种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一方面启动了重新国有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对外资的态度：重申对有吸引力的资产的控制，改变了对外资的特权待遇。在再国有化方面虽比不上俄罗斯，但也是明显的。早在1997年政府重新控制核工业时（Kazatomprom），再国有化的法令就已经颁行，但直到2000年代中期再国有化才影响到油气工业<sup>①</sup>。

2008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有利于再国有化的趋势：相对发达且与世界经济结合较好的哈萨克斯坦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打击。政府对包括人民银行、图兰阿勒姆银行、卡兹可莫兹银行和阿里安兹银行在内的银行部分实施了国有化。当然这是否是临时措施还有待观察。俄罗斯在2004年银行危机中的经历表明，经济动荡有助于推动再国有化进程。政商关系的力量对比变化不仅影响了外国投资者，也影响了国内公司。然而，由于官僚们已经对国内商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变化被强调过度了。有人认为，再国有化趋势不具连贯性，它只是打击个人投资者而放过其他投资者。例如，2008年8月，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Kazmunaigaz）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Gazpromneft）分别获得了Mangistaumunaigaz 51% 和 49% 的股份。这一再国有化案例显然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阿利耶夫（Rakhat Aliev）之间的冲突有关，后者是个有影响力的政客，目前流亡欧洲，被哈萨克斯坦政府判处了20年的监禁。总的来看，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2000年代中期的再国有化浪潮非常相似，尽管前者的公共控制较后者小。哈萨克斯坦的特点是政府拥有新的手段对资产实施控制。所有部门的国有股票全都由总统直接控制下的萨姆鲁克控股集团掌握。在俄罗斯，大量的国有企业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也存在总统控制下的所谓公共公司。萨姆鲁克（Samruk）则拥有电信、油气、电站、邮政和铁路领域的公共利益。股东们并不干预公司的运行管理，但却影响其战略决策<sup>②</sup>。2008年，萨姆鲁克与国有开发基金卡兹伊纳合并，但是，仍然很难断定其对制度质量的影响：一方面，它减少了私有部门对好制度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这种需求其实已经很弱了。因此，

---

① A. 利布曼, Д. 乌什卡洛娃: “全球与地区制度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俄罗斯研究》, 2009年第2期。

② Смирнов С.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крощение Строптивых// Казахстан. 2007.№4.

没有理由去期待任何积极的制度变革，再国有化在国民经济中发起新的分配轮回是有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再国有化倒是有可能减少不协调性成本，因为它在法律上再度重申了公共权力对商业的控制，并使得政府股份更加集中（这减少了个别利益集团在公有经济部门中无条件寻租的机会）。正如萨姆（Samson）等人对哈萨克斯坦所作的预言那样<sup>①</sup>，尽管没有实现经济开放和多元化，再国有化延续了转型陷阱的存在。但这并不能抵消不断增加的寻租行为，当世界商品市场对哈萨克斯坦不再有利时，情况往往更糟。因此，从内容上看，权衡不一致性成本和无效制度是个两难的选择。而且，如上所述，个人的议程（personal agendas）和再分配可能仍然会把当前的再国有化过程变成新的寻租来源。例如在俄罗斯，通过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再集权化削减不协调性的做法产生了新的寻租来源，实际上是用新的不协调性取代了旧的<sup>②</sup>。在哈萨克斯坦可能也是如此。

最后，最令人吃惊的是当前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2000年代政商关系的结果。其实，再国有化浪潮是政商关系中常见的有关承诺问题的好例子，它通过投资哈萨克斯坦的跨国公司，同时支持并加强了现有的制度，并通过间接地改善经济状况，直接参与腐败集团而获得了国际合法性。在商品价格高企时，甚至明显的没收威胁也会导致投资获利，因此，为了免遭没收，企业无法承诺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政治权力不断增强，政治精英们更迫切地侵吞投资。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是个绝好的例子，因为与其他兴起再国有化浪潮的国家相比，哈国的领导权未发生改变，而政策却变化了。由于在早期模式中（跨国公司拥有较大权力）对好制度的需求不够强烈，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打破旧的无效率均衡，因而跨国公司为自己的灭亡打下了基础。

## 2、乌兹别克斯坦

如上所说，乌兹别克斯坦大体上保持了旧的等级经济结构。1990年代开始的小规模私有化只是把业已存在的地下活动合法化了，政府仍然控制着最大的企业和最有吸引力的资产（这事实上构成了政府和商业关系的性质）。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甚至严格限制跨境私有经济活动，从经济自由化后退<sup>③</sup>。政府几乎在所有的大中型企业里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它们或是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控股公司，或是从法律上或至少是实际上对公司决策拥有否决权。政府和企业几乎在所有的层次上融合

---

① Samson, I. Zagainova, A. Rahimov, F. and C. Locatelli,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r How to Leave the Transition Trap in Post-Soviet Economies?”, *Mimeo*, 2007.

② Гудков, Л. Итоги Путинск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07. №5.

③ Pomfret, R.W.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Princeton, 2006.

了<sup>①</sup>。但是，同其他转型经济体比起来，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却又低得出奇<sup>②</sup>。乌兹别克斯坦对私有化的接受程度在后苏联国家里也非常之低，其财产权的合法性存在很大问题，这在大公司尤为突出<sup>③</sup>。

在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出现一个商业精英能够反对或挑战政府权威的情况，就连哈萨克斯坦那种形式极其有限且最终失败的情况也未出现<sup>④</sup>。乌兹别克斯坦的少数富裕企业家都与总统关系密切。据说总统的女儿古尔娜拉·卡里莫娃（*Gulnara Karimova*）在电信、采金业、零售业、饮料、建筑材料、媒体与旅游业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sup>⑤</sup>。其它重要的商业集团包括Mirabror Usmanov（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部长和副总理：食品贸易、零售、银行和餐饮）以及Gafur Rakhimov（运输、汽车和纺织）以及Salim Abduvaliev（金属业），而后两个集团是国有企业，但却“控制金融流向”（如同俄罗斯寡头在转型初期所做的那样）。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是权力集中于政府一边的极端例子，提供了巨大的寻租机会。当然，即使这样，乌兹别克斯坦仍然存在着外国投资商对经济决策施加决定性影响的领域。蔡特勒（*Zeitler*）认为<sup>⑥</sup>，外国持股的公司较少依赖政府，吉尔摩（*Gilmore*）等人甚至认为<sup>⑦</sup>，大英美洲烟草公司控制了该国的烟草工业，是最大的外资公司之一。根据他们的研究，大英美洲烟草公司成功地影响着烟草业的现行政策，创造了有利于自己品牌并将竞争者置于不利地位的制度。所以，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体制当中，也仍然存在着私人公司寻租的空间，当然这只限于没有争议的产业中。这种政府—企业关系模式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提供了大量机会，没有迹象表明政府使用其独立地位致力于制度建设。

就一致性成本而言，乌兹别克斯坦高度集中的体制似乎与非正式的制度框架更加一致，甚至可以说，较低的 inconsistency 成本至少对20世纪90年代的“乌兹别克斯坦

---

① Melvin, N., “Authoritarian Pathways in Central Asia: A Comparison of Kazakhstan, the Kyrgyz Republic and Uzbekistan”, In: Ro'i, Y. (ed.),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in Muslim Eurasia*, London, 2004.

② Hellman, J. and M. Schankerman, “Intervention, Corruption and Captur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8(3), 2000.

③ Капелюшников Р.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без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08. №3.

④ Serra i Puig, R., “La ‘doble’ gobernanza de Asia Central: Instituciones clancas y estabilidad politica en Uzbekistan”, in: Lopez i Vidal, L. Nasirossadat, A. Serra i Puig, R. and N. S. Gsell (eds.), “Asia Central: Gobierno, cooperacion y seguridad”, *Documentos CIDOB*, No. 18, 2007.

⑤ Collins, K.,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Its Impact on Regime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2006.

⑥ Troschke, M. and A. Zeitler, *Privatisierung und unternehmerische Probleme in Zentralasien*, Ergebnisse, 2006.

⑦ Gilmore, A. Collin, J. and J. Townsend, “Transnational Tobacco Company Influence on Taxation Policy During Privatization: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and Uzbekista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7(1), 2007.

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那时其他国家追求较快的改革战略，使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尽管非正式的制度得以延续下来，但如果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它们也的确会发生改变。这样，人们可以假设2000年代初期转型较快国家的制度鸿沟变小了，它们由此获得了比较优势。如果假定乌兹别克斯坦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间并不存在不协调性，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述，法律上高度集权和等级制的制度更容易成为少数企业家寻租的工具。从这一点看，除了在两个方面以外，乌兹别克斯坦似乎重建了苏联行政管理市场的模式。首先，传统的部族变成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博弈者。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追随者网络，私下里确定了“主要产业和部门”的分工<sup>①</sup>。其次，即便是有限度的开放和准市场机制的引进，也极大地增加了寻租的可能。例如，尽管有正式的集中管理，某些企业的领导仍然拥有巨大的机会攫取财产<sup>②</sup>。权力事实上发生了蜕变，这与俄罗斯叶利钦时代国有企业的状况类似。

## 五、结 论

本文旨在理解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种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发展。哈萨克斯坦的政商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直到最近它才结合了两种政商关系的类型（特权较少的国内私营企业集团和特权较大的跨国公司），当前的再国有化过程和保护主义的增加，减少了跨国公司的影响和存在，并加强了国有公司的地位。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政商关系中占据绝对性的支配地位。

本文考察了中亚国家政商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模式的内容（由代理人的偏好及其相对权力决定）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一致性。从第一点看，哈、乌两国的政商关系至少对无效的制度均衡发挥了部分影响。在哈萨克斯坦，国内企业与俄罗斯没什么不同，同样遇到了“需求坏制度”和缺少产权合法性的问题。跨国公司本可以支持更有力的改革，但也卷入了腐败网络中并在这种无效均衡中获取利益。当前的再国有化似乎成了再分配和寻租的巨大来源。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使用其权力地位榨取好处支持特权企业。两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间都存在着显著的不协调性。可以这样说，哈萨克斯坦由于经济改革较快，在转型初期面临着更大的不协

---

① Gaman-Golutvina, O.,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Recruitment and Rotation Tendenci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6, 2007.

② Repegather, A. and M. Troschke, “Graduelle Transformation von Wirtschaftsordnungen: Ein Vergleich der Reformstrategien Chinas und Usbekistans”, *Osteuropa-Institut Working Paper*, No. 260., 2006.

调性成本，但是在转型后期由于采纳了私有行为者的预期和行为模式，这种不协调性似乎被减少了。再国有化趋势减少了不协调性成本，但并没有使其消失为零，而且一旦再国有化被用于再分配和建立新的经济权力中心，不协调性成本就可能会增加。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协调性成本类似于苏联的行政管理市场的成本，不过由于社会的氏族结构和准市场制度因素的存在，这种成本更加高昂。

（王铁军 译）

---

**【Abstract】** In most countr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In the post-Soviet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 has shown great differences and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sult of the reform strategy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further system reform. This paper aims at understanding how various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of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ountries' market econom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s amo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both the content of the pattern (depends on agents' pre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ve powers)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s.

**【Key Words】**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Nature of System, Kazakhstan, Uzbekista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бизнес, природа системы, Казахстан, Узбекистан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独立以来的转型战略：悖论和前景\*

伊尔纳扎罗夫\*\*

**【内容提要】**自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地区成了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作为曾经的苏联国家的一部分，目前该地区充满矛盾。地区内的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有趣而充满分歧的结果。取得独立后，哈萨克斯坦选择开放它的经济，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则专注于政治稳定和完全协调发展的经济。1990年代早期，乌兹别克斯坦的策略看上去更合理且更少痛苦，而哈萨克斯坦在那时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到了世纪之交，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了它的邻国。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和比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早期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战略，以及评价未来几年里这两种战略的前景和它们所隐含的意义。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转型战略

**【中图分类号】** F13/17.36.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5-0071-(20)

“我们曾在从计划和指令经济向正常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半道中陷于困境。我们创造了……这两种制度的混合形态。”

——俄罗斯总统（1991-1999）鲍里斯·叶利钦<sup>①</sup>

\* 本文是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项目“中亚地区正在出现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性支持”的成果之一。

\*\* 伊尔纳扎罗夫(Farrukh K. Imazarov)，德国哥廷根私立应用科学大学。

① Yeltsin's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March 30, 1999), see A. Åslund, "Why Has Russi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een So Arduous?",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pril 28-30, 1999),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01>, accessed on February 10, 2009.



## 一、介绍

约 17 年前，前苏联的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并将它们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虽然 17 年对历史学家来说还不是作出严肃判断的阶段，但它已足够长，能使经济学、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将他们对转型的分析和预测建立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当然，这一转型期所释放的信息和信号会被人们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为了避免主观推测和不可持续的结论，有必要建立一个可靠的理论框架。这样一来，在本文的框架内，对渐进转型和休克疗法<sup>①</sup>的分析将作为比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转型（策略）选择的主干和主要工具。由此，本文将试图回答下列研究中的问题。

1、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实行了哪种转型策略？这两国出现了什么程度的市场经济？

2、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哪个国家做得更好？为什么？

从远处看，中亚可能是一个同质的地区，（各国）有着相似的发展程度、政治结构和民族状况。还有，（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名字都以“斯坦”结尾，更让人在心理上确信，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中亚国家<sup>②</sup>。但是，如果把镜头移近该地区，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中亚各国在转型的程度、自然资源 and 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还有，显然该地区的两个重量级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令人吃惊地选择了不同道路，而且两国还在为取得地区的主导权互相竞争。在不同的转型阶段，竞争的天平时而偏向哈萨克斯坦，时而偏向乌兹别克斯坦——直到 1996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表现比它的邻居好得多，也令人印象深刻得多。但从 1999 年起，哈萨克斯坦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又远远超过了乌兹别克斯坦。本文聚焦于这两个国家，分析它们的发展路径和转型条件。

## 二、理论框架或制度很重要

根据经济改革步伐的快慢和对经济改革执着程度的不同，可以区分所谓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改革）取向。哈夫里利欣(Havrylyshyn)声称有三种不同的改革取向：渐进主义、猛冲猛撞（休克疗法）和制度主义者的方法<sup>③</sup>。巴尔舍诺维奇

---

① G. Kolodko,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A. Åslund, "Sizing up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6:2, 2003), p. 75.

③ O. Havrylyshyn, *Divergent Paths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for All or Capitalism for the Few?*, New York: IMF 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23.

(Balcerowicz)<sup>①</sup>、克劳斯(Klaus)<sup>②</sup>、萨克斯(Sachs)和胡永泰(Thye Woo)<sup>③</sup>主张在转型国家中快速实施任何可靠的变革。埃格豪(Aghion)和布兰切特(Blanchard)<sup>④</sup>，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罗兰(Roland)<sup>⑤</sup>主张，渐进的方法能使混乱和生产的损失最小化。最后，制度主义者，如默雷尔(Murrell)<sup>⑥</sup>、克莱格(Clague)和雷沙(Reuser)<sup>⑦</sup>则强调自由化中快速变革和轻重适度的制度变迁的必要性，因为（转型的）过程很花时间，而且这一过程要为充当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的主干这个目的服务。

休克疗法模型所隐含的前提假设是，放开价格将让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也跟着放开。根据休克疗法模型，没有一个自由的价格体系，（经济）结构调整就不会发生，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就不会有自由的价格体系，没有竞争货币就不可自由兑换，而没有（经济）结构调整，竞争就不会有效<sup>⑧</sup>。支持休克疗法的人声称维持扭曲的价格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低效率开发、寻租和腐败<sup>⑨</sup>。这样的互补关系容易解释：没有企业的改革，（企业）对相对的价格变动不会做出反应；价格扭曲，企业的决定不会是最优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产品价格不会完全放开，因为它们无法和国际市场的价格相匹配，只会虚涨<sup>⑩</sup>。

---

① L. Balcerowicz,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isons and Lessons", in *Second Annual IFC Lecture*, Washington: IFC/World Bank, 1993.

② V. Klaus,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a Systematic Reform Revisited", *IFC Fourth Annual Lecture*, Washington: IFC/World Bank, 1995.

③ J. Sachs and W.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April, 1994).

④ P. Aghion and O. Blanchard, "On the Speed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 S. Ficher and J. Rotemberg (ed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croeconomic Annual*,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

⑤ M. Dewatripont and G. Roland, "Economic Reform and Dynamic Political Constrai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 1992).

⑥ P. Murrell, "How Far Has the Transition Progress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 1996).

⑦ C. Clague and E. Reuser, (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⑧ J. Marangos, "Was Shock Therapy Really a Shock?",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7:4, 2003), pp. 943-67.

⑨ A. Akimov and B. Dollery, "Financial Polic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50:9, 2008), p. 14.

⑩ R. Pomfret, *Constructing a Market Economy: Diverse Paths from Central Planning in Asia and Europ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 p. 1.

反对休克疗法的人，或叫作渐进主义者，争辩说休克疗法充满着导致诸如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公和前景无法预测等悲惨后果的风险，因为立马改革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打破现存的经济和社会体制<sup>①</sup>。根据渐进主义者的观点，“自由化应该有序推进，其速度应该和市场机构及市场化过程的演进相平行。”<sup>②</sup>除其他东西外，这一过程还应包括金融合约的实施，国有公司经理根据业绩和表现而取酬的责任制，以及像批发商、银行家等“市场制造者”的出现，还有基础设施和通讯服务的提供<sup>③</sup>。除非上述这些先决条件被满足，否则“没有必要将生产资料全盘私有化、放开价格和收入、实行外汇自由兑换和建立外汇储备<sup>④</sup>。”换句话说，渐进主义者们更倾向于演进性的而非革命性的方法。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渐进主义者偏好“等等看”的经济改革方式，而休克疗法主义者更喜欢在合理合宜之时立即进行改革。

另外，还有其他学者不支持“人为地”区分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模式的观点。注意到这点很重要<sup>⑤</sup>。罗兰宣称，对一个人/国家来说，快速的方法对另一个人/国家来说可能是慢的<sup>⑥</sup>，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每个转型国家有它自身的转型经验，所以很难将它们捆绑在休克疗法或渐进主义的旗帜下。捷克共和国总统（当时是总理）克劳斯赞同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只是人为的区分的观点：

不同的措施有着不同的时间要求，比如，价格和外贸的放开可以一蹴而就；而私有化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事情在能够做的时候就做，或至少毫不拖延地准备做<sup>⑦</sup>。

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和克劳斯看法一致。他强调实施硬财政预算约束的重要性，但并不坚持马上进行其他因素的改革。他强调每个因素都有其自身的时间维度<sup>⑧</sup>。如此一来，他的观点接近菲舍尔(Fischer)和盖尔布(Gelb)的改革分阶段论。根据该理论，改革的每一部分都有其自己的时间和速度。经济变革的主要方面包括诸如宏观经济稳定、物价和市场的自由化、开放贸易和汇率体系、国有企业私有化、建立方便地

---

① K. Hawtrey,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genda* (3:2, 1996), pp. 195-206.

② A. Akimov and B. Dollery, p. 14.

③ A. Akimov and B. Dollery and J. Elliot, “The Sequencing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2: 9-11, 1995), pp. 55-79.

④ J. Kregel, E. Matzner and G. Grabher, *The Market Shock: An Agenda for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 121-122.

⑤ For instance, refer to V. Popov,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The End of the Debate (Explaining the Magnitude of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2:1, 2000); G. Roland and T. Verdier, “Transition and the Output Fal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7:1, 1999) and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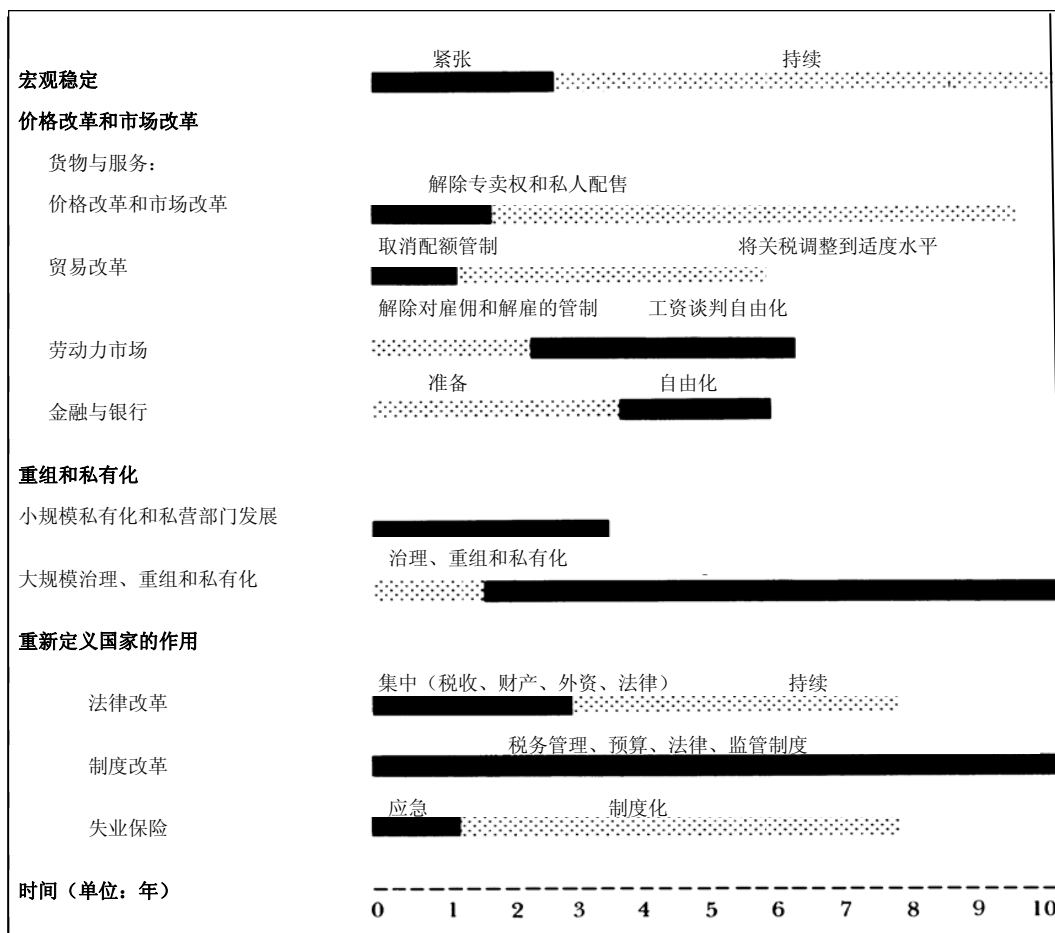
⑥ G. Ro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1, 2002).

⑦ O. Havrylyshyn, *Divergent Paths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for All or Capitalism for the Few?*, p. 19.

⑧ O. Havrylyshyn.

进入和退出市场的竞争环境，重新将政府角色定义为宏观稳定环境的提供者，一个稳定的法律框架和可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sup>①</sup>。

表 1 改革的阶段<sup>②</sup>



根据这张表（表 1），除了宏观稳定、法律改革和放开价格的例子以外，在制度建设上不需要采用快速或休克的方法；而当价格放开涉及主要的消费品（比如面包和牛奶等）时，不必采用快速或休克疗法，因为（放开得太快）将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和公众的不满。菲舍尔和盖尔布声称，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需要快速和宏观稳定，但他们也承认后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僵化，将由于产品的市场狭窄和生产过程的昂贵而阻碍上述模式的快速实施。瞬间的价格放开会保证出现可信

① Ibid, p. 20.

② S. Fischer and A. Gelb,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4, 1991), p. 102.

的预算约束逐步硬化，及把对公众的补贴转给亏本的公司；除非价格合理，否则利润和亏损不会是效率的可靠指标，因此不能作为决定哪些公司关闭或扩张的决策基础<sup>①</sup>。要让物价合理，经济体就应开放国际贸易。这样，本地的生产商不得不与外国生产商在没有保护的条件下竞争，结果不得不对付由市场制定的国际价格。最终，立即实施法律规范将创造出经济得以在其中运行的法律框架<sup>②</sup>。

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那样的国际组织，在 1990 年代初对成功的和似乎没有麻烦的经济转型提出过建议（在后阶段它们调整了对转型国家的建议）。然而，它们经常忽视了各国自身的环境和民族性，在某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有效。换言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成功转型的方法可能不适用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此，就如无数例子显示的，在成功转型方面，不存在“一个尺码适合所有人”式的方法<sup>③</sup>。就像诺斯(North)所正确指出的：

制度及其演进方式决定经济表现。制度通过决定（与所用的技术一起）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表现。制度由正式法规、非正式制约和实施制度的特征组成；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正式法规，而改变非正式的制约则非常缓慢。两者最后都由人民拥有的解释他们周边世界的主观观念决定，再反过来决定人们对正式法规和不断演变的非正式制约的公开选择。制度不同于组织。前者是游戏规则，后者是一群被共同的客观功能结合在一起的个体。<sup>④</sup>

在 1980 年代，改革者们确信任何转型都要以三根支柱为基础：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和价格开放。到 1990 年代，人们明白了，这些支柱并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平稳转型，因为现存的产权体系配不上私有化改革，当局已经腐败，几乎不能鼓励竞争，社会和政治制度威胁着投资，法制和透明度基本上缺失<sup>⑤</sup>。所以很明显地需要建立包括所有支持市场化的制度在内的足够的制度。这种情况下，罗德里克(Rodrik)建议建立下面这些制度：

- 产权制度
- 监管制度

---

① S. Fischer and A. Gelb, p. 96.

② Ibid.

③ For instance, refer to D. Rodrik,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6-167.

④ D. Nort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IDER Annual Lectures*, Helsinki: UNU/WIDER, (03/1997) and P.O. Pineau, “Productivity to Reduce Poverty: Study of a Micro Level Institution in Peru”,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9, 2004), p. 64.

⑤ D. Rodrik, p. 153.

- 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制度
- 社会保障制度
- 冲突管理制度<sup>①</sup>

#### 1、产权制度

几乎所有繁荣的经济体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此中原因是除非在企业家们对他们的资产和回报有足够的控制权，否则他们没有生产和创新的动力<sup>②</sup>。

#### 2、监管制度

市场会因各种原因崩溃。比如，由于参与者做出反对竞争的举动，或由于不充分或不完备的信息扭曲了人们的选择。因此必须有大量的监管制度来规范产品、服务、劳动、资产和金融市场的行为<sup>③</sup>。

#### 3、宏观经济稳定的制度

需要制订出财政和货币制度来起到稳定作用，因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将导致对国内经济有直接影响的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这方面，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需要被强化，以作为应对银行危机的卫士<sup>④</sup>。

#### 4、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通过为市场经济提供社会稳定和安全而使市场经济合法化；它使风险可被管理并能满足变化中的市场的要求<sup>⑤</sup>。

#### 5、冲突管理制度

社会关系紧张对任何经济体都不是好事，因此，为减少矛盾发生的可能性，需要有诸如法治、公正的法院、自由选举和独立的工会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能保障“弱势群体”，对抗“强势群体”<sup>⑥</sup>。

根据罗德里克的观点，这些制度应在构筑转型战略时给予很好的考虑；同时，他同意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各国自身的状况。

另外，科勒德克(Kolodko)就战略问题声称：

( ... )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是由结构、制度和行为转变而渐进实施的过程。正是这一漫长和复杂进程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被激进地推行。它需要时间，成本也高。它有风险，会让人民置于社会和改革的紧张关系中<sup>⑦</sup>。

---

① Ibid.

② D. Rodrik, pp. 156-157.

③ Ibid, pp. 157-158.

④ D. Rodrik, pp. 158-159.

⑤ Ibid, pp. 159-161.

⑥ Ibid, p. 161.

⑦ G. Kolodko, p. 149.

如此，关于经济从一种类型转型为另一种类型过程中的观点和模型太多，以至于 1990 年代初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不知道应该如何抉择。在这方面，实证的发现将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择的转型战略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 三、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

为总结上面提到的观点及将它们组织到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1991-2007 年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发展。这些发展将在下面详细表述，并作为对这两个中亚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平台。

表 2：自由化、稳定和私有化<sup>①</sup>

年份/国家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1991	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
1992		
1993	新货币（坦戈）诞生	
1994	开始大规模私有化；举行第一次私有化券拍卖；第一次发行国债；大多数价格被放开；实施外国投资法	新货币（苏姆）诞生；通过外国投资法
1995	建立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海关联盟；指导性放贷被废止；大多数的外贸执照被废除；通过中央银行法；对农业的国家指令被废除；使用新的税收编号 <sup>②</sup> ；使用新的海关编号 <sup>③</sup> ；禁止易货贸易；废除外汇上缴制度；实施土地法令；通过私有化法 <sup>④</sup>	修改外国投资法；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
1996	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举行最后一次私有化券拍卖；开始向支付现金的战略投资者出售（国有）企业；实行经常项目下完全的货币可兑换；第一次发售主权欧洲债券	通过私有化方案 <sup>⑤</sup> ；中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

① EBRD, Transition Reports (1995-2007).

② 1995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新的税收编号，简化了税制，并使它现代化。它将税种从 49 项减少到 11 项，并通过降低税率和税收减免以及不再以生产为基础征税而提高工作积极性。30% 税率的公司收入税和银行和保险公司税率为 45%) 取代了 45-55% 税率的利润税，收入税的最高税率定在 40%，增值税税率统一为了 20%。为了补偿因这些变革引起的预期税收下降，进口税的平均税率从 5% 上升到 15%，对某些商品征收货物税，增值税延伸到从非独联体国家进口的货物上。

③ 出口配额被取消，进出口许可证被废止。进出口关税的免税制度被取消。

④ 国家私有化方案掀起了通过拍卖和向投资私有化基金 (IPF) 出售股份使中小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浪潮。

⑤ 私有化投资基金 (PIF) 方案意在到 1998 年年中出售大约 600 家公司。

1997		废除（出口）减税和出口许可证；增加（进口）关税；启用海关编号
1998		启用税收编号；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宣布 6 家大型企业招标
1999	建立针对周边国家的临时贸易限制；开始主要的预算改革；临时重启出口（创汇）上缴规定；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首次向独联体国家发行主权欧洲债券	出口（创汇）上缴率增加到 50%；针对从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启动；取消大型铜厂的招标；通过欧盟伙伴与合作条约；启动 27 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方案
2000	临时启动石油出口配额；授予总统终身免责特权；TC Oil 公司的少数股票售予雪佛龙（Chevron）公司；建立国家基金	两种管理汇率合并；使用获得补贴的硬通货受到限制
2001	颁布资本大赦法令；启用简化了的新的税收编号	
2002	通过新的转账定价法；通过修改后的外国投资法	现金市场部分开放；提高消费品（进口）关税；启动对来回倒卖贸易者的限制
2003	实施新的土地编码	启动货币市场进一步改革（货币自由兑换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2004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将工作重点从维持汇率稳定转变为维持物价稳定	启动“本土化”计划以使乌兹别克工业现代化；取消部分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的限制
2005	实施与海上合作有关的产品分享条约的新法律；批准《采掘工业透明度协定原则》	
2006	可持续发展基金建立；新的竞争法生效	80%左右的集体农庄重组；废除某些合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2007		宣布广泛的私有化计划（仅限于非战略性产业）



表 3：企业、基础设施、金融和社会改革<sup>①</sup>

年份/国家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1991	宣布独立；通过证券和股票交易法	宣布独立；通过公司法
1992		通过竞争法；通过典当法
1993	通过银行法	通过证券法
1994	成立竞争代理机构；启用新的民事编码	建立股票交易所；通过破产法；发布证券市场法令
1995	发布关于破产的总统法令；银行和企业管理费用机构建立；启动反垄断法；通过电信法	通过电信法
1996	启用底土编码；第一次大型电力设施私有化；启用新会计标准	第一次国债发行；通过银行法；修改土地法；修改破产法
1997	实施新的破产法；通过养老金改革法；发行第一批“美国存托凭证”；建设国家电网；股票交易所开始股票交易	启用银行会计标准
1998	启动养老金改革；图兰·阿列姆(Turan-Alem)银行私有化；通过自然垄断法；批准小企业支持方案	实施受托人法；发布商业银行改革的总统法令
1999	通过新的电信法；通过新的能源法；首次发行都市债券；首次发行国内公司债券；通过检验法令	最大的商业银行部分私有化
2000	通过新的民事服务法；动力集团(Traltebel)脱离哈萨克能源系统；建立电力批发交易公司(KOREM)；建立国家开发银行	建立国家和国际电信公司
2001	建立石油天然气输送公司，创建Kaztransneftegas；通过铁路法	重组国家铁路公司
2002	创建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过新的公用事业设备关税征收方法	启动公用事业价格调整
2003	新的合资公司法生效；通过经济多样化战略	开始关税改革(但隐含的对燃料和能源行业的补贴仍巨大)
2004	国家铁路公司重组；通过新的电信法；建立维护竞争委员会；实施电力企业法	多项建立非现金支付系统的法令获通过
2005	限制外资控股银行的比例被提升到外资可持股 50%；启动强化对银行集团的监督	颁布法令规定乌兹别克电信公司是唯一电信接入提供商
2006	通过新的特许权法；电信市场完全开放	新的反洗钱法生效
2007	发布新的运输货币市场指数(Kazprime)	

从上表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因其价格放开的方法更接近于休克疗法模型，而

<sup>①</sup> EBRD, Transition Reports (1995-2007).

乌兹别克斯坦因其推迟货币可自由兑换、私有化以及放开价格和收入，更符合渐进主义模型。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哈萨克斯坦所遵循的转型战略更接近于所谓休克疗法模型，而乌兹别克的转型战略更多带有渐进的性质。人们可能会说乌兹别克没有遵循任何转型路径，而是主要由机会主义的愿望所驱使以抓住时机。但这种理解是相当天真的，因为乌兹别克的经济自独立以后就缓慢而逐步地改革，甚至在 1996 年它的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急剧下降后，经济仍在发展。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些和其他一些发展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被很详细地阐释。

#### 四、哈萨克斯坦的转型经验

哈萨克斯坦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后一个正式宣布独立的<sup>①</sup>。由于包括原油和天然气储量在内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从刚独立时起，哈萨克斯坦就被寄予厚望。然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远不成功的发展战略、低油价、糟糕的管理和腐败、以及 1998 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 2000 年前哈萨克斯坦的潜力未能发挥出来。

##### 1、自由化、稳定和私有化

起先，在 1990 年代初，哈萨克斯坦在独立之初学习俄罗斯的转型办法放开价格，比如，甚至对面包、牛奶等主要消费品也停止补贴和终止中央定价。然而，哈萨克当局在放开价格方面也并不一视同仁，他们控制着能源和农业等战略性产业。哈萨克政府还通过以“先来先得”方式出售国有资产来引进初步私有化，主要是为了积累更多的收入<sup>②</sup>。但由于哈萨克政府未能组织一套恰当的制度基础来支持这些改革，所以上述措施被证明并不成功。举例来说，哈萨克政府通过了破产法来清算亏损企业，但这些法律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和实行，因为人们相信这样做会影响当权者的寻租<sup>③</sup>。换句话说，像货币稳定、自由签约和私有产权之类的立法和制度太早熟和准备不足。该国在 1990 年代初的差劲表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经济和苏联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何干扰、失灵或保障方面的问题都会造成哈萨克经济的严重损失<sup>④</sup>。刚获得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经历了所有这些结果。例如，从哈萨克斯坦运出的大部分货物都在哈萨克以外的国家——苏联时期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工，而在“铁

---

①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Ibid, pp.44-50.

③ E. Guergen (eds.), “Economic Reforms in Kazakhstan, Kyrgyz Republic,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IMF Occasional Paper* (183, 1999), p. 4.

④ M. Kase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Syste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2:3-4, 2003), More details in appendix to be added.

幕”崩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转型向市场寻求最优的出价，而非利用与哈萨克斯坦牢固的贸易关系<sup>①</sup>。

私有化改革也未被好好组织，许多大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国投资者改造得脱离了国家<sup>②</sup>。缺乏透明度及腐败的广泛存在，创造出新的贵族和寡头。这样一来，哈萨克政府期望的向着市场经济的良好转变和补充财政的机会，最终变成了转型过程中的最大错误之一。这正好是古德西(Goodhue)、劳瑟尔(Rausser)和西蒙(Simon)作下列表述的意思：

当太强烈地追求自由化时，它实际上阻碍了遵循市场自由化原则的转型过程及降低了社会福利……与成熟经济中可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相比，转型中的市场的特征是市场条件的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市场条件包括价格和数量在自由市场的平衡。市场参与者必须通过参与市场进程了解这些条件。当这种了解的效果和分析结合起来，则私有化的最优水平会随着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而单调地下降<sup>③</sup>。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整个私有化进程未被好好组织，这样就导致了1990年代初哈萨克斯坦的私有化进程并不很平衡。

2000年，私有化的范围被缩小，进程被组织起来，变得透明和可控<sup>④</sup>。人们不难发现这样做的理由：油价不断创出新高，哈萨克政府不再那么依赖于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积累更多收入。

## 2、企业、基础设施、金融和社会改革

大量人口移居国外是哈萨克斯坦在1990年代初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这种移民是对哈萨克斯坦糟糕的经济表现和严峻的生活条件的反应或回应<sup>⑤</sup>。这时期许多人离开哈萨克斯坦不仅由于经济原因，也有种族原因：比如，一旦可能离开这个国家，德国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回到他们历史上的祖国去了。因为这个原因，在独立后的第一个10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口从1990年的1700万减少到不足1500万<sup>⑥</sup>。当我们考虑到还剩下1500万人时，这流失的200万人似乎不太重要，但我们不能忘记这导致了严重的智力枯竭，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哈萨克社会和经济中受过良好教育、有经验和技能的那部分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即使不是关键的——角

---

① Ibid.

② G. Gleason, *Market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Structural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46-47.

③ R. Goodhue, G. Rausser and L. Simon, “Privat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Learn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p. 1.

④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pp.40-60.

⑤ C. Becker, E. Musabek, A. Seitenova and D. Urzhumova, “The Migration Response to Economic Shock: Lessons from Kazakhst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107, 2005).

⑥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p. 43.

色。从油价飙升开始，移民率大幅下降，而且哈萨克斯坦第一次看到了主要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等临近国家流入的移民<sup>①</sup>。

1998 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使该国情况恶化，哈萨克政府明白该国需要急剧的变化。1999 年哈萨克当局贬值了本国货币（坦戈），希望能对付国家面临的问题。这一贬值，加上油价上升，帮助哈萨克斯坦从俄罗斯金融危机和 1991 年起失败的改革后果中迅速复苏。结果哈萨克斯坦在 2000 年年中提前还清了它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夸耀般地显示出它经济的健康<sup>②</sup>。不仅如此，2000 年在西哈萨克斯坦发现大量新的原油储量，极大地增加了其石油收入，并且吸引到全球对其经济的投资。最近几年，哈萨克斯坦经济欣欣向荣，只在 2007 年中期有所放缓<sup>③</sup>。许多分析家和专家在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繁荣称为哈萨克经济奇迹时还颇为谨慎，因为它主要是建立在开发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无论怎样，石油收入相对成功地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采掘工业）和制度建设（启动和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反洗钱的立法）上，同时也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一个不需要向外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借贷的自给自足的国家<sup>④</sup>。

## 五、经济繁荣的负面影响

对哈萨克斯坦未来前景的主要担忧，是其过分依赖石油和几个主要商品的价格，缺乏恰当的制度框架，中小企业效率低下、对社会领域投资不足，以及带有本地特色的腐败。另一个问题是，制度框架建设必须要赶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这只能由哈萨克当局直接参与制度建设过程才能做到<sup>⑤</sup>。在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是个无处不在的、严重的问题。目前该国在“透明国际”对 179 个国家进行的腐败排名中位居第 150 位<sup>⑥</sup>。很明显，目前对此还没有什么良方，但它能加快哈萨克政府进一步增加透明度的努力，特别是在诸如私有化和政府采购投标的问题上。这将有助于公平分配石油收入和保证长期经济发展，以及防止本地贵族暴富。日本经

---

① M. Laruelle, “Kazakhstan, the New Country of Immigration for Central Asian Workers”,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30-04-200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4848>, accessed on May 10, 2008.

②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p. 41.

③ V. Yaduha, “Nazarbayev Prizval Zatyanut’ Poyasa”, *RBC Daily* (07.02.200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rbcdaily.ru/2008/02/07/focus/319561>, accessed on February 24, 2008.

④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⑤ P.J. Luong, “Economic Decentralisation in Kazakhsta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P.J. Luong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⑥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0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07](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07), accessed on April 14, 2008.

济表明，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应鼓励和帮助中小企业发展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并不是个例外，它应该为了保证自身的长期前景而学习日本人的榜样。

哈萨克斯坦需要立即行动改善其健康保障系统，因为几乎所有健康指标，除母婴保健以外，都低于 1991 年的水平<sup>①</sup>。不断增长的艾滋病患病率也是一个需要在其达到失控点之前尽快处理的问题。

2003 年哈萨克政府宣布了其试图通过将石油收入投资于其他部门使经济多元化的意向，这些部门包括信息技术、太空产业、农业和与石油相关的部门。为支持这一战略，成立了三个机构，即投资基金、开发银行和国家创新基金<sup>②</sup>。这清楚地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过分依赖于一个部门（即使这是一个收入丰厚的部门）的问题。然而现在评价上述机构的工作成绩还太早（就时间而言），至今只有对农业的投资显示了可感知的成功。

## 六、乌兹别克斯坦的转型经验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国家中人口最多。该国拥有重要的商品，如原油、天然气、棉花、黄金和铀。1990 年代早、中期乌兹别克的经济表现被称为“乌兹别克悖论”或“乌兹别克困惑”<sup>③</sup>。贴上这块标签的原因不难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敦促乌兹别克政府在把计划经济转向成市场经济时进行剧烈的改革，以避免负面的动荡和使转型更顺利<sup>④</sup>。令这些国际组织大为失望的是，乌兹别克当局宣布在经济转型中它将采用渐进主义的方式<sup>⑤</sup>。乌兹别克政府的决定未获得国际运作者的同意，预期的结果似乎不妙。然而，独立后前 10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表现颠覆了所有的悲观预期。举例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治理质量指数排在 20 个转型经济体的第 4 位，在独联体国家中排名第一；到 1996 年，它累计的 GDP 下降幅度是前苏联国家中最小的<sup>⑥</sup>。但渐进主义不是“乌兹别克悖论”的唯一原因。1991-1996 年间黄

---

① “Country Assistance Evaluation of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05).

②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③ For instance, refer to M. Spechler, S. Chepel, F. Suvankulov and K. Bektemirov, “The Uzbek Paradox: Progress without Neo-Liberal Reform” in G. Ofer and R. Pomfret (eds.), *The Economic Prospects of the CIS-Sources of Long Term Growth since 1991*,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pp. 177-197.

④ G. Gleason, pp. 127.

⑤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ountry Strategy and Program Update 2002-2004: Uzbekista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ountry Strate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db.org/Documents/CSPs/UZB/2001/csp100.asp>, accessed on 12/ 11/2008.

⑥ C. Gray, J. Hellman and R. Ryterman, *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2: Corruption in Enterprise-St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1999-2002*,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4.

金和棉花价格上涨，为乌兹别克带来巨额收入以维持收支平衡。石油自给自足是创造“乌兹别克悖论”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可以避免被迫地从苏联时期由莫斯科制定的非市场价格跳到由市场制定的世界价格<sup>①</sup>。

与哈萨克斯坦不同，乌兹别克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它的主要工业、产业和改革举措，比如黄金开采、棉花种植、汽油和私有化。如此，从1996年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战略是明确的内部驱动性的。借助于各种关税壁垒和进口替代措施，政府建立起无数对国际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但或许能保护本地生产者的保护主义措施。另一个悖论是，国家的投资额不大，但乌兹别克政府却能够吸引可口可乐、纽蒙特(Newmont)、英美烟草公司和大宇等巨型公司到乌兹别克投资<sup>②</sup>。这一战略在短期内被证明是成功的，但长期而言它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端。

## 七、被击碎的幻觉

### 1、自由化、稳定和私有化

1995-1997 间世界棉花和黄金价格的下跌让乌兹别克政府对渐进改革的欣快感遭遇挫折<sup>③</sup>。很明显，制度变革的问题没有被解决而只是被拖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时在外汇开放方面加大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压力。但由于世界棉花和黄金价格的下跌未能阻止该国经济表现的惰性，因此乌兹别克政府一再重申它还没有准备好完全开放外汇<sup>④</sup>。这样的声明无助于该国的长期发展和增长，并且被许多专家认为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然而，科勒德克指出“有些转变是由意识形态或政治驱动的，并受到对社会内涵漠不关心的团体的欢迎”<sup>⑤</sup>。这种情况下，（乌兹别克政府的）那些步骤就相当可以理解了，尽管长远来说他们不利于生产发展及对经济有损害。

与哈萨克斯坦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只将一家大企业——一家水泥公司卖给了外国投资者。其他大企业都由政府在协调，要么直接控制，要么通过掌控利益来控制。乌兹别克斯坦不太愿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组织借钱，因而大部分依靠自身的收入。由于这样，乌兹别克的外债保持在很低的水平<sup>⑥</sup>。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GDP在1996年后继续增长，但与哈萨克斯坦相比，这种增长微不足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各种外来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而主要

---

①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②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③ M. Spechler, "Hunting for the Central Asian Tige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2:3, 2000), p. 10.

④ IMF Urges Uzbekistan to Speed Up Reform, *The Moscow Times* (March 16, 2005).

⑤ G. Kolodko, p. 147.

⑥ R. Pomfret,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Since Independence*.

的原因是外汇管制、极其谨慎的经济政策和寻租活动。看上去，在这一转型阶段的乌兹别克经济更接近于苏联计划经济，而非有管理的市场经济。举例来说，种植棉花和小麦的乌兹别克农民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政府不允许他们将作物卖给市场上出价最高的人，反而要完成由当局商品委员会制定的计划（通常是超额的），将它们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国家<sup>①</sup>。原则上说，剩余部分可在市场上出售，但实际上，过高的计划没给农民留下剩余作物可卖。

人们现在清楚了，为什么 1996 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相对良好的经济表现和相对顺利的转型会被打上似是而非的“乌兹别克困惑”的标签。被设计好的乌兹别克体制（有人声称那不是设计的，而是外部因素和乌兹别克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清楚地显示出它在新的挑战和变化的环境面前缺乏足够的弹性<sup>②</sup>。因此，在 21 世纪早期，为了应对现存的挑战，某些制度得到了调整。比如乌兹别克政府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货币问题上的建议，诸如本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及实行浮动汇率制。

## 2、企业、基础设施、金融和社会改革

乌兹别克当局不愿意开放汇率的负面效果是影子经济盛行：国家（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的差距达到 200-300%，结果，大多数公司不愿通过官方渠道出口，并探寻各种各样的漏洞，结果使得出口收入大幅下降。不过这一情况没有在官方统计中得到恰当的反映，因为统计数据受到当局的严重操纵，目的是想遮掩出口商品的价格，因为付给本地生产商的价格是以官方汇率为基础的<sup>③</sup>。

独立后的第一个 10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该国建立了 9 年学校义务教育和 2-3 年继续教育的体制，最后 2-3 年教育在预科或专科学校进行。至于大学教育，苏联式的 5 年制教育被学士（4 年）和硕士（2 年）的教育体系取代。虽然在学士的学习层次，大多数大学的教育标准多多少少可以被接受，而硕士层次的教育甚至经常令导师和讲师们困惑，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是人为制定的，而非演变的结果。简而言之，5 年制的苏联式教育体制被延长到 6 年，内容却没有多大改变。这极大地影响了硕士层次的教育质量，根据国际标准这是很差的质量。无论如何，对那些想在政府的结构中工作和升迁的人来说，硕士学位是绝对需要的。

乌兹别克教育体制的另一个尖锐问题是贿赂——许多教师和学生为了打分而谈价钱。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是减少乌兹别克当局对教育的控制以开放教育体制。建立私立学校和大学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尽管这是一个解决办法，然而教育部因

---

① M. Spechl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36.

② G. Kolodko, p. 148.

③ “Uzbekistan: Stagnation and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riefing 67: August 22, 2007), p. 4.

以下两个理由，立场坚定地予以拒绝：1) 这样做国家的政治稳定将会出现问题，2) 它会严重影响官员们的寻租。

改革医疗系统的努力看上去是相当成功的——仅举一例，政府废除了乌兹别克医疗体系里的几个官僚层次，给予全科医生更多的责任以保证该体系的整体效率。然而这些改革还是不充分的，因为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仍是政府的沉重负担。结果，医疗服务的质量很低，患者所需的药物明显短缺。与教育系统的经历不同，政府允许私人诊所开业，提供各种医疗服务。虽说这些诊所的服务质量相当不错，但价格远非普通民众所能承受。另一个和医疗有关的方面是，尽管药物依赖者和艾滋病患者近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绝对人数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精确的数字还有待验证）。

## 八、变革之风？

9·11 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提高了对中亚，特别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关注。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建立了空军基地，许多投资者希望此举能给乌兹别克的经济和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对乌兹别克缓慢的改革、不断增长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对私有化了的中小企业的无数限制感到失望<sup>①</sup>；而 2003 年 5 月在塔什干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年会上，由于其糟糕的人权记录，乌兹别克被减少甚至被终止了动议权<sup>②</sup>。

2005 年，卡里莫夫总统命令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和支持中小企业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投资者们对乌兹别克当局的这一举措作出了正面的回应。2005-2006 年，流入该国的投资上升了 42%<sup>③</sup>。

总体而言，考虑到它的巨大潜力，乌兹别克斯坦的转型不算坏，但可以做得更好。当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问题是缓慢的改革、日渐衰落的教育体制、不平衡的汇率机制、拖拉的官僚程序、中小企业运行中的障碍，以及和哈萨克斯坦一样的无处不在的腐败。

在教育系统遭受不可挽回的破坏之前，政府需要立即对其进行直接干预。为提高教育的整体质量，凡达到教育部设定的教育标准的私立大学和学校都应该允许设立，以提升教育机构间的竞争。教师的工资也要提高。然而，这需要好好计划和逐

---

① “Uzbekistan: Business Outlook”, *Business Eastern Europe* (October 15, 2007).

② R. Synovitz, “Uzbekistan: EBRD Freeze on Aid Praised by NGOs”, *Radio Liberty* (April 19, 2004).

③ “Uzbekistan at a Glance”, *World Bank Country Report* (2007).



步实施，因为急剧的变化又会充满问题，例如教师们从公立大学集体跳槽到私立大学，因为后者作出了提供更高薪水和更好工作条件的承诺。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一过程的某些步骤已经在做了：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塔什干建立英国威斯敏斯特国际大学和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分校。

至于同腐败问题作斗争，仅仅增加透明度和提高公务员的责任心或许不是办法，但可以大幅缩小腐败的范围。该国在 2007 年透明国际对 179 个国家的排名中名列第 175 位<sup>①</sup>。还有，中小企业应该被给予更大的空间来实现它们的经济潜力，因为归根到底，一个合法的工作环境将使乌兹别克当局征收到更多税款及保证经济的整体健康。

## 九、前 景

当前趋势显示，哈萨克斯坦更有机会在经济方面成功，超过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地区的领导国。虽然哈萨克斯坦荒废了其独立后的第一个 10 年，（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拙劣的经济政策选择，以及（次要是）它主要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但该国似乎已能够从差劲的开始阶段恢复过来，将经济纳入正确的轨道。而乌兹别克斯坦，由于（主要是）其良好的经济政策选择如平衡的私有化，以及（次要是）它主要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在开始阶段表现得前途无量，但在世纪之交，它发现自己已落后于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方式的多样化将为它们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和防止患上“荷兰病”打下基础<sup>②</sup>。比如说，如果哈萨克斯坦建造一条新的输油管道以使其石油供给多样化，那么它就将成为加快该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利润丰厚的源泉<sup>③</sup>。

能增加哈萨克斯坦在中期的领先优势的另一个方面是该国的政治稳定。想象一下，哈萨克的权贵们已经通过非法的和半合法的手段，利用私有化和腐败的机会分得了一块饼，现在他们争取通过建立起法制和恰当的制度框架来保护赃物。这一假设会引出结论：哈萨克斯坦会尽一切努力降低该国的腐败程度，并保证国家不再遭受像 1990 年代初那样的肆无忌惮的腐败侵害。

如果乌兹别克能开放经济，创造出有吸引力的投资氛围及降低智力流失的程度，

---

①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07”。

② C. Dunis and G. Shannon, “Emerging Markets of South-East and Central Asia: Do They still Offer a Diversification Benefit?”, *Journal of Asset Management* (6:3, 2005), p. 172, see also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7: People in Transition (2007)*, p. 143.

③ “Central Asia: the Risks of Contagion”, *Emerging Markets Monitor* (11:7, 2005), p. 15.

那么它将能够挑战哈萨克斯坦在地区中的领先地位。另外，乌兹别克政府应该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搬掉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些措施将促进该国中期的经济成功，并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若不能遵循上述措施的话，将造成悲惨的后果，比如经济停滞和进一步衰退，还有在未来很多年里更加拉大与哈萨克斯坦的差距。

为了发展和提升作为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支柱的适当的制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它肯定需要国内和国际行动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但所有这些建议如果不符合统治权贵们的利益，它们终将一事无成<sup>①</sup>。科勒德克指出，渐进转型的方法如果用在合适的制度建设上，它将成果丰硕，而从制度改革的角度看，仅仅是“不浪费而已”<sup>②</sup>。科勒德克进一步声称，没有一个由政府提倡和实施的合适的制度框架，整个转型过程将会溢出，转变为“裙带资本主义”<sup>③</sup>。仔细观察的话，这两个中亚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

如果没有对用什么方法建立新制度的远见及对用什么方法使新制度运行的理解，新制度将不能被顺利地和轻易地建立起来。转型过程将延长；代价将上升，且结果将比人们预期的差：衰退时间过长，复苏来得太晚，产出只能非常缓慢地增长<sup>④</sup>。

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没有这样的远见或许不对，毋宁说它们不愿意实现这一远见，因为那样做会严重影响它们的寻租。如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当该远见多少迎合现状或至少不对现状产生不利影响，它才能够被实施。另一个问题是，在旧的制度安排被抛弃时，新的还未出现。举例来说，*私有股权交易计划*已不复存在，而一个成熟的股票交易市场也未建立。在这种动荡的时刻，政府应该建立和实施临时的制度安排，但要确定哪种临时制度能为此目的服务是困难的。

当下，哈萨克斯坦在制度上适应市场经济的努力（私有化、汇率放开、价格和贸易放开），企业治理、重构和竞争的政策等，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评估为好于乌兹别克斯坦——在总共 1 到 4 分（4 分最高）中，哈萨克斯坦平均得分 2.9，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初始改革方面胜过哈萨克斯坦，平均得 2 分，主要失分在改革的实施这一项目上<sup>⑤</sup>。

---

① P.J. Luong, “Political Obstacles to Economic Reform in Uzbekistan, the Kyrgyz Republic, and Tajikistan: Strategies for Moving Ahead” in C. Shiells and S. Sattar,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② G. Kolodko, p. 143.

③ G. Kolodko, p. 144.

④ Ibid, p. 144.

⑤ *EBRD Transition Indicators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index.htm> - accessed on April 28, 2008.

许多专家、专业人士和分析家呼吁的所有中亚国家的理想图景是实现区域一体化。许多支持和反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意见都被提出了（支持意见远远多于反对意见）<sup>①</sup>，但几乎没有行动或即将开展的行动，因为中亚国家的领导人都把他们自己的雄心壮志凌驾于一体化可能带来的好处之上。结果，中亚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把它们的一些力量交给那个超国家机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受到对对方的负面态度所驱使，使将来它们经济融合的余地很小；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转型路径，使它们将来找到共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共识的机会也进一步缩小。

（王时芬 译，译者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金月 校）

---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entral Asia region has become a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part of the past Soviet Union, this region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t present. Two major countries in this area -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have chose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ch led to interesting and results full of differences. After gaining independence, Kazakhstan chose to open up its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of Uzbekistan chose to focu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economy. In the early 1990s, Uzbekistan's strategies seemed more reasonable and less painful, and Kazakhstan suffered a severe economic recession. However, b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Kazakhstan's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far better than its neighb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two different transition strategies of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ndependence, and evaluates the prospects of these two strategie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nd their implied meaning.

**【Key Words】** Kazakhstan, Uzbekistan,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азахстан, Узбекистан, стратег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

（责任编辑 郭金月）

---

<sup>①</sup> For instance, refer to D. Bartlet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the case for Region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3:1, 2001) and V. Paramonov (e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View from Uzbekistan",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49:4, 2006).

经济

## 关于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

郭晓琼\*

**【内容提要】** 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问题一直是个学术界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本文根据“荷兰病”的理论模型,分别从国际油价上涨是否导致汇率上升、制造业部门是否表现出“去工业化”现象和工资上涨的效应是否存在这三方面,运用协整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讨论了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问题,并综合三方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了俄罗斯存在一定程度的“荷兰病”现象的结论。

**【关键词】** 俄罗斯、“荷兰病”、资源转移效应、支出效应、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13/17.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5-0091-(11)

“荷兰病”(Dutch disease)一词最早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盾持续升值,通货膨胀难以抑制,国内非资源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最终缺乏后劲。人们把这种综合症称作“荷兰病”<sup>①</sup>。

### 一、“荷兰病”的理论模型

模型假设如下:(1)一国的经济被抽象为三部门,包括石油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2)三部门之间的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可自由流动;(3)石油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为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其价格决定是外生的;(4)服务业部门为非可贸易部门,其价格决定是内生的。<sup>②</sup>

\* 郭晓琼,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助理研究员。

① Rudiger Ahrend, Donato de Rosa, William Tompson, “Russian Manufacturing and the Threat of ‘Dutch Disease’: a Comparison of Competitivenes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and Ukrainian Industry”,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540, 25 Jan., 2007.

② Nienke Oomes, Katerina Kalcheva, “Diagnosing Dutch Disease: Does Russia Have the Symptoms?”, *IMF Working Paper*, WP/07/102., April, 2007.

石油价格上涨的效应分析：

石油价格上涨的效应包括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石油价格的增长带来石油部门劳动力和资本需求的增大，引起该部门工资的上涨和资本回报的增加。资源转移效应引致劳动力和资本从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流向石油部门，石油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雇佣将因此而增加，而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雇佣将会减少，这导致“直接去工业化”。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价格由本国供求决定，产出下降导致价格上升；对于制造业和石油部门而言，其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外生决定的。三部门价格变动的综合结果是，不可贸易商品相对于可贸易商品价格上涨，引起本币升值。

石油上涨的支出效应与石油部门雇佣劳动力无关。支出效应是因为高油价提高了石油部门的工资和收益，导致了总需求的增加。某种程度上，一部分需求转移到国内服务业，服务业价格将会上涨，而石油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外生决定的。这又会使汇率上升，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导致可贸易部门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将引起产出和要素需求的下降。对于制造业部门而言，这一效应被Corden和Neary称之为“间接去工业化”<sup>①</sup>。

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对各部门产出、要素、工资和价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表 1 石油价格上涨的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

	产出	劳动力雇佣	工资	价格
资源转移效应				
石油部门	+	+	+	外生给定
制造业部门	-	-	+	外生给定
服务业部门	-	-	+	+
支出效应				
石油部门	-	-	+	外生给定
制造业部门	-	-	+	外生给定
服务业部门	+	+	+	+
综合效应				
石油部门	不确定	不确定	+	外生给定
制造业部门	-	-	+	外生给定
服务业部门	不确定	不确定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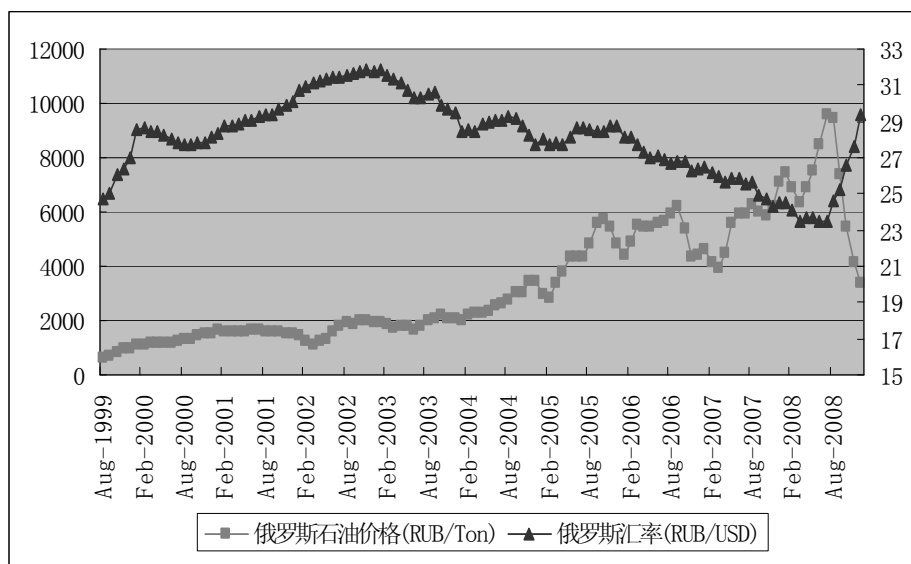
① Corden W.M., Neary J.P.,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2, Dec., 1982.

综合以上两种效应，“荷兰病”表现为以下四种症状：第一，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上升，引起汇率上升；第二，制造业产出和劳动力需求出现明显下降，表现为直接和间接的“去工业化”；第三，综合效应下，石油部门和服务部门产出和劳动力变化并不明确，因为在这两个部门中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的作用力相反。第四，如果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工资全面上涨。

## 二、对俄罗斯是否患有“荷兰病”的检验

### （一）油价上升是否导致汇率上升

“荷兰病”的一个重要症状是油价上升导致汇率上升，图 1 列示了俄罗斯 Urals 牌石油价格与美元兑卢布汇率的时序图。从该图中可以看出，2003 年 1 月以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对应着卢布的持续升值，2008 年 7 月之后，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对应着卢布的贬值。



资料来源：datastring

图 1 俄罗斯石油价格（Urals 牌）与俄罗斯汇率

然而，汇率的涨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得出油价上升导致汇率上升的结论。因此，本文考虑到其他因素，使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模型对俄罗斯汇率变动的原因进行解释。由于本文主要考察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因此油价是模型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汇率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可贸易部

门的生产率提高，这主要通过布拉萨—萨缪尔森效应<sup>①</sup>实现，计量模型中一般选取本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生产率差异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本文无从得到俄罗斯生产率的指标，故此变量省略不加考虑；另外，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汇率变化，如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的购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汇率上升的压力，因此本文选取外汇储备作为央行对冲汇率上升的代理变量<sup>②</sup>。

协整检验 (Cointegration Test) 是用来检测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检验要求各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即经过差分之后是平稳过程。下面对汇率 (EXRATE)、石油价格 (OIL\_PRICE) 和外汇储备 (NIR) 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由于外汇储备只有季度数据，本文采用 8 期移动平均得到各期值；然后对每个变量进行取对数，使得数据的波动减小。其次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观察各变量经过几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检验结果 (见表 2 至表 7) 表明三个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都是平稳的。在满足一阶单整的前提下可以进行三个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表 2 汇率取对数后的水平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假设: LN_EXRATE <sup>③</sup> 存在单位根				
外生变量: 常数项				
滞后期: 1 (自动依据施瓦茨准则, 最大滞后期=12)				
			T统计量	可能性.*
增广的迪克-富勒检验统计量			-0.666427	0.8495
检验的置信水平:	1% 水平		-3.495021	
	5%水平		-2.889753	
	10%水平		-2.581890	

① 布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指：本国产品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超过产品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且相对生产率的的增长（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超过贸易伙伴国时，本国汇率将上升。

② 2004 年 1 月以后，俄罗斯建立了联邦储备基金，将石油出口超过基准价格的部分收入计入稳定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汇率上升的作用，但由于稳定基金的月度余额数据不可得，本文不作考虑。

③ LN\_EXRATE 表示汇率取对数。

表 3 汇率取对数后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假设: $D(LN\_EXRATE)^{\textcircled{1}}$ 存在单位根				
外生变量: 常数项				
滞后期: 0 (自动依据施瓦茨准则, 最大滞后期=12)				
			T统计量	可能性.*
增广的迪克-富勒检验统计量			-6.980175	0.0000
检验的置信水平:	1%水平		-3.495021	
	5%水平		-2.889753	
	10%水平		-2.581890	

表 4 油价取对数后水平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假设: $LN\_OIL\_PRICE^{\textcircled{2}}$ 存在单位根				
外生变量: 常数项				
滞后期: 2 (自动依据施瓦茨准则, 最大滞后期=12)				
			T统计量	可能性.*
增广的迪克-富勒检验统计量			-0.609322	0.8628
检验的置信水平:	1%水平		-3.495677	
	5%水平		-2.890037	
	10%水平		-2.582041	

表 5 油价取对数后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假设: $D(LN\_OIL\_PRICE)^{\textcircled{3}}$ 存在单位根				
外生变量: 常数项				
滞后期: 1 (自动依据施瓦茨准则, 最大滞后期=12)				
			T统计量	可能性.*
增广的迪克-富勒检验统计量			-8.080762	0.0000
检验的置信水平:	1%水平		-3.495677	
	5%水平		-2.890037	
	10%水平		-2.582041	

①  $D(LN\_EXRATE)$ 表示汇率取对数后作差分。

②  $LN\_OIL\_PRICE$  表示油价取对数。

③  $D(LN\_OIL\_PRICE)$ 表示油价取对数作差分。



表 6 外汇储备取对数后水平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假设: LN_NIRMA8 <sup>①</sup> 存在单位根				
外生变量: 常数项				
滞后期: 8(自动依据施瓦茨准则, 最大滞后期=12)				
			T统计量	可能性.*
增广的迪克-富勒检验统计量			-0.517534	0.8821
检验的置信水平:	1%水平		-3.499167	
	5%水平		-2.891550	
	10%水平		-2.582846	

表 7 外汇储备取对数后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假设: D(LN_NIRMA8) <sup>②</sup> 存在单位根				
外生变量: 常数项				
滞后期: 7(自动依据施瓦茨准则, 最大滞后期=12)				
			T统计量	可能性.*
增广的迪克-富勒检验统计量			-3.688879	0.0057
检验的置信水平:	1%水平		-3.499167	
	5%水平		-2.891550	
	10%水平		-2.582846	

协整检验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 是否存在协整向量, 二是, 如果存在协整向量, 则估计出协整方程。由 Eviews6.0 估计的协整结果如下, 迹 (Trace) 检验和最大特征根 (Maximum Eigenvalue) 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明在 5%的置信水平上, 方程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① LN\_NIRMA8 表示外汇储备的 8 期移动平均值取对数。

② D(LN\_NIRMA8) 表示外汇储备的 8 期移动平均值取对数后作差分。

表 8 三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结果

日期: 09/11/09 时间: 15:48				
样本(调整后): 2000M05 2008M09				
包括的观测值: 调整后101个				
趋势假设: 确定性线性趋势				
序列: LN_EXRATE LN_OIL_PRICE LN_NIRMA8				
滞后间隔(一阶差分后): 1到3				
非限制的协整检验 (迹检验)				
假设		迹	0.05	
没有协整关系	特征根	统计量	置信水平	可能性**
没有*	0.197974	34.04854	29.79707	0.0153
至多1个	0.079600	11.76648	15.49471	0.1685
至多2个	0.032996	3.388868	3.841466	0.0656
迹检验提示在0.05的置信水平存在 1 个协整关系				
* 在0.05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				
** 根据麦金农—郝格—米车里斯的P值(1999)计算				
非限制的协整检验 (最大特征根检验)				
假设		最大特征根	0.05	
没有协整关系	特征根	统计量	置信水平	可能性**
没有*	0.197974	22.28207	21.13162	0.0343
至多1个	0.079600	8.377608	14.26460	0.3416
至多2个	0.032996	3.388868	3.841466	0.0656
迹检验提示在0.05的置信水平存在 1 个协整关系				
* 在0.05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				
**根据麦金农—郝格—米车里斯的P值(1999)计算				

表 9 给出了协整检验估计的方程，表中的方程 1 是将三变量写成一个方程的形式，方程 2 则是将三变量写成矩阵形式，两者表示的含义是一致的。因此，本文仅对方程 1 进行分析，方程 1 显示汇率与油价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表示油价的上升导致汇率下降，由于本文的汇率采用的是直接标价法，这意味着油价上升导致卢布升值；外汇储备与汇率的关系是正相关的，表示外汇储备的上升对应着汇率上升，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起到了抑制卢布升值的作用。从协整系数的绝对值看，油价对汇率的影响超过外汇储备对汇率的影响，前者的系数为-0.80，后者的系数为 0.61。这说明外汇储备增加对卢布升值的抑制作用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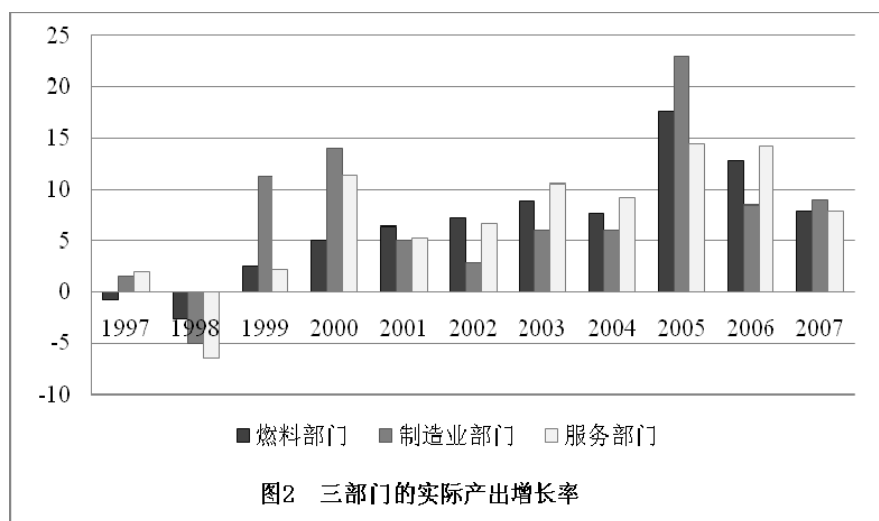
表 9 协整检验估计的方程

1个协整方程:		对数似然估计值	691.9302	
标准化的协整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差)				
LN_EXRATE	LN_OIL_PRICE	LN_NIRMA8		
1.000000	-0.798785	0.612327		
	(0.22178)	(0.12941)		
调整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差)				
D(LN_EXRATE)	-0.007725			
	(0.00785)			
D(LN_OIL_PRICE)	0.126592			
	(0.04788)			
D(LN_NIRMA8)	-0.055416			
	(0.01707)			
2个协整方程:		对数似然估计值	696.1190	
标准化的协整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差)				
LN_EXRATE	LN_OIL_PRICE	LN_NIRMA8		
1.000000	0.000000	0.103169		
		(0.01760)		
0.000000	1.000000	-0.637416		
		(0.04113)		
调整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差)				
D(LN_EXRATE)	-0.057715	-0.003645		
	(0.02416)	(0.00759)		
D(LN_OIL_PRICE)	-0.125290	-0.150575		
	(0.14866)	(0.04668)		
D(LN_NIRMA8)	-0.079679	0.039502		
	(0.05387)	(0.01692)		

(二) 制造业部门是否表现出“去工业化”现象

对于油价上升是否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去工业化”，本文使用分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年度数据进行考察。由于2005年俄罗斯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燃料部门在2004年之前包括：石油开采部门、石油加工部门、天然气和煤炭部门，而2004年之后指的是采掘业中的能源开采。另外，产出增长率经过价格平减，采用实际值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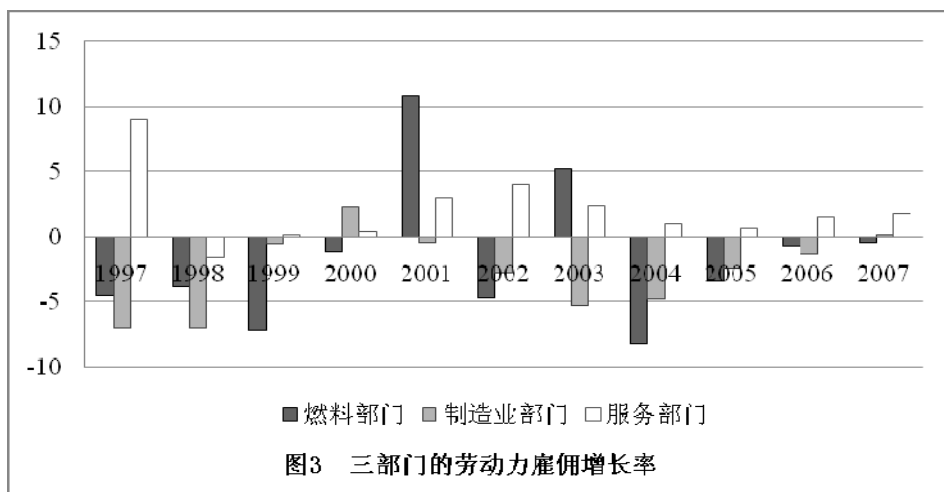
图 2 描述了三部门的实际增长率情况，从该图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部门并没有出现“绝对去工业化”（制造业部门的负增长）的现象。制造业部门负增长仅出现在 1998 年，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经济正面临转轨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其他两部门也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制造业出现“绝对去工业化”。然而，俄罗斯制造业部门“相对去工业化”的现象是存在的。图 2 显示，2001 年至 2007 年（2005 年与 2007 年除外）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都低于燃料部门的产出增长率。2005 年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高于燃料部门的原因恰恰是油价下跌，Urals 牌石油价格由 2005 年 9 月的 5713 卢布/吨急剧下降至 2006 年 1 月的 4443 卢布/吨(图 1)。2007 年油价经历了两次下跌，一段是 2007 年 1 月至 3 月，另一段是 2007 年 8 月至 11 月（图 1），由于下降幅度不大，因此制造业产出增长率只是略高于燃料部门。另外，2000 年之后，服务业的产出增长率一直高于制造业（2005 年和 2007 年除外，这两年存在油价下跌的情况，正好从反向验证了“荷兰病”），甚至有的年份高于燃料部门，这说明俄罗斯的支出效应要强于资源转移效应。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www.gks.ru.

图 3 描述了三部门的劳动力雇佣情况，从该图中可以看出，2000 年之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雇佣一直呈现负增长。从增长率趋势看，可以划分为 2001 至 2003 年和 2004 至 2007 年两个时期。在 2001 至 2003 年，制造业呈加速下降趋势，而燃料部门则有增有减，这说明制造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失现象严重；2004 至 2007 年，燃料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雇佣有恢复趋势，燃料部门的恢复趋势要快于制造业部门，这说明燃料部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高于制造业部门。另外，服务业的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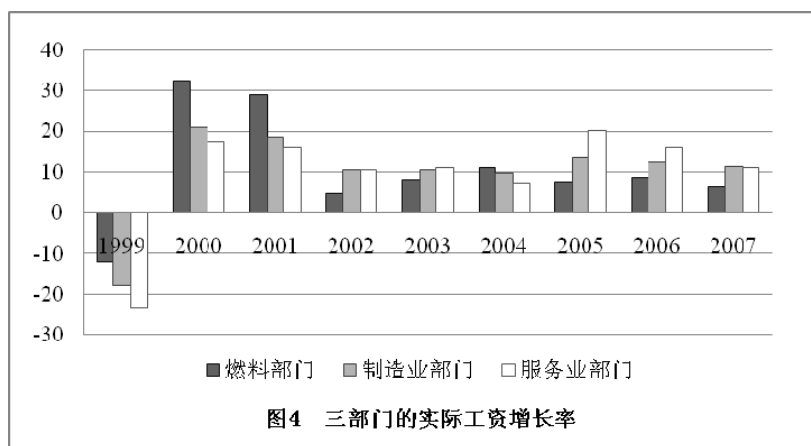
雇佣一直处于正增长，在排除产业结构内生变化规律的前提下，这也是“荷兰病”的一个表征。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www.gks.ru。

### （三）工资上涨的效应是否存在

图4描述了三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从该图中可以看出，从2000年之后，所有部门的实际工资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增长率为正），这与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都相符。最初燃料部门工资增长最为迅速，随后其他部门的工资水平也迅速上涨，甚至超过燃料部门，这符合“荷兰病”的病症。另外，2005年的油价下跌使得2005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低于2004年，2007年的油价下跌也产生同样的结果。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www.gks.ru。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俄罗斯存在一定程度的“荷兰病”现象。首先，本文经过协整检验发现，油价的攀升导致了汇率的上升；其次，在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相对于燃料部门的增长要慢，在油价部分下跌的2005年和2007年，其运动趋势完全相反；再次，从劳动力雇佣看，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雇佣的变化速度（无论是加速下降还是在恢复时期）低于燃料部门，这说明燃料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更具弹性；最后，油价上升也带来了实际工资的普遍上涨。

---

**【Abstract】** Whether Russia is suffering from “Dutch disease” has been a focus of debate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Dutch diseas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pproaches including co-integration test, th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whether Russia is suffering from “Dutch disease” from three aspects: whether rising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led to the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whether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phenomenon is appear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whether the wages are rising.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re exists a certain degree of “Dutch disease” phenomenon in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Dutch disease”, Resources Transfer Effect, Expenditure Effect, Empirical Analysi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голландская болезнь», эффект перемещения ресурсов, эффект расходов,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卢布汇率安排的经济效应分析\*

于娟 徐坡岭\*\*

---

**【内容提要】**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汇率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评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和概述俄罗斯汇率制度演变的基础上,从汇率与通货膨胀、汇率与对外贸易、汇率与资本流入、汇率与外债规模结构变动等方面分析了汇率制度安排及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并简要总结了俄罗斯的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俄罗斯 汇率 宏观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3/1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102-(9)

---

转型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是经济转轨过程中重要的政策实践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变动通过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内外平衡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汇率制度安排可能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扭曲是影响这些经济体经济平稳性的重要原因。那么,在市场制度处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而言,汇率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效应?是否也存在宏观经济效应扭曲?俄罗斯的实践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本文将在概述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安排的相关讨论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安排选择的宏观经济效应予以简要分析。

---

\* 本研究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人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07JJJGJW250)的中期成果。

\*\* 于娟,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学院金融学院讲师;徐坡岭,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与俄罗斯汇率制度演变

### (一) 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的讨论

1990年代，经济转轨国家相继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同时，金融危机也频繁光顾诸如墨西哥(1994)、东南亚新兴市场经济体(1997)、俄罗斯(1998)、巴西(1999)、阿根廷(2001)等具有发展中经济特征的国家。这种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大量讨论，形成了一些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选择汇率制度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如“原罪论”(doctrine of the original sin)、“浮动忧虑假说”(the fear of floating hypothesis)和“两极论(中间制度消失论)”(the two poles, 或hypothesis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regime)。<sup>①</sup>这些观点从新的角度诠释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困境。

汇率制度安排“原罪论”(Eichengreen、Hausmann, 1999; Hausmann、Panizza、Stein, 2000)认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由于该国货币不具有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货币职能，而且更由于该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一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否则，一国的国内投资将出现货币错配，或者期限错配的严重问题。

“浮动忧虑假说”(Calvo、Reinhart, 2000)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仅允许其汇率在一个狭小的幅度内浮动。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汇率波动的担忧。这些学者发现，那些声称允许其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其货币大部分并未能真正浮动。这些国家实际观察到的汇率变动率相当低，并不是因为这些经济体未受到实际或名义的冲击。这种很低的汇率可变动性，是由政府政策促成的，因为可以观察到，汇率变动幅度很低的同时，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变动幅度相当大，(名义和实际)利率的变动性异乎寻常地高。害怕浮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深入，甚至在一部分发达国家中也存在。当然，“害怕浮动”的原因有很多种。

“两极论(中间制度消失论)”(Eichengreen, 1994; Frankel、Schmukler、Serven, 2000)的核心观点是，在金融开放的环境中，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只有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度，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形成“空缺中部”。这种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性，使政府对汇率的承诺变得十分脆弱。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

---

<sup>①</sup> 唐建华：“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争论、发展趋势及其经济绩效比较”，《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第71-79页。



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

## （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的汇率制度演变

俄罗斯的汇率制度演变是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轨以来俄罗斯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2 年到 1994 年，实行卢布在俄罗斯国内可兑换制度，卢布汇率自由浮动；第二阶段是 1995 年到 1998 年 8 月，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即“外汇走廊”制度；第三阶段是 1998 年金融危机到 2006 年上半年，实行抑制外币需求基础上的浮动汇率制阶段；第四阶段是 2006 年 7 月 1 日至今，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卢布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据俄罗斯银行发布的《2009—2011 年货币信贷政策大纲》报告，俄罗斯银行打算在今后 3 年继续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靠近，逐渐减弱卢布与双汇篮子币制的捆绑，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

货币自由兑换为卢布实现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也成为了俄罗斯在转轨期中影响物价稳定、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俄罗斯卢布汇率制度安排及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汇率波动通常会对一国内外经济产生多重影响，对内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财政收入、货币供给、国内信贷、股票市场等；对外会影响到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资本流动与外债以及外汇储备等因素。当汇率发生变动时，首先通过本币对外币价格的变化，从而通过商品和劳务价格传导机制等途径将外部因素传导到国内，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本文重点通过讨论汇率与价格、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外债的关系，来揭示卢布汇率对俄罗斯宏观经济的影响。

### （一）卢布汇率波动对俄罗斯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

汇率波动对国内市场价格水平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品的价格，二是非贸易品的价格。前者包括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后者是指那些由于成本等原因不能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根据前述“浮动忧虑假说”，在利率与汇率发生剧烈波动时，一般新兴经济体选择稳定汇率，以此来减弱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此时汇率无论大幅升值或是贬值对通胀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

首先，卢布汇率贬值对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实中，俄罗斯金融系统数次发生波动甚至出现危机，此时，卢布自由兑换的汇率制度安排往往引发卢布汇率贬值。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此前的几次卢布汇率大幅贬值都引发了较大幅度的价格上涨，这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一方面，卢布贬值增强了外部需求，加大了短缺条件下俄罗斯国内市场的失衡；另一方面，俄罗斯

国内市场中，进口消费品的比例居高不下，在进口替代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卢布贬值输入了外部价格因素，反而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这次面对金融危机，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卢布稳定，确保即使贬值也不发生剧烈波动，这对抑制进口需求产生了暂时的效果，但是对出口品则由于国际需求的下降而未能起到扩大的作用。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初步统计，2009年前4个月俄罗斯贸易顺差为75亿美元，而2008年同期的顺差则为148亿美元，减少了近一半。金融危机引起的国内收入减少抑制了进口需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但由于进口消费品在俄罗斯市场的重要地位，以及俄罗斯国内进口替代发展缓慢，卢布汇率的贬值对抑制国内通胀的作用并不明显，2009年1-5月份俄罗斯国内CPI指数仍达到了较高水平。

其次，看卢布汇率上升对平抑通胀的影响。自2006年7月1日俄罗斯宣布卢布完全自由兑换后，由于几年来积累的大量石油美元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卢布大幅升值。2008年8月，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冲击，卢布汇率出现了反向波动。<sup>①</sup>在卢布升值期间，通货膨胀没有因为实施了汇率自由浮动而在目标区间活动，依然是高于通胀目标运行（见表1）。实际上，由于卢布升值后，资金的流入速度太快，以至于汇率上升后采购国外商品所能带来的些许价格下降的作用，在庞大的资金流入中荡然无存。

表1 俄罗斯通胀目标、实际通胀率与卢布兑美元汇率变化

年份	1992	1995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通货膨胀目标区	-	-	118.0	110.0	108.0	108.5	108.5	106.5	110.5
通货膨胀率 <sup>a</sup>	26.1	2.3	120.2	112.0	111.7	110.9	109.0	111.9	113.3
卢布兑美元汇率 <sup>b</sup>	-	46.40	28.16	-	27.75	28.78	26.33	24.55	29.38

注：a — 与上年12月相比，%；b — 卢布/美元。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委员会《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09》。其中，通货膨胀政策目标据各年俄罗斯央行《国家货币信贷基本方针》整理。

卢布汇率变化的通货膨胀效应在俄罗斯的表现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由于不在本文的范围内，故此处不作详细探讨。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政策效果的基本启示是，在存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利用货币政策保证汇率有计划地平稳调整，来平抑经济周期的过度波动，以减少经济体受到的损害，应该是明智的选择。

## （二）卢布汇率波动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方面，普遍认为，首先要满足“马歇尔—勒纳条

<sup>①</sup>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委员会，www.gks.ru。

件”和“J 曲线效应”；其次，国内物价上涨的程度要小于货币贬值的程度，以及其他国家不同时实行同等程度的货币贬值和采取其他报复性措施的情况下，一国货币贬值会起到刺激出口和限制进口的双重作用。众多学者在运用弹性分析法时，选取不同的国家样本，得出了两类观点：其一是 Krugman 和 Baldwin（1987）、Heikie 和 Hooper（1987）分别对美国的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进行了研究，得出贬值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收支；其二是 Bahman—Oskooee（1985、1989）通过对 1973—1980 年间的七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行分析得出，出口的波动往往会过分地反映汇率波动，即存在出口的“超调”行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币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常常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存在汇率生成机制与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割裂。之所以形成以上两类观点，主要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出口贸易中以制成品为主，汇率机制作用明显，同时制成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普遍比初级产品高。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以初级产品为主，汇率机制作用相对较小。

对外贸依存度高达 60% 以上的俄罗斯而言，其贸易进出口结构更是充分显示了原材料特征。

俄罗斯主要进出口商品结构多年以来变化不明显。出口商品结构总体而言，2008 年矿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66.2%，金属制成品占 15.5%，化工产品为 5.9%，机电产品为 2.9%。而进口商品结构方面 2008 年机电产品进口占比达到 29%，运输设备进口占比 21.3%，化工光学产品占比 12.3%。从以上结构可以看出，占出口份额 80% 以上的矿产品和金属及制品属于大宗原材料商品。这类商品由于是重要的工业化原料，也是必备的工业品，所以其供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同时由于此类商品稀缺性和低替代性特征，使得大宗原材料商品具有需求价格弹性大于供给价格弹性的特征。所以，较低的供给弹性加上需求价格弹性大于供给价格弹性的特点，直接导致当供给关系出现小幅失衡就会导致价格的加大波动<sup>①</sup>。

俄罗斯货物出口明显表现出原料性质，在初级产品市场上，这类产品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价格上。若要通过汇率调节该类商品的出口量，必须要与国际市场供求相契合才能达到目的。以卢布贬值而言，其形成的价格优势须借助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扬才能得以发挥，而就目前而言，卢布贬值同国际石油价格下挫并行，使得贬值的价格优势弱化了。

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进口结构中，以机电设备，运输设备以及食品和原料为主。这些进口商品与其国产商品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同时经俄经济学者证实，本

---

① 滕泰、弈伟、赵虹、杨东华：“全球大宗商品供求价格弹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59-64 页。

国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小于 1<sup>①</sup>。所以俄罗斯卢布贬值对抑制进口所起作用的代价亦相当可观。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俄政府致力于实现卢布平稳贬值，在进口结构中直接表现为投资品下降的幅度大于食品及轻工业品的下降幅度。由于投资品中机电设备和运输工具等产品在俄国内尚无替代品，仅食品业存在部分替代，所以卢布贬值后进口品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本国工业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而这一现象再一次印证了Calvo和Reinhart（2000 年）的浮动忧虑假说，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在贸易条件改善时，其货币升值是审慎的，唯恐损害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货币贬值所牺牲的进口成本和社会福利又是相当可观的。

### （三）汇率变动与资本流入的关系

汇率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前述“浮动忧虑假说”认为，一国政府之所以担心本币汇率大幅变动，是因为一方面，当本币汇率上升时，会大大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即使本币升值能带来有利的短期冲击，一国政府也应当尽量保持汇率的原有水平。这是由于资本流动条件发生有利的变化时，汇率上升引起的国内某一部门的繁荣很可能会损害其他部门的发展，即“条件改善→某部门繁荣→大量资源流入该部门→资源流出部门发展受影响”；另一方面，汇率下降可能引发资本外逃的担忧，将促使政府采取措施避免本币贬值。

就俄罗斯而言，卢布汇率的不稳定和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使得俄罗斯在转轨以后的多年时间里，在吸引外资方面乏善可陈。2002 年以来外资流入的增加与卢布汇率和俄罗斯国内经济相对稳定密切相关。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吸引外资总额同比下降了 14.2%。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双重夹击下，2008 年俄罗斯资本外逃总量为 1300 亿美元，2009 年 2 月资本外逃是 1110 亿美元<sup>②</sup>。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卢布汇率贬值预期，引发市场对在俄罗斯资本投资的安全性的疑虑，反过来，又使得资本流出加剧，并进一步引发了对俄罗斯政府信用的质疑。

2008 年年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法国惠誉对俄罗斯进行了主权评级（见表 2）。标准普尔在报告中之所以下调了俄罗斯的评级，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俄罗斯满足其外部融资的成本和难度都显著提高。由于考虑到俄罗斯当局的政策调控余地受制于资本和储蓄外逃的风险和银行系统机构性弱

---

① 俄文传电讯社：《俄经济学家分析卢布升值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http://www.zjgm.cn/Yun\\_TradeNews/TradeNews\\_ArticleShow.asp?ArticleID=421&ArticlePage=1](http://www.zjgm.cn/Yun_TradeNews/TradeNews_ArticleShow.asp?ArticleID=421&ArticlePage=1)。

② 新华社：《俄罗斯财政部长预计今年俄经济增速为零》，[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xwpxdw/2009-01/30/content\\_1634358.htm](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xwpxdw/2009-01/30/content_1634358.htm)，2009 年 1 月 30 日。

点，以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同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造成了对卢布真实汇率打压，惠誉公司也将俄的主权信用等级从稳定修改为负面。

表 2 2008 年标准普尔对俄罗斯政府主权信用评级

外币长期信用评级	BBB+ 降至 BBB 级
外币短期信用评级	A-2 降至 A-3
本币长期信用评级	A- 降至 BBB+
俄罗斯政府信用展望	负面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信用评级 <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

面临以上实际情况，政府依然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试图熨平汇率波动，谋求平稳贬值，这样做是出于以下考虑：其一是为了保证汇率平稳，希望汇率起到名义锚的作用，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升也有利；其二是如若发生剧烈贬值，将使俄罗斯再难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且国际资本流入可能急停，影响经济增长。最后是在债务美元化的情况下，卢布贬值会使大批企业和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所以通过提高银行间同业拆息和再贷款利率，政府在已经形成了高通胀、资本急速流出的情况下竭力保持汇率稳定。因此，在高通胀下仍然实行高利率的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 （四）卢布汇率变动与俄罗斯外债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外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初期作为弥补原始资本积累不足有着重要的意义。世界银行专家认为，适度外债可以使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提高 0.5~1 个百分点<sup>①</sup>。然而外债是生息资本，其本身不仅受到国际市场利率的左右，同时也受到本币汇率浮动的冲击。在业已形成的举债规模与管理模式下，汇率浮动对债务产生直接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系统、官方黄金外汇储备、通货膨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

截至 2009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外债总额合计为 4847 亿美元。其中，国家主权外债 294 亿美元，银行外债 1661 亿美元。在国家主权外债中，俄独立后借的新债为 236 亿美元，继承的原苏联债务为 46 亿美元。俄罗斯借债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高，其政府债务仅占 GDP 的 9%。然而债务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目前俄罗斯的外债中，主要是银行和企业的债务，国家的债务多数已经在前几年财政状况好的时间里已大部分偿还。目前外债总额中的近一半将在 2009 年底前偿还，而银行和大公司因资金流动性不足严重影响了偿债能力。

“原罪论”对此提供了比较好的解释：由于一国内外国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能

<sup>①</sup>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1985 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第 45 页。

用该国货币提供贷款，或是金融市场不能满足企业的本币长期借款，容易使企业面临“魔鬼选择”，即要么借美元造成货币错配，要么短期贷款用作长期引发期限错配。在出现外部冲击时，货币错配会导致投资收缩和产出收缩及波动。货币错配与本币大幅贬值相互作用，会大大降低私人部门的净值和资信，进而导致投资和产出下降(Goldstein&Turner, 2005)；还会引起并恶化期限错配，使偿付约束更紧，导致债务结构更多地倾向于短期化，因此面临风险的投资项目增加，造成产出波动加剧和投资收缩(Bussirre et al, 2004; Ranciere et al., 2003)。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发生贬值时，政府将在维持盯住汇率的成本(非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和国内产出的损失)和放弃盯住汇率的成本(国家信用的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但两种情况下产出都会收缩(Bunda, 2003)。

虽然俄罗斯卢布可自由兑换，但由于该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企业不能在国内市场获得长期贷款，通过借外币用于国内项目，这就会使企业面临货币错配。企业以外币借入外债，但在资产负债表中以本币记账。当本币发生贬值时，就会使本币借款成本骤升，容易陷入财务危机，直至破产。由于这一原因的存在，无论企业或政府都不愿意贬值。因此从目前救市措施来看，政府正努力防止卢布大幅贬值，扶持中小企业，增加社会投入，通过拉动内需来稳定经济。

### 三、结论与启示

俄罗斯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践经验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对于不同的转型国家，有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是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原则。其次，同一个国家，在转型的不同时期，采用的汇率制度也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的趋势是实行更为浮动的汇率制度。最后，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角度看，在转型的初期阶段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做得更好一些。但是随着国内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汇率制度则需要与本国经济相协调。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处于转型经济中的大国，其转轨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引人注目。然而，俄罗斯在整个转型期间，通货膨胀如影随形。同时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实现俄罗斯卢布的完全自由兑换。这就导致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表现为稳定通货膨胀与稳定汇率并举。一系列新的汇率制度理论发现又明确指出，当新兴经济体在遇到外部剧烈冲击时，容易发生为稳定汇率而产生的高利率—高通胀两难。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上升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由于受到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美联储持续降息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升值

压力持续加大；另一方面，受食品、能源、金属和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居民的通胀预期普遍增强。因此我国在选择治理通胀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应辅以汇率制度的灵活改善。在我国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直接引入过于频繁、幅度较大的汇率浮动，会使经济剧烈波动。然而，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上升与下降的弹性，则有助于培育外汇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并可望起到释放升值压力的作用。因为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态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的双向走势使投机进出资金的风险成本加大，这会给投机游资带来一定的压力和风险，从而对流动性泛滥起到抑制作用，进而使我国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时尽量避免多重目标之间的冲突。

---

**【Abstract】** During the Russian transition period, a clos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and exchange rate system.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dilemma of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 in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nd overviews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 arrangements and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s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change rates and inflatio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flows,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ebt scale structure. Finally, this article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enlightenment of Russian experiences to China.

**【Key Words】** Russia ,Exchange rate, Macroeconomic effect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валютный курс,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эффект

---

(责任编辑 姜睿)

历史·文化

##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

### ——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

林精华\*

**【内容提要】**现在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如何表述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了。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之于中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这个迷思全方位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影响力至今不绝。我们需要澄清造成这种状况的自身原因。其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时代原因，在无法直接触碰苏俄、不了解苏俄的情形下，却满怀热情地去认同或拒绝经由苏维埃所确认的那个俄国，不经学术研究和学理性判断，把原本是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下获得成功的苏俄革命这一地域性现象，泛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规律。1950年代以后，知识界依据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把“解冻”以降的苏联变革理解为背离社会主义，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国际共运的失败。相应的，知识界这种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考量的意见，又成为党政和社会理解苏俄问题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20世纪末。反思这些历史性表述，对中国在21世纪提升认识俄罗斯问题的水平、建构恰当的中俄关系，既有历史的警示作用，又有理论价值。

**【关键词】**知识分子群体 苏俄意识形态 民族国家概念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5-0111-(25)

进入21世纪以来，俄国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1990年代确立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近10多年来周期性地被强化(无论是2001年7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原则，还是互

\* 林精华，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外语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办国家年和语言年，抑或近年来定期或不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也必须顾及到反映在不同层面的民意及实际问题。造成俄国在中国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中地位之巨变的状况，远不只是俄国自身的国际地位下降所导致的(其实，俄国仍然是国际上唯一能和美国进行军事抗衡的核大国，也是敢于直接对抗北约的军事强国)，也远非外交活动的结果，更未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甚至相反，外交行为或国家意识形态可能正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学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观念的明显变化。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在内的重要学术机构以及一批杰出学者所推出的重要成果，如潘德礼研究员主编《十年巨变，俄罗斯卷》(2004)，冯绍雷教授和相兰欣教授主编系列丛书《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俄罗斯经济转型》、《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2005)等，以及沈志华教授关于中俄关系研究等<sup>①</sup>，在相当程度上促使国民、知识界和政府有关部门认识到，俄国在中国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中的地位，无法和中国在俄国所建构的外交关系中位置相媲美——在 20 世纪中国人看来，俄国之于中国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是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迷思，并以为中国之于俄国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殊不知，中国之于苏俄是层级很低的双边关系因素。在苏联时代，中国的意义只是在其国际共运框架或苏俄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构中才显示出来，并非其世界构成中的重要角色；在后苏联时代，则可能是第四层级的国际因素(排在美国、欧盟、独联体甚至印度之后)。伴随着这种变化的还有，俄国文学艺术也迅速在中国所建构的世界文学图景中边缘化，且造成如此状况也并非俄国文学艺术水平严重下降、西方水平看涨，而是中国人更愿意在国际视野下看俄国，发现其并非超一流。

可以说，这样认识俄国虽不乏中国民族主义的刺激，但比起 20 世纪对俄国的认知要深刻得多。倘若回到 20 世纪中国对俄国理解的历史情境，可以说，百年来基本上不是研究实际存在的俄罗斯问题之复杂性、俄国和世界之关系的变化、俄国文学艺术的民族性诉求等，而是把俄国当作中国所需要寻找的外来文化思想的资源库，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化对象：五四时期被认为是能帮助中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正义之国，五四之后被认为是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最佳样板，1930 年代以后是从精神上最正确指导中国抗日的盟国，1949 年之后是中国最值得信赖的兄弟，1950 年代末之后是使中国震惊的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1980 年代之后是不值得中国再去仿效的国家，1990 年代是中国在意

---

<sup>①</sup> 除这些丛书之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和《俄罗斯研究》等杂志方向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对俄国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等研究也有改变。

意识形态领域要预防重演的对象和中国发展民间贸易的特殊伙伴。这些认知的变化，实际上和那个本来的俄国相去甚远，很多情况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问题是，很长时间被西方所忽视或者提防的俄国，何以会这样牵动着中国的神经？

—

原来，俄国在 20 世纪的中国如此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肇始于一批公共知识分子非专业性的表述(20 世纪上半叶)，接着是制度性表达的产物(20 世纪中叶尤其如此)，以至于 20 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革除苏俄消极方面的影响。具体说来，俄国之于中国的魅力始自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茅盾、瞿秋白、田汉、张闻天、胡愈之、曹靖华等一批杰出人士。他们根据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和苏俄对自我的表述推演出对俄罗斯问题的表述，成就了那个时代中国对俄国的整体认识、判断。哪怕他们的判断今天看来是很不专业的，常常是远离苏俄事实的个人见解，诸多见解也是不吻合中俄关系的书生意气，实践起来会带来必然恶果的，却因为他们是 中国最具声望的人物和囿于当时的历史情势，而不敌国际格局之变、中国社会发展所需。

按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1874-1948)《俄国命运(对战争和民族性的心理分析)》(1918)、《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思想》(1938)和《俄罗斯理念》(1946)等所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倡导集体主义、反对私有制和理性主义、对抗西方的所谓俄国共产主义，其实远非德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实践之结果，而是公元十世纪以来东正教信仰被合法化后，和斯拉夫本土信念相融合所形成的传统。而 18 世纪开启的现代化运动以降，这种传统因为遭遇西方的冲击，因而孕育出“俄罗斯问题”(俄国如何面对西方和走什么路)、“俄国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俄罗斯问题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较早地以地方诉求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价值)、“俄国革命”(激进革命或制度内的变革)等，包括普希金、恰达耶夫、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基列耶夫斯基、萨马林等等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无不受益于这样的传统。即使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白银时代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等，其实亦然。而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所进行的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效地把“俄国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在西化变革过程中引发很多社会矛盾的情势下，动用俄国共产主义传统资源，阶段性地解决了俄罗斯问题。这些人及其表述，连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奠基人和首任总统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 1850-1935)及其《俄国与欧洲》(*Russland und Europa*,1913)(1919

年被译成英文《俄罗斯精神》)、法国著名作家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23)和《访苏归来》(1936)、以赛亚·柏林(1909~1997)的《俄国思想家》等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刻表述,共同表明俄国经验不能泛化成普遍真理,其中的东正教信仰和民族性诉求之融合是很难在俄国以外的族群中被复制的。可以说,这样的认识已经成为国际斯拉夫学界的共识,远非西方中心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演绎。

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视野中,苏俄经验是一个被普遍化了的真理性对象。李大钊较早讨论俄国问题的文献《介绍哲人托尔斯泰(Lev Tolstoy)》(1916),把博爱主义者与“革命者”的托尔斯泰融为一体<sup>①</sup>。就在他强化托尔斯泰的革命诉求之际,俄国白银时代知识分子也在热烈地讨论托尔斯泰。其中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托翁乃俄国最富有审美感者,最具乌托邦思想的文人。但李大钊并不在意俄国本土对托尔斯泰的认知,其《俄国革命与文学家》(1918)把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史革命化,认为“19世纪鉴,社会的动机,盛行于俄国诗歌之中”,普希金因《自由歌》,终其身受警察之监视;诗人莱蒙托夫诗歌多写自由与时代精神,被剥夺官位,复遭遣徙;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乃“以其思想唤起无数为自由死亡战士”;奥加廖夫与赫尔岑皆呼唤“自由!自由!”;批评家皮萨列夫,身囹圄者四载;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被逐于荒寒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流遣于西伯利亚;托尔斯泰晚年长受秘密警察之侦探;高尔基必寄居于异域,始免放逐或投之坑中<sup>②</sup>。而其《俄国文学与革命》(1918)更称,“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文学之特质有二:为社会色彩之浓厚,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之接近,乃一自然难免之现象。他并把俄国文学划分为“平民诗派”和“纯情诗派”,批评“纯情诗派”不关注社会,肯定普希金《自由颂》、莱蒙托夫《诗人之死》、雷列耶夫《沉思》等“平民诗派”,认为“俄国革命之成功,即俄国青年之胜利!亦即俄国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sup>③</sup>。正是在这种大量屏蔽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纷繁复杂性、简化俄国文学史的多元结构之基础上,把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演绎成革命志士一族。进而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一文中,李大钊写道:“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罗斯革命是20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人当日之精神,

① 参见《晨钟》报,1916年8月20日。

② 载《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③ 《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8-119页。

为爱国之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以为和平之曙光”<sup>①</sup>。不仅如此，他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更力主：“由今以后，到处所见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诸如此类的表述，连同其《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沈雁冰《俄国文学与革命》、郑振铎《俄罗斯文学特质及略史》和《俄国文学发达原因与影响》等文献，左右了当时国人对苏俄的态度：

1928年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六大”第43次会议上宣读的东方各国共产党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声明（瞿秋白起草）说：“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苏联的发展问题，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国际共运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反帝起义和反帝战争的中心”<sup>②</sup>。理论上是如此憧憬苏俄，在中俄关系所遭遇的实际问题上，中国进步知识界也是那样地乐观，甚至在1920年代初就如此。针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蒙古自治）签订未果事件，1924年3月陈独秀在《中俄会议之成败》（《向导》周报第58期）中评述道：会谈破裂，“好的方面是：蒙古人民免得马上要受中国军阀的统治及中国兵的奸淫焚掠；在中国兵未去之前，他们可以多得时间充分准备抗斗自卫的武力”。他在《评中俄协定》（《向导》周报第59期）一文中继续称，“对于这次中俄协定，也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苏俄承认中国在外蒙之主权，轻轻将外蒙独立的国民政府否认了。或者苏俄也有一种苦心，以为蒙古独立的力量还不充分，与其放任了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取，不如归之中国，中国的侵略力量究竟不及列强”。尤其是《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向导》周报第68期）一文，明确反对把外蒙归还中国的协定。以至于1925年发生苏俄是友是敌的大争论时，著名法学家张奚若（1889-1973）就这样说道：“在近日人人对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站起来发表反对意见，“令人非常钦佩”（1925年10月8日《晨报副刊》）。事实上，苏俄对华政策首先是要解决新生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和生存及民族利益问题，其次才是国际共运。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国际共运原则在劳农新政权中落实的程度并不高。换句话说，1924年苏联政府口头上废除帝俄政府签订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但自己又与中国政府继续签订了一些实际上不平等的条约，包括共管中东铁路等，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1929年国民政府迫于民众压力解除了这一不平等协约，此举

① 《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署名“李大钊”。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2-103页。

差一点引发苏联政府对华战争，这激发了中国人民群情激愤<sup>①</sup>，但政府在知识界压力下又很快转向苏俄。

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李大钊之憧憬苏俄，是基于他是从中国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早期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家国天下之雄心；转变为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早期共产党人后，又有伟大情怀。但像他这样用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主义积极表述苏俄，却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屏蔽了俄国革命和中俄关系的民族诉求，造成中国人由肯定俄国二月革命后用非暴力方式建立共和制、反对布尔什维克用暴力手段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制，不出两年又转向赞赏十月革命并身体力行在中国实践苏俄的经验。

不过，苏俄在中国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经由苏俄文学在中国的广泛流传而散发出来的。按鲁迅《中俄文字之交》(1932)所言，“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但鲁迅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同时写道，“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sup>②</sup>。这样的表述，还算客观而全面。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1931)则说：“知道苏俄的将来，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惊奇于“所遇到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般的天真、友爱、活泼、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义，以为苏联的生活是残酷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我所见的恰好正相反”。尽管发现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主张国际主义，在文化上主张民族主义，他却盛赞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对民族文化、民族语文、民族文艺能像苏维埃那样的积极提倡和保护。革命前俄国文学受西方影响很大，因而是世界性的，新兴的普罗文学是地方性的，乡土的民族的色彩非常浓厚。普罗文艺的最大源泉是民间文艺，所以不能不是民族性的。对此矛盾，他以斯大林的言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而回避之<sup>③</sup>。可见，和 21 世纪的中国对俄国看法相比，20 世纪俄国之于中国是如此亲切、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问题表述的结果！

这些过程表明，20 世纪中国对俄国的表述，基本上不了解俄罗斯文明结构的复

---

① 参见鲁迅：“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1929)，《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43-14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61 页。

③ 参见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6-17、63-66 页。

杂性——经由拜占庭引进的基督教、蒙古统治 240 年、启蒙主义以来的西方文化、伊斯兰教信仰等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段内，以不同方式(或者帝制扩展的强制性纳入，或者外来力量的强行带入，或者君主的宏伟事业的胁迫引进，或者国家不断扩大而客观进入)，进入东斯拉夫的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帝国、苏联，但这些因素千余年来基本上是混杂在一起，没有化合成有机整体。但充满着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正教和本土的斯拉夫民族性诉求则融合了，并因这种融合而无法让跨越欧亚大陆的俄国使东西方因素和谐相生，以至于以国家形式追求物质进步或现代化的俄国，在精神上不断排斥西方。然而，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却把在中国传播超过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基于自身文明结构复杂而反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苏俄马列主义，意外地对接起来了。俄国文明结构的复杂性问题，被表述成俄国因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才和西方冲突的。

更让人不解的是，俄罗斯问题被如此简单化，并从中延伸出俄中之间有许多相似性的简单判断，何以在 20 世纪大半时间里成了人们的普遍认知和社会导向？

这同样是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上述那些主导着引进俄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作家、理论家、思想家等，以其博学和启蒙主义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使命感，去理解俄国文学、正在发生的俄国革命和正在生成的社会革命理论等，从而显露出表达的深刻性；同时，因为以个性化语言诠释它们，使他们所塑造的苏俄形象魅力四射。

李大钊这位译介俄国文化卓有成效的人士，通世界历史、国际法学(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时曾对所学日文《法学通论》和《刑法讲义》作过深刻的批注，还同张润之合译日文著作《中国国际法论》)、国际政治(1912 年曾负责日文《支那分割之运命》的翻译和批评工作，还写了很多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世界文化思潮(在介绍和倡导托尔斯泰的同时，也写下了《介绍尼采》、《培根之偶像说》、《爱国艺术家罗丹翁病笃》等积极倡导西方文化的名篇)等，这样的学者又是很有道德操守的北大教授(北大“进德会”发起人之一)、很有理想追求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因而他能从世界眼光看俄国问题。其著名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如是称，与西方相比，“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为三世纪之久。诉诸历史，其原因乃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夷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起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如此，所以较欧洲各国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由地理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他并引用时人关于俄罗斯精神兼有东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之中

介的名言，说道，“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肯定俄国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sup>①</sup>。

同样，对引进俄国文学极有贡献的周作人，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在北京大学最早开设欧洲文学史并尝试著述《欧洲文学史》，翻译过很多国家的文学作品。至于沈雁冰，其世界文学史知识之广博令人折服，著过《西洋文学通论》、《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和《骑士文学ABC》等，其《关于文学史之类》(1934)批评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的费鉴照的《浪漫运动》少有创新性价值，批评梁镇翻译Maurice Baring的《俄罗斯文学》学术价值不高，批评切中肯綮<sup>②</sup>。这样的例子还有，郑振铎著有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尝试把俄国文学纳入整个世界文学体系中进行查考；沈泽民这位34岁病逝于鄂豫皖省委书记职位上的革命家，也不独独满足于译介俄国文学，《小说月报》第13卷号外“法国文学”专号曾发表有其长文《罗曼·罗兰传》、《小说月报》第13卷第3号有其论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海顿斯坦(1859-1940)之作、《中国青年》杂志(第27期)有其文《泰戈尔之生涯与思想》等。尤其是，在塑造俄国正面形象方面贡献极大的瞿秋白，他所关心的也远不限于俄国文学，对中国问题、世界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很关注，如写有著名的《新中国文案》(1932)试图重建汉语，鲁迅编辑《海上述林》收录有他长篇书评《房龙的〈地理〉和自己》：可见，俄国只是他世界视野中的一部分，他对俄国的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发展、苏俄进步等系统论述颇为深刻；在俄国文学方面，除翻译大量苏俄理论和高尔基的许多作品之外，还有专门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这样，他眼中的俄罗斯就不是单一的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博学、视野开阔，使得这批通才式人物对俄国文学的审视，客观上能把它置于相对公允的位置。茅盾1920年代在《小说月报》上开设“海外文坛消息”，放眼世界文学思潮变化，即便涉及苏俄也并非只是选择有利于苏维埃政府的文学现象，如第111条《哥萨克作家克拉斯诺夫》(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就介绍了红色政权所排斥的白俄作家克拉斯诺夫将军关于十月革命之作《从双头鹰到红色标准》。在第173条中还把该作者与普宁、库普林、阿·托尔斯泰等写革命的作品(如《苦难的历程》)同归并为“俄国革命的小说”，以求客观而全面地呈现苏俄文学现状。在第191条《苏俄三个小说家》中如是分析十月革命后最初三年文坛凋敝的原因：旧日重

---

① 《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署名“李大钊”。

② 参见《文学》杂志第2卷第3号，1934年3月，署名“惕若”。例如在该文中，作者批评费鉴照言论“凡从拉丁文孵化而来的文字都统成为Romans”是错误的，认为“从拉丁文孵化而来的，有多种文学”；与其翻译这部《俄罗斯文学》，不如翻译勃兰兑斯的《俄罗斯印象记》的后半部《论俄罗斯文学》，尽管这也是一部旧书了，但原作者不失为是有“卓见”的批评家。这些批评，今天看来依旧是立得住的。

要作家亡命国外，少了文学生力军，而十月革命把人心震动得不知所措，新旧更替使人目迷神乱，实际生活变化之速让人思想跟不上，还有这几年的忧乱使一般作家的处境不利于文学创作，更何况这期间只有苏维埃政府一个出版社，且出版的多为宣传文字，只是新成长起来的皮里尼亚克等作家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些文字今天看来依然深刻。同样，胡愈之的《屠格涅夫》(1920)论及俄国文学主题时，字里行间透出深刻的见解：“人道主义色彩最显明的要算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安德列耶夫。托尔斯泰乃最大的人道主义者，屠格涅夫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最大的艺术天才。托尔斯泰的小说戏曲是借此来宣传其主义的，屠格涅夫小说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屠格涅夫是写实主义的浪漫派、浪漫主义的写实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乃俄国写实派三大文豪，托尔斯泰以道德解释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病态心理解释人生，屠格涅夫以艺术解释人生”<sup>①</sup>。还有，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汪倜然在《俄国文学ABC》中论及普希金时称，《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注重性格描写而不大注重情节的，这本诗体小说的趣味是抒情性的、心理描写的，而不是叙述的”，推崇《黑桃皇后》“不但是普希金最好的短篇小说，亦是世界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论及1846-1904年(契诃夫去世之年)俄国文学主流——写实派—自然派文学时，他评判说，这种文学的人物比情节更显著、所讲故事不完善、情节不很动人等，把叙述做成了“人生的片断”，小说似自传，自传与小说难分。如此理解俄国文学，虽参考了欧美学者之论，甚至有编述或摘译之嫌，但整体上是经过了自已视野过滤的，比单依据苏俄文献看俄国文学视野更为宏大，认识更为深刻，更让人信服。

当然，这样的“通才”译介和诠释俄国文学，表述上普遍具有独立个性。耿济之这位引进俄国文学入中国的重要人物去世不久，戈宝权有文《耿济之与俄国文学》(1947)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耿济之等人译介俄国文学的工作，“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一方面是我们有可能认识俄罗斯民族的丰富的文化与文学，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育和成长”。他并根据耿济之的译介成果、参考耿济之给安寿颐的《甲必丹之女》译本所写的序，探寻此说的根据，“外国文学之当介绍，其意义在建设中国之新文学……在我介绍者方面而言，对于某派文学固有其主观之憎恶，而从社会方面着想，是不得凭一己之憎恶，以为介绍之标准。故外国文学之介绍，不当限于一宗一派、一时一代。我借之介绍俄国文学亦即此意，但视此作品之意义若何，其对于俄国当时社会之影响若何，而作应介绍与否之标准，初不顾其与古典派、浪漫派或写实派也”。也正因为如此，耿济之所翻译的作品遍及俄国文学不同时代、不同倾向、不同文体，囊括了从普希金、果戈理，经安德列耶夫到高尔基的俄

---

<sup>①</sup> 参见《东方杂志》1920年2月号。



国文学一大批经典作家，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成就斐然且的确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sup>①</sup>。而且，这不是戈宝权一人的情感性评价，这期《文艺复兴》中还刊有叶圣陶《零星的说些》、徐调孚《忆济之先生》、周予同《悼耿济之先生》、赵景深《忆耿济之》等，多方表达了类似的认识，并与耿济之本人有颇多的同感。其中，叶圣陶声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隐藏着“为人生”的主流，“如果说这是承袭了俄国文学的精神，当然不妥当，我国文学为什么要承袭别国的文学精神？大概是我国的现实情况与当时的俄国相类，故而表现为文学方面，与俄国文学同其趋向”（同期第274页）。其实，耿济之所受礼遇，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其他翻译家、文学家和批评家。

但是，从1930年代始，引进俄国文学和革命理论逐渐变成进步青年、职业革命理论家的职业工作，相应的，“专才”替代“通才”，随之在接受或拒绝俄国问题上也显示出相应的变化：选材上日趋受苏俄思想影响，在理解俄国文化问题上囿于苏俄所建构的世界图景。此情发展到1940年代，已把阅读俄国文学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行动，中国主体性意识不断减损。如同苏联人一样，几乎不再有关于俄国现代主义思潮和宗教问题的正面讨论，写实主义逐步被苏俄新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替代，苏俄马列主义成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变化在新增的俄文队伍中尤为如此，很少讨论苏俄的经济发展、政党内部斗争、社会重建等问题。所幸，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已成为引进俄国文化主力的人士，在新时代虽有变化，但原本的世界视野和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抵挡了把苏俄经典化和简单化的潮流。如瞿秋白就认为，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1933）“确是一本好书，虽然这书的原文——美国康恩教授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就已经包含着一些模糊的偏颇的见解，然而他毫无疑问的感动着读者，引起读者的许多新的思想，教训读者许多生活的经验……美国大学教授的偏见还不至于淹没新世纪文学的巨大形象”<sup>②</sup>。诸如此类的叙述，对当时开阔认识俄国的视野、避免从单一渠道接受俄国，很有积极作用。遗憾的是，在整体上不能改变时代变化的趋势，导致中国对俄国文化的接受虽然主要开始于俄国文学，很快上升到对苏俄社会制度的认同，但中国误读俄罗斯并非因文学本身，而是日趋紧张的社会情势和越来越强势的追求“进步”/“革命”之社会思潮，而且对苏俄文化的接受，反过来又助长了把文学简单化、引进外来文化的功利主义化等负面效应。

不仅如此，早期译介俄国文学和苏俄社会革命理论的那些通才式人物，知识结构相当完备，能够把俄国置于世界中来查考，甚至能在知识论层面发现俄罗斯问题

---

① 参见《文艺复兴》第3卷5月号，1947年5月，第269-273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44页。

的民族身份之原因。田汉在《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中说,“考 19 世纪欧洲思想界,德、俄之间两雄对立,一为德之尼采,一为俄之托尔斯泰,尼采研究希腊哲学倡强权主义(Machismo),20 世纪凯尔主义(Kaiserism即独裁政治)所自来。托尔斯泰信仰基督教,倡人道主义,即为二十世纪威尔逊主义所由起”,“与威尔逊主义所代表之和平会对抗者,今则有俄国列宁主义所代表之大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政府。夫列宁主义之所主张(非如报所传者)因为合理之希腊主义创造伊始,缺点自多。然虽威尔逊主义亦逊其真切、彻底,与德国所崛起之‘新产业主义’同为吾人亟当研究对象”,“横而观之,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阶级分为两派”,其中赞成彼得改革的西欧派发源于圣彼得堡,欲以西欧思想改良俄国、代表古希腊思想,而不赞成改革的斯拉夫派发源于莫斯科,欲以俄国为希腊正教指导西欧、代表希伯来思想,“以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说明俄国文学,此 1840 年代正其所焉……西欧主义者之所主张,细言之,即以一般人类的文化种子播之俄国,使国民生活益臻丰富为其天职,力说俄国与西欧精神的兴味既同,即政治经济与精神生活发达之步调亦不能不与同。斯拉夫民族苦于东方教权、王权与旧制度已久,今亟当使个性的自由发展,要求个人在社会的权利,西欧文明各国已将正当的社会组织由理想成为事实,吾人当以为模范,勉为学步。夫此种精神故俨然一希腊主义也。而西欧主义者之目的,不以模仿西欧为止,而谓俄国文明大进之时,有改造一般人类的文明之必要。是说呼为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亦至恰当,则又带希伯来思想也”<sup>①</sup>。

用全球性视野谈俄罗斯问题,是比较客观、深刻的,哪怕这类表述的立足点更着眼于当时的中国现实,而不是俄国文化本体,但在 20 世纪的中国已属罕见。这种情形在那一期《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中同样反映出来。如郑振铎之文《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专门探究俄国文学何以在 19 世纪以后被世界关注之因果的问题,就涉及俄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原因。同样,沈泽民有文《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1921)称,“研究俄国文学比研究别国的文学不同:俄国的政治生活、知识界的状况,都是特别的重要。并且俄国文学是新起的文学,其中充满了民族的渴望和信念,文字也特别的忠实纯朴,不像别国老了的文学一样,所以关于俄国的地势气候,这种天然情况对文学所生的直接间接的影响,都是特别要注意的”。而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就注意到了这些。但是,一方面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静心体验俄国,李大钊和胡愈之对苏俄只有短暂的访问,陈独秀和周氏兄弟等更多的人对俄国没有亲身感受,瞿秋白对苏俄虽有不短时间的经验,但主要是根据苏俄价值观和国际共运理论而不是按照亲身体会去理解俄国,结果只看到苏联官方的新苏俄,而没有发现苏维埃的

---

<sup>①</sup> 参见《民铎》杂志第 6 期,1919 年 5 月。

俄国问题，对俄国文化传承、俄国宗教和现代主义存续等问题无缘深入体会，这种情况后来日趋严重。另一方面，来自俄国写实主义的洪流、普遍信奉的“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把新苏俄当作社会主义范本的“革命”浪潮等，使得那些通才对俄国文化的民族身份问题以为理所当然。进而，对俄罗斯民族性诉求也缺乏警觉。这种情形，到了 1920-1930 年代之交后，中国译介俄国文化的队伍大变，虽然有更多的专才去苏俄，但知识结构使得他们难以理解俄国的复杂性，并因苏俄自身变化而使之对俄罗斯问题缺乏深入体验，特别是，他们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认同新苏俄的心态，使之对俄国何以变成苏俄的复杂过程及后果所隐含的问题缺乏警觉意识，对俄国文化的热情变成了对苏俄的全面认同。这种情况也延及那些通才式人物。茅盾的《作家和读者在苏联》(1936)以当时的苏联作家伊凡诺夫 1935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保卫和平大会上的发言为蓝本，称苏联作家社会地位多么崇高和待遇多么好，党和政府以作协形式培养作家的好处多么多，作协对作家寻求工作和创作的好处很多等<sup>①</sup>，全然不管苏联政府对作家的监控情形，更没有考虑作协是俄国官僚主义在苏联时代向文学界的扩散。茅盾的《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盛赞苏联儿童文学大会“充分表示了苏联的党政当局如何注意这两千八百万的学童的精神上的食粮”，苏联政府通过儿童文学艺术的普及而重视儿童的教育，认为这“反映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长以及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sup>②</sup>。显然，作者没有正视俄国原本就有的重视儿童文学创作的传统(从克雷洛夫、普希金、托尔斯泰、谢德林到高尔基、科罗连柯等无不如此)，也没有认真反思苏联 1930 年代儿童文学创作成就其实很低的现实。

更有意思的是，引进俄国文化队伍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到译介俄罗斯问题的“文风”和“学风”变化。通才式人物引入俄国文化，视野开阔、有独立思考能力，表述上才华横溢——普遍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修养。今人重读李大钊《青春》(1916)，对这样的语句“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sup>③</sup>，谁不会怦然心动而振奋呢？而这样的表述又何止是这一篇，著名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篇章无不同样激动人心。不仅李大钊这样，周氏兄弟、茅盾、郑振铎等人亦然。这些人把这样的文字功底和文学修养用在了译介俄国文化事业上来，自然是促成俄国文化热的关键性原因，由此也不难理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新史》何

① 参见《作家》第 1 卷第 1 号，1936 年 4 月 15 日。

② 参见《文学》杂志第 7 卷第 1 号，1936 年 7 月。

③ 参见《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1916 年 9 月。

以成为文学名著，而不仅仅是游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译介俄国文化时，多借助外文材料，但学风较严谨，每篇文章或著作后多附上参考文献并作说明。如《小说月报》那期《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中的郑振铎之文《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结尾明确标示，“因为时间匆促、极力求简的缘故，这篇东西只根据M.Baring的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俄国文学概观)的头两章，不及多所参考。这是应该非常抱歉的”。在同期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作者张闻天有译述题记明示：“本篇依据托尔斯泰的艺术论What is art?(英文译本)，引用的地方都是(从)本书上之一下来的”。不仅如此，译介队伍还形成了相互砥砺的风气，如瞿秋白《饿乡纪程》问世不久，王统照写下《新俄国游记》(1922)，盛赞该书乃“一个奋勇的少年人的人生观念的自述”，是令人感动的游记作品，而如此书评是“为了引导当时青年去阅读和深入理解《饿乡纪程》，希望他们思考和领悟人生”<sup>①</sup>。同样，鲁迅对瞿秋白在译介俄国文化方面的贡献，也赞誉有加，并切实延续这种作风，倡导这种精神，还为瞿秋白译作编纂《海上述林》。但是，“专才”成为主流后，这种比较严谨的情形就逐渐消失了，直接搬用苏联人对文学的看法，或综述俄文材料而成就关于苏联问题之作，不再指明材料出自何处、参考何种文献，以至于后来发展到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俄语语言学、政治学等，基本上不尊重国际学术成果和前人成果；同时，即便是批评或褒扬，多因意识形态，而非学术，导致为学术进步而坦诚鼓励和批评的情景日趋少见。当然，这种变化与苏联知识界思想平庸、表述上趋于意识形态化等也不无关系。

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界在引进和研究俄国文化方面的这些变化，造成对俄国的误读是综合性的，不同误读情景是混合在一起的，但不能否认不同时期所具有的时代性效益。诚如郁达夫在《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1933)中所总结的，五四运动的意义是促成了易卜生、惠特曼和俄国19世纪诸作家作品“在中国下了根，结了实”<sup>②</sup>。即使后来出现了专才替代了通才的变化，社会情势促成了这批专才在塑造俄国形象的成效上更具时代性，误读则更具超时代性：面对中俄共同的他者——西方及其现代性，俄国和中国能找到不少共同点，但离开了国际共运的框架，俄国却有不少和西方切近的东西，诸如基督教在俄国是一种文化传承形式和载体，但中国则没有，因而针对与基督教相关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合主义、文化多元论等，俄国和中国是有巨大差别的<sup>③</sup>。也就是说，引进俄国文化的知识群体变化是造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力量。

① 参见《晨光》杂志第1卷第3期，署名“剑三”。

② 《文学》杂志创刊号，1933年7月。

③ See Donald Tread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Religious and Secular thought in modern times*(俄国和中国视野中的西方：现代宗教和世俗化思想)(2), Cambridge Univ.1973, pp. 173-195.

然而，热衷于译介和研究俄国的知识群体，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但性质发生着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俄国变成了只关心苏联而不顾世界，或者按苏联的世界眼光去看世界，进而也越来越用苏联思想—意识形态来理解和规范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到了建国以后，因为国际共运和中国对世界的认识缺乏充分的准备，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后日益培养更为细致的专业人才，使得中国高校俄语教师或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很快成为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表达者。同时，作为一个专业，其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远甚于其他专业。由此，造成在反右年代，很多高校俄语专业是重灾区，而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则成了运动的急先锋，尽管他们的专业能力严重下降(词汇量、知识结构、对俄国的认知和理解等明显地苏联化)，无法辨别俄国文化史上经典与普通文本之别(少有人能释读俄语经典文本)、在中国重复着苏联规定的俄国知识(不能从整体上理解俄国的斯拉夫—俄罗斯性)，即便是对俄语也不是按普通语言学理论去理解，对俄国文学也不是按文学理论去分辨，对俄国经济或政治或法律也是超越经济学或政治学或法学的另一种解读。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但1970年代末开始拨乱反正以来重读苏俄，这批俄语人才中的大多数却因知识结构和观念症结，无法前瞻性地看到中国的变革趋势，直到苏联解体才意外地终结了这样的历史。遗憾的是，改革开放虽然给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各领域带来了生机，但俄语的语言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专业发展却很少能分享到社会进步的成果，原因就在于其难以适应中国借用西方现代性重建中国现代性变体的潮流，进而造成全国性的大学俄语专业日趋边缘化的趋势。

可以说，中国对苏俄问题的理解、对中俄关系的处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不通俄语的俄国思想文化传播者相比，1940年代以来有了专业人才队伍，但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却日趋脱离世界发展的主流。专业能力欠缺、思想僵化、学养严重不足等几乎成了新中国60年来俄语学科普遍情况，尤其是始终局限于国内培养的俄语专才，基本上没有应对后苏联变革局势和反思苏联时代俄国文化的专业素养，严重欠缺与俄国知识界或西方斯拉夫学界对话的能力。此情又严重影响着俄语学科在全国高校专业调整、重新布局的形势中，没能获得相应的进步(当然，也要承认俄国本身衰退、未对全球化发生很大影响力、俄语越来越成为地域性语种等客观情势)。

## 二

关于“误读”问题，现代中国并非不知晓。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1921)中，基于自己的世界文学视野和“文学为人生”的

使命感深刻地指出：“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文学家是来为人类服务的，应该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学；而文学呢，即等于人生！这是最新的福音。我国文学的不发达，其患即在听到这个福音，错了路子；并非因为我们文学家没有创造力，不曾应用创造力！文学家对文学本意的误认及社会上对于文学家责任的误认，尤其是错了路子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另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sup>①</sup>。至少应该说，在误读问题上，矛盾如此辨析是很深刻的。很可惜，没人接续把这种辨析运用于现代中国在对世界文明尤其是对俄国文化及其民族身份误读的问题的上来！

本来，如何借用外来民族文化解决本土问题就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必须涉及民族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即便你经常观察和赞赏这种特性，但你对它一切的描述较它本身来仍要贫乏得多。……为更接近于本真，不得不给这些字句添加上生活方式、习惯、需要、地理特性和气候特性的整幅生动画面，或者先行写一篇导论；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的所有愿望和行动，就要思考他们的丰富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所有这些愿望和行动”<sup>②</sup>。

俄国人对此更有深刻的认识：1825年5月普希金致信著名的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1795-1826)说：“气候、政体形式和信仰赋予每个民族自己特殊的面貌，这副面貌在诗这面镜子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某些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不计其数的习俗、信念和习惯，只属于这一个民族”<sup>③</sup>。这意味着，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普世性概念、全球性标准、世界性价值观等，实际上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即便后来制造出来了，也可能难以通行，诸如“全球自由市场预设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它把经济的全球化，即在全世界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经济中传播工业生产的现象，解释为单一类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就是美国自由市场的无情推进。但在我们的时代，情况似乎正相反。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出美国自由市场体制，而是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的。……在俄国，苏维埃制度的崩溃并没有产生自由经济，它产生出的是后共产主义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奇特类型。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未促进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传播。在俄国，它产生了混合式的民主政府，强有力的总统权力

① 参见《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署名“雁冰”。

② 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勒(1874—1945)：《启蒙哲学》，顾伟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4—225页。

③ См. Пол. соб. А. Пушкина(10),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 Литер., 1977, С.113.

是其核心……”。<sup>①</sup>而资本主义在俄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俄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构成，其中的斯拉夫民族难以割舍农业文明所培养的价值观、继续信仰敌视私有制社会的东方基督教，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各族群各有自己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方式。<sup>②</sup>而这些不仅难以为西方文化所同化，而且与中国文化少有公分母。

如此一来，“他者”资源如何嫁接本土文化就成为后进现代化国家普遍遭遇的难题。德国在这方面一开始就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8世纪德国所开展的启蒙运动，既受益于接受英法和南欧理性主义思潮，又对这种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抱以警惕。这造就了德国独立思考现代性的传统。自彼得大帝推行现代化运动以降，俄国得益于英国经济模式、法国启蒙主义、北欧军事制度等而迅速进步，却一直未被西方所同化，还能用本土斯拉夫文化遗产抵抗文化上的西化。此乃俄国受用于德国用本土资源认真面对外来文化之结果，虽然这未必解决了俄国的发展问题。很有意味的是，郑振铎和沈雁冰的《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论及赫尔德如何运用孟德斯鸠的民族性原理分析德国问题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赫尔德认为)文学是民族性之表现，并由此说明文学发达的公例。他以为文学艺术之最高形式并非全是创造出来的，他们是聚居于一地的人类(民族)所接所感之自然结果。他相信凡在同一境遇同一环境下之人类，其所思所感，皆为整个民族性之一点一滴”<sup>③</sup>，甚为深刻。

现代中国对俄国的一厢情愿解读，一方面是要为重建中华而有意识地借助外来现代文化，寻找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与现代中国生成过程相矛盾。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呼吁道，“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国民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权典型，延至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必新中华民族却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sup>④</sup>。如此呼唤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浩然之气，令人振奋并吻合正日益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根据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1990)的说法，“在古典语言学中，民族是一些血缘共同体，它从地域上通过栖居和相邻而居而整合，在文化上通过语言、习俗传统

---

① 格雷(John Gray)、张敦敏译：《虚假的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影》，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② См. Л.Лаврентьева и Ю.Смирнов,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обычаи обряд занятия фольклор (俄罗斯人们的文化：风俗、惯例、劳作、民俗)// СПб.: «ПАРИТЕТ», 2004.

③ 郑振铎和沈雁冰：《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1924年4月。

④ 参见《甲寅》日刊，1917年2月19日。

的共同性而整合，但没在政治上通过一种国家形式而整合”。康德总结说“那些由于共同血缘关系而被认作一个联合为公民整体的人群，就叫作民族”。15世纪以后民族被视为主权，18世纪中叶后“民族”概念发生巨变，法国大革命把民族国家和民主当作双生子推出，“‘民族’的意义从一种前政治整体变成对一个民主共同体的公民之政治认同而言具有了结构性意义”，“通过历史意识和浪漫主义文学表达的民族主义，为这样一种集体认同奠定了基础，对法国革命时期的公民角色起了功能性的作用”，民族意识的血缘特征转化为一种自觉的传统承受的结果，祖传的民族归属变成了一种获得性的民族主义、一种有自身力量构成的精神形态，共同的民族归属感成为民众通往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纽带，而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意识，而且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一开始就相互依赖，“每个人无一例外得到三重承认：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全体的成员、作为公民都应能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sup>①</sup>。然而，中国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潮流，如把俄文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英文的Nationality译成“国民性”，而不是“民族国家性”，也就顾及不了该概念下的个人地位问题：背离了民族国家潮流。进而，当然不会去辨析俄国人是如何把自己的事情说成是“世界性”的修辞，还把苏俄理想化，使之成为与西方有效对抗的范本，因而也就把俄国的“国民性”概念普遍化了，即相信苏俄对国内社会问题的叙述是对人自身或人类发展问题的普遍叙述。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也如此。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沙俄在华的特权)，其实并非诚恳，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所说，“1919年之宣言，我国仍遵守不违，但因自卫计，不得不采取一暂行方法”<sup>②</sup>。然而这却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好感。就在苏俄新政权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之际，1923年苏俄政府派遣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接替与中国交涉处于僵局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9月4日，加拉罕发表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原则精神，但同时声明，“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并未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sup>③</sup>。十天后，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与加拉罕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后者提出首先解决恢复正式外交关系问题，再解决双方关系的悬案，而前者坚持以谈判重大悬案作为正式承认苏联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双方意见迥异、互不退让，会谈破裂。1924年伊始，苏俄外交局面大变(英国和西方许多国家开始承认苏

①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656-660页。

②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第318页。

③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3-195页。



俄),由此加拉罕敦促北京政府外交部恢复谈判,态度趋于强硬,申明苏联在中东路、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变。可是各社会团体却要求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1924年2月16日,蒋梦麟、沈尹默、胡适之、马叙伦、李大钊、周作人和郁达夫等47教授致公函《国人力促恢复中俄邦交》称,“俄国革命,国体变更,中俄邦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迫,国际常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当随复……况俄之与我境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立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嚶鸣。况俄之于我,互助之勤,亦屡宣布,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若先以利合,后图未可必也。所以思惟再三,谓宣绝瞻顾冀望之怀,立遣俄复续两国之多,选民有言,当仁不让”<sup>①</sup>。尤其是李大钊,一方面发动北京各阶层人民集会、请愿、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外交,要求从速签订中苏协定,此论并得到包括冯玉祥、吴佩孚等各省政要支持,纷纷敦促政府批准协定;另一方面受北京大学派遣来到外交部,与时任外长的顾维钧面谈,声称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sup>②</sup>。政府没有屈从社会压力,谈判自然不顺利。对此,李大钊在《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晨报》1924年3月22日)中却不以为然地说,“吾人以中俄两国,疆土毗连,有历史关系,兼以两国民族同受帝国主义之害”。在知识界召唤的多方压力下,北京政府改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进行谈判。1924年5月31日,双方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中苏外交关系建立。在条文上,苏联实现了对华外交的胜利,“虽然推广到包括利用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基地在内,却在其他方面同帝俄的政策相似,以至于沙皇政权已成过去,中国获得友谊的代价并未减低”<sup>③</sup>。实际亦然,协定签订不足半月,苏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介入,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事实,但当时中国却出现加拉罕使团成员伊万诺夫所报告的情形:“从极左分子到极右分子,从陈独秀、孙中山,到吴佩孚、张作霖,第一次在要求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问题上统一起来”<sup>④</sup>。这样一来,知识界所虚拟的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不断得到社会呼应,苏俄文化之于中国重建,很快从配置性资源上升到主体性资源、甚至是唯一性资源的位置,且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可以说,知识界对苏俄如此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欠缺用科学思维来锻造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没有顾及到苏俄乃俄国的一个阶段,仍旧包含了俄罗斯的帝国诉求,夸大了苏俄的普遍性价值和俄国文化的东方元素及

① 参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5-336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0页。

③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50页。

④ 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其意义。茅盾在“海外文坛消息”第107条消息《再志勃洛克》(第13卷第1号, 1922年1月)中, 特别看重这位俄国诗人的名篇《塞西亚人》中的言论——“俄国将弃绝欧洲, 而且请你们看亚洲的乡村”。(茅盾解释这首诗整个是象征的, 未必就是具体指向欧洲和亚洲, 而是借东西方比作新旧, 而主人公则比作新旧的过渡。)实际上, 对俄国的这种东方性诉求, 中国感知甚少, 主要是相信了苏俄构想出来的“社会主义东方”一说。茅盾在“海外文坛消息”第108条《最近俄国文坛的各方面》中称, “布尔什维主义的诗人又是主张俄国与东方联合的; 他们都说传布亚洲文化于世界是俄国的使命, 而这亚洲文化就是新俄的文化作了代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 依据的就是斯大林《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1918)中的构想, 即西方无产阶级经由苏俄建成了社会主义东方阵营之说, “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民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进而, 没有人怀疑俄国的“东方”有自己的规定: 苏俄时期构想的“东方”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东方, 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1918)中描述的“东方”, 是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各自在战略利益上彼此对抗的东方, 不是文化价值独立、自足、与西方和苏俄平等意义上东方。他呼吁“要重视东方”, 是在维护国际共运的修辞意义上表述的<sup>①</sup>。1945年之前的抗战, 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并不比盟国更多, 但苏联文学却成为中国抗战的思想资源之一, 这在塔斯社于上海创办的《苏联文艺》就能看出来。如主编罗果夫通过创刊号(1942年11月)“编者的话”声言说,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 俄国文学的声誉在中国有特别的增长……在第二次卫国战争时, 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中国朋友竭力要求把英雄时代的苏联文学介绍给他们, 于是我们创办了这份《苏联文艺》月刊”。杂志通过译介苏联文学和发表社论、评论, 把苏联卫国战争描绘成拯救东方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 时代出版社1945年推出的大型系列《苏联卫国战争文艺集》再次巩固了这种叙述。对此, 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怀疑苏联的如此表述。

与此同时, 知识界也没有充分顾及苏俄排斥东方文化的历史过程, 从未深究过共产国际在描述“东方”时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落后的”这样的修饰语的意识形态根源。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别林斯基, 是一位民族主义色彩很浓的批评家, 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很是藐视, 认为俄国的落后乃是受东方影响所致。博学且富有智慧的索洛维约夫(1870年以《西方哲学危机》获得硕士学位)的《欧洲与中国》, 认为中国文化于欧洲是一种威胁, 提示欧洲要警惕中国。学院派领袖人物亚历山大·维

---

<sup>①</sup> See Robert Geraci, *Widow on the East: National and Imperial Identities in Late Tsarist Russia*(面向东方的窗户: 沙俄末期的民族和帝国认同).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导论》对东方的理解也有偏狭。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斯拉夫的东方在中世纪没有产生自己的美文学、自己的个人创作诗歌、没有创造出文学传统呢？许多事情可以从斯拉夫民族比较晚才登上文化史，以及斯拉夫族有责任同异族东方展开斗争的地理位置等情况中得到解释……如果可以把西方文学视为民族因素和古典拉丁文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这种结合在斯拉夫的东方却是在更狭窄的意义上发生的，即受到读书识字和教会教育的目的制约。这也就是为什么俄国缺少诗歌的原因所在”<sup>①</sup>。把俄国中世纪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与东方联系起来，这实在是很不负责任的意见。在俄国，鄙视东方的思想其实早已有之。著名的美籍俄裔史学家Н. 梁赞诺夫斯基的《经由俄国眼光看亚洲》(载《俄国与亚洲：俄罗斯对亚洲居民影响论文集》，1972年)一文就曾提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国开始与东方为敌，称亚洲人为“懒汉”(халатник)、认为他们“懒散”和“玩忽职守”(халатничать)。他因而断言，“俄国人虽然生活在欧洲的东部，至少可相信从来就不属于东方，彼得大帝在白纸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并用强有力的手在上面签署了欧洲和西方的文字，此后我们就属于欧洲和西方了”<sup>②</sup>。

在现代俄国人视野中，“中国”和“东方”或与其利益问题联系在一起(随着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中亚等并入俄国版图，俄国越发强烈关注东方国家)，或与“落后”联系在一起，是需要启蒙的对象(自认为比东方更早开始现代化历程，从而召唤了东方并向东方提供成功的经验)<sup>③</sup>。因而，在俄国的全球观念中，“中国”或“东方”的位置是很有限的。在俄国高校教材《俄罗斯学》中，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的独特性、地理空间性、多民族性等重大问题多有论述，特别注意“西方对俄国的理解”(Россия в западном восприятии)，却并不在意“东方如何认知俄国”这个问题。这样的认识，甚至延续至今。可是，知识界所构建的“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却能在中国毫无阻拦地通行大半个世纪！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接受这个原则，但那是因为中国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而不是发现了这个原则所包含的悖谬。

由此也带来了俄国人自我认同问题的严重误读。俄国作家的民族认同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且不提一代代知识精英对民族文化的自豪表述，就连民族主义意识相对薄弱的作家科罗连柯也声称，“我们是俄罗斯人就因为我们出生在俄国，从呱呱坠地开始，我们就呼吸着俄国空气，并凝视着俄罗斯那忧愁和荒凉有时也美丽的大自然”。<sup>④</sup>以书写人对大自然自发感受而著称的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更主张，“如

①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2-43页。

② N. Riasanovsky, *Asia Through Russian Eyes* // Сб. ИРИ РАН, В 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xix век). М.: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1996, С.387-416

③ Сб. С.Иванов и Б.Мельниченко(Ред.),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к(俄国与东方).СПб.: СПбУ, 2000, С.6.

④ Сб. Соч. Т.3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 Литер.,1990 С.232.

果我们试图仔细查考我们对自己故乡的感觉，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这种感觉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相当有组织和文化的，因为这种感觉不仅已经被对大自然自发产生的沉思所养育，而且也被整个乡间艺术所教化过，还被它的全部文化传统所熏陶过”。<sup>①</sup>这类表述完全吻合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趋向。按照安德森的意见，“经由印刷品的散布，资本主义协助在欧洲创造出群众性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腐蚀了历史悠久的王朝原则，并煽动了每一个力有所及的王朝去进行自我归化。官方民族主义——新的民族原则，和旧的王朝原则的融合，反过来导致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称之为‘俄罗斯化’的政策出现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这个意识形态倾向干净利落地调和了实际的迫切需要……作为双语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 20 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在教室内外接触到从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和欧洲历史的动荡、混乱经验中萃取关于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的模型”<sup>②</sup>。可是，现代中国只注意到俄国文学对帝制时代社会现实的否定性、批判性叙述，对俄国文学对苏俄本身的强烈认同和国际社会关于苏俄的认知少有谨慎的审视和判断。例如，当得知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拉斯基盛赞苏联宪法使苏俄人民“自由大为扩张”，以及有了“经济安全”的根据，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胡愈之便为《生活日报》(1936 年 6 月 23 日)撰写社论，热情地转述这种赞赏，而没有考虑当时正值苏联大清洗的高潮。而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胡愈之在《桂林日报》上著文说，这表明，“希特勒已经公然向张伯伦叛变，不愿在做反苏联的工具”，“侵略阵线已经开始破裂。向来用作侵略弱小民族的幌子的德日意反共协定，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而成为一撮废纸”，“苏联在欧洲及远东地位已大大增强。在欧洲方面，对德意与英法的冲突，苏联取中立态度”<sup>③</sup>。殊不知，该条约正是二战迅速爆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抗战胜利后，中国很少有人反思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的角色问题，继续倡导苏联文化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仅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就经营《中苏文化》、《苏联文艺》和《苏联医学》等多种期刊。

在这种认同与排斥的错位性误读中，自然延伸出一股进一步否定自身传统、背离中华民族国家精神独立的潮流，这种情形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更为兴盛。阿英的《中苏两国伟大的友谊万岁》(《星报》1950 年 2 月 16 日)开篇便声言，“我们在极度兴奋情绪下，读完了中苏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全文”，赞赏“一边倒”政策的正确性。冯牧声称，“正如苏联军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苏联文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

---

① Vladimir Solukhxin, *A Time to Gather Ston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4.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57-158 页。

③ 《胡愈之全集》第 4 卷，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第 400-401、76-77 页。

艺……在战争年代里，苏联文艺曾在思想上武装了我们，在建设的年代里，这种思想必然会日益加强。我们要学习苏联，学习苏联人民的建设经验，学习苏维埃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学习苏联军队的英雄的战斗道路，苏联文艺应当成为我们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教科书”<sup>①</sup>，“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苏联文学是怎样的教育了我们，加强了我们的思想武装和斗争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文学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随着我们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随着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就越来越变得明显和突出了……我们常常宣称向苏联作家学习，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但要向他们的作品学习，而且也要向他们的行动学习，向他们的深入斗争生活学习……我们酷爱苏联文学，不仅因为它能够给我们以崇高美学上的享受，而且更因为它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加强了我们的思想武装和战斗力量”<sup>②</sup>。1959年苏联已进入改革状态，《北大学报》当年第2期发表署名冯志等人文章《五四时期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拒绝以主体性意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俄国文学的误读历程，继续完全正面地评价这种误读。

这类误读自然不会促使中国知识界去探究俄国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发展史上始终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的潜流。且不提俄国浪漫主义之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之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于现实主义等有序变革，仅1840—1850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就很能说明问题：斯拉夫派强调理性个人与传统俄国难以融汇，主张俄国发展应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因而认为试图通过在西方寻找改造俄罗斯灵感是对俄国的腐化。而西欧派确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认为要维持俄国的本质就得与西方相通，断言俄国本来就容易接受文明，因而应该尽可能西化。但他们的这种差别却源于共同的社会与知识背景，即都是对俄国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积极而认真的反应，对当下制度共同的大失所望，彼此间有不少共同之处，如斯拉夫派不信任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认为由此而来的宪政是有欠缺的，而东正教信仰则能把信仰基督教的人连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精神共同体内人们能找到真正的自由。西欧派对此并不反对<sup>③</sup>。反观中国知识界，为了更快捷地实现自己种种宏大的目标，却酝酿成急功近利思潮。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1921)的“引子”中就说过，人类进步分自然的演进和顺着自然的趋势而加上人力的督促——“革命”这两种，而自然进化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可以将时间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而这种“人力督促”在中国现实中很大程度便是有意识地引进外来文化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① 参见冯牧：《苏联文艺加强了我们的思想武装》，载《云南日报》1952年11月16日。

② 参见冯牧：《苏联文学加强了我们的思想武装》，载《文艺报》1957年第22期。

③ See John Paxton, *Imperial Russia: A Reference Handbook*.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41-42.

俄国文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最主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或苏俄革命理论。进而，无暇认真关注俄国是如何在接受外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历史，无法消化俄国没有因三百年的现代化运动而消磨掉民族认同这一重要经验，不是在接受俄国文化过程中培养中国自身的主体性，相反，接受越多就越忽视俄国文化大师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越不能感化知识界和思想界反传统的情绪。“打到孔家店”/“不读中国书”/“废除汉字”等激进主义情绪，几乎毫无障碍地一泻而出，并无阻拦地在导引着全社会。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使人误以为整个俄国文化就是激进主义的，导致当代人把中国激进主义责任推卸于俄国文化。

大量引进俄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化，原本是要借以改造中国传统、提升国民性质量、更有效地解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结果却逐渐形成对欧美现代文化的排斥之势，进而改观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已经形成的多元接受世界文化的格局，变成了唯俄国文化是从的大势。不仅如此，在引进俄国文化过程中，又逐渐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把作为文化传承或一种文化形态的宗教与进步的左翼文化对立起来，并在“革命”的名义下，排斥前者而强调后者，导致现代中国建构过程缺乏文化宽容精神，很不严谨地片面接受某种文化。对很有学术价值的斯拉夫文化传统很少认真、全面、准确、积极的译介，即使在阶级问题上也不重视俄国文学和文化史如何寻求阶级和谐、弥合阶级分裂的叙述，主要看重苏俄强调阶级斗争的判断，并以此掩盖俄国民族认同问题，更不探究阶级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正如易卜生提倡妇女解放的《娜拉》在中国有轰动效应，而其晚期更重要文本却无人光顾，高喊民主自由口号却不研讨西方天赋人权观念之渊源一样。被译介最多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人，也只停留在对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诠释上，对他们眷恋传统的情绪或热爱俄国的情感则无从感应，至于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晚年改变对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态度则更被忽略。与此同时，并不认真探寻俄国文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在俄国文学召唤下，把原本就问题多多的启蒙主义变成了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导向，进一步膨胀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作用，严重弱化知识分子的其他作用，也减弱了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和对具体生命的关怀，满足于苏俄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阶级平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严重贬抑文学对人的复杂性、个体精神解放、个人内在自由和民族性诉求等普遍问题的叙述。

可以说，20世纪中国对俄国的认识存在着日趋简化的趋势，普遍忽视了俄国问题的复杂性。以至于国民政府对俄国的拒绝、新中国对俄国的肯定或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容易受具体事件左右。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俄国文明结构——18世纪以来俄国思想史主要争论的是如何弥合“俄罗斯形象”的分裂性和不确定性，结果却是越争论问题越多，分裂更严重。但中国对俄罗斯问题的表述与俄国的自我想象并不一致，

有时甚至相反。如“受洗之后，俄国人并不称美丽俄国，或者伟大俄国，而称为神圣罗斯。这一名称并不是指俄国人事实上的圣洁，而是表达了他们的历史原则本身；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它是指绝对理想乃俄罗斯人万死不辞的唯一力量”<sup>①</sup>。相对应的则是非宗教的俄国，即所谓“邪恶的俄国”。而且，正是这种“神圣罗斯”奠定了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并因要抵抗“邪恶的俄国”而激化俄罗斯问题，还由此延伸出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等在俄国的变体形式。可是，中国却用这些变体形式的外表现象替代其内在依据，并塑造出“进步”/“落后”、“革命”/“颓废”等俄国形象。而这些形象的塑造，表面上吻合中国现代性生成时期的历史境遇，实际上则影响了现代性在中国生成的质量，给后来中国提升自我带来了不小障碍。

正因为这样的表述，以至于在苏联解体的最初10年间，中国一些人将其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而不是看作是俄罗斯问题以苏式社会主义道路解决的失败。同时，由于中国日益富裕起来，便以好奇和自我满足心态虚拟着一个不断崩溃的俄国，以至于俄国文化在中国突然失去指导意义，而并未自觉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俄罗斯问题的表述存在着问题。实际上，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已批评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的主张，即“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仿佛是一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若夹杂了外力，便失去了独立性，所谓独立便名不称实了”，批评“这种关门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更高调些，他们的独立运动更彻底些；可实际上，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主张“中国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sup>②</sup>。现代中国构建过程中，从苏俄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资源乃无可奈何使然，为客观情势所迫：当时资讯和传媒不够发达、放眼世界不久，造成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国外经验、思想、理论、学说等，知识界多凭着热情、感觉，而不是学术界的理性判断和学术研究，从而或强烈认同或极力拒绝。对俄国一厢情愿的认知，选择经由苏维埃所确认的俄国，而不是自己所了解的俄国，并因知识界许多精英的社会亲和力，从而影响到民间和政府并不探究俄国何以选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民族性依据问题，而误以为完全是某种意识形态在俄国的成功实践，把原本是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下获得成功的苏俄革命这一地域性现象，泛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规律而广泛推行，来不及考虑其中所包含的苏联国家利益的图谋和意识形态的考量。革命如此，“建设”也

---

①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② 《新青年》1926年7月号。

是如此。甚至于在经历了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限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搞建设的失败教训后(中苏论战后,苏联撤出专家和终止援助项目等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不是积极地反思历史,从而参加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而是更封闭自己,直到1980年代以来才逐步加以改变,加大了“去苏联化”的力度,更切实地参与全球化过程,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在世界语境下进行“建设”的必要性。

当然,反思20世纪中国是如何表述俄罗斯问题的,是为了21世纪中国在引进世界知识和思想的丰富程度、文化观念的开放程度、认识俄国的途径和方便程度等空前增加的情形下,澄清历史过程,避免重复历史上一厢情愿的误读、为实用性目的而发生的有意误读、因为缺乏了解世界文化发展格局而带来的无意误读、不明白俄国实际情况出现的知识性误读等,而不是为了指责历史和历史上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

---

**【Abstract】** Now it is the time to re-understand how China stated Russian issues in the 20th century. Actually, for a rather long time in the 20th century, Russia has been a lingering myth for China, which existed in all corner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us has influenced without a break so far. We need to clarify the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With much enthusiasm, some well-known intellectuals identified or refused the Russia recognized by the Soviet Union without knowing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of the times limitation; Some generalized the regional phenomenon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which gained success under international anti-capitalist tides as a universal rule without academic researches or judges. Since 1950s, based on Socialism theories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understands the r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aw” as departure from socialism and its collapse as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ccordingly, the views lacking considera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e Soviet Union’s problems, which were quite popular in China’s society. This situation has lasted almost until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Reflection on these historic statements, it’s not only historical warning but also has theoretical values for China to raise its awareness level of Russian issues and construct a proper Sino-Russian re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Intellectual Groups, the Soviet Union’s Ideology,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State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рупп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责任编辑 常喆)



# 俄罗斯大事记

(2009年7—8月)

## 7月

- 1日 俄副总理伊戈尔·谢钦 (Igor Sechin) 表示俄罗斯和土耳其将在南溪 (South Stream) 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上开展合作。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签订牛奶、肉类供应协定。
- 2日 俄总理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什科夫 (Dmitri Peskov) 称俄希望加入 WTO, 但俄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签订的海关同盟是俄的优先方向。
- 3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对日本国会宣布南千岛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的声明表示遗憾。
- 4日 俄政界谴责欧安组织议会会议大会的一项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划等号的决议, 认为这是在试图篡改二战历史并忘记了曾经的盟国。
- 5日 俄军在北奥赛梯开始代号为“高加索—2009”的军事演习。
- 6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 (Barack Obama) 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i Medvedev) 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重新确定美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的文件, 并发表了关于弹道导弹防扩散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建立双边总统委员会讨论合作细节, 并达成了同意经过俄境向西方驻阿富汗军事力量提供补给的协议。
- 7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与中国外长杨洁篪通电话时表示, 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骚乱纯属中国内政。
- 8日 “西伯利亚能源”集团接受俄内务部对其下属两家公司商业活动相关文件的调查。
- 9日 中国敦促俄罗斯保护因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关闭而遭受损失的中国商人的利益。
- 23日 俄副外长卡拉辛 (Karasin) 表示俄支持国际观察员在俄格边界地区调查, 俄准备与欧盟调查团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 30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塔吉克斯坦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 (Asif Ali Zardari) 举行会晤, 称由俄罗斯、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领导人参加的四方会谈是相互信任的象征。
- 31日 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正式开启自 1980 年即开工建设的桑格图达 (Sangtuda) 水力发电厂。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 (Alexandr Grushko) 对北约新任秘书长拉斯穆森 (Anders Rasmussen) 表示, 俄希望能与北约建立紧密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 8月

- 1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i Serdiukov）访问阿塞拜疆加巴拉（Gabala）的雷达站，并与阿总统商讨军事合作问题。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ev）签订了关于在吉境内建立新的俄军基地的备忘录。该基地使用期为49年，并可视情延长25年，将部署一个营的兵力，其训练设施将对所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开放。  
俄警告格鲁吉亚，如果坚持并加剧其挑衅行为，俄可能会使用武力保卫南奥赛梯。
- 8日 俄财政部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俄经济需历时四至五年方可恢复。
- 1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推迟向乌克兰派遣新大使，以警示乌克兰领导层中的反俄派。
- 12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在访问阿布哈兹时宣布，俄将向阿提供3.3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国成立统一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小组。
- 15日 俄罗斯认为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不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并且欢迎双方重启其正常活动。
- 18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称失踪货船“北冰洋”号在瑞典海域被一伙匪徒劫持并被迫驶向非洲。
- 19日 俄能源部长什马特科（Sergei Shmatko）估计修复在爆炸中被毁坏的西伯利亚水电站将耗资12.5亿美元。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北高加索地区安全问题有其内部自身原因，但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将被毫不留情地消灭。
- 20日 俄常驻北约代表罗戈津（Dmitri Rogozin）称，来自北约的情报信息帮助俄找到失踪船只“北冰洋”号并解救出船员。
- 25日 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蒙古期间，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经贸投资合作的协议，其中包括建立一家合资企业进行铀提纯。
- 26日 俄总参谋长马卡罗夫（Nikolai Makarov）称，为应对朝鲜的火箭发射试验，俄已经部署好S-400导弹。
- 28日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总统在明斯克进行会晤，同意在联盟国家框架下加速发展双边关系。
- 31日 在纪念二战爆发60周年之际，抵达波兰格但斯克访问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波兰《新闻报》发表文章，谴责1939年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称俄德关系为俄波关系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龙腾 辑）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5 期

(总第 159 期)

## 《俄罗斯研究》刊期变更启事

经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沪新出报[2007]33号),从2007年起,《俄罗斯研究》的刊期由此前的季刊变更为双月刊,逢双月23日出刊,其他项目保持不变。

改为双月刊以后,《俄罗斯研究》杂志社将进一步注重刊物的刊发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以期为关心国际关系及俄罗斯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服务。

《俄罗斯研究》以研究和介绍俄罗斯现状问题与信息为重点,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兼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和相关的东欧中亚研究,目前设有“专论”、“政治·社会”、“经济”、“国际关系”、“斯拉夫欧亚”、“苏联时期·苏共”、“历史·文化”、“书评”和“学术动态”等栏目。

本刊热忱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广大作者、读者和专家的帮助与支持。同时,提请各位投稿者关注本刊的有关规范,可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

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http://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http://www.qikan.com.cn)

**ISSN 1009-721X**

**CN31-1843/D**

定价: 8.00 元